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2月號 總44期
No. 44 FEB. 1987

■台灣成立反對黨鼓舞大陸■

大陸民運·狂瀾驟起

火燒全國·合肥·武漢·北京·長沙·深圳·上海·聯線報導

獨家
發表

大陸學運領袖方勵之重要講話



上海三萬多學生于1986年12月22日大示威、爭民主。

著名歷史學家
朱永德
談西安事變之真像

中國之春英文版出版發行

請大家都來促銷中國之春英文版

中國之春英文版出刊了！這是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英文刊物，目的是打破官方的信息壟斷，向英文讀者介紹當代中國。中國之春英文版現為雙月刊，每期70頁左右，開本同中國之春中文版，創刊號專題是「鄧小平權力轉移問題」，開闢有經濟、政治、人權、民運和人物等專欄。

我們懇請各位讀者，各位留學生，中國民聯各盟員向您的外國朋友，外國教授推薦訂閱中國之春英文版雙月刊。您若有意做此工作請寫信給中國之春編輯部索取樣本（英文版訂單在本期九十八頁）。

中國之春編輯部

徵文啟事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我是華盛頓地區的一名僑商，一直向往祖國走上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最近，我訪問了闊別多年的大陸故鄉。我深感到，維系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和精神支柱已經崩潰，急需樹立新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在此情況下，中國之春傳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和多元的觀點，可謂正逢其時。

為表示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我再捐助貳千美元，掀起中國之春月刊新的徵文活動，獎勵自第四十三期至四十六期上的優秀文章，以鼓勵投稿，提高中國之春的質量。獎金為：一等獎——壹千美元；二等獎——陸百美元；三等獎——肆百美元（編輯部另付正常稿酬）。要求：文字內容與中國民主之前途有關，體裁不限，但力求有新的創意，徵文截稿日期為一九八七年二月一日。

美國華盛頓僑商

蘇奔

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五日



學習菲律賓微笑革命的模式

「向菲律賓人民學習，結束專制統治！」這是最近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中，人民群眾喊出的一句十分響亮的口號。現在，北京、上海、天津的學生、工人和市民，都在公開討論菲律賓模式，為革新勢力與守舊勢力進行大決戰進行準備。

菲律賓人民結束馬可仕獨裁專制的革命，被稱為「微笑的革命」，它向專制國家的人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結束獨裁統治的模式，那就是：人民群眾大規模上街——癱瘓交通與工商業——專制者失控——群眾運動感化軍隊——軍方倒戈——政權易幟。

菲律賓模式不是緩慢的改良——馬可仕一班獨裁者在幾十個小時之內，就被從權力的寶座上拉了下來。

菲律賓模式也不是暴力革命——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當馬可仕調兵向起義部隊進犯時，人民群眾用軀體擋住戰車，用鮮花和親吻感化士兵。人民的和平力量，在菲律賓的微笑革命中，做了最充分的顯示。

國內的民運人士們，目前正在醞釀在中國開展菲律賓式的微笑革命。他們準備串聯工人，聯絡軍方。在未來的適當時機，發動更多的學生上街，以造成學生帶頭——工人和市民接入——軍方倒戈——結束專制的局面。民運領袖們說：「我們再也不能坐視那些即將入土的守舊派們拖延改革、阻擋中國的進步了！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那些老朽們玩弄中國人民的命運了！我們要奮起，否則，中華民族將要被歷史所淘汰。」

我們在這裏向軍隊中有良知的、嚮往自由民主的軍官們呼籲：在中國社會大變局到來時，不要把槍口對準群眾，而要向菲律賓的羅慕斯將軍學習，站到民主運動一邊，為結束專制統治創下歷史功勳。

在這裏，我們也願意向中共高層改革派們進上一言：通過這次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你們應該看到群眾要求民主的力量了。你們應該做中國的納吉、中國的杜布切克、中國的卡洛斯，與民主運動相結合，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否則，人民群眾的民主浪潮是無情的。

菲律賓人民能夠辦到的，中國人民也應該能夠辦到！



學習方勵之， 做自由民主的火種

新騰起的大陸學運顯示，中國大陸正處於巨變的前夜。

在社會處於轉型期的時候，每個人，不管是老百姓還是當權者，都面臨着兩種抉擇：或做舊制度的維護者，或做新制度的開拓者。胡喬木和鄧力群是前一種人，而方勵之則屬於後一種人。

方勵之為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閘爭中曾被整肅。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方勵之來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進修。七月返國後，他在北京、上海、合肥發表一系列講話，鼓動民主思潮，點燃了這場民運之火。

做為重點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已有高幹地位。他完全可以穩當共產黨的高官，平步青雲而上。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為中國民主大業而奮鬥的路。他不怕中共當局的高壓，表現了一位民主戰士大無畏的精神。方勵之這樣做贏得了科大師生和全國青年的廣泛支持。由於他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中共守舊派雖然對他深惡痛絕，但不敢輕易對他下手。

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進修、學習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達二萬多人。我們應該以方勵之先生為榜樣，既要努力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學到手，也要把現代世界的民主精神學到手，以雙豐收回贖祖國。方勵之先生在近年多次演講中，一再提倡知識份子要有社會的責任感。這一點，對留學生來說尤為重要。我們在回國後，要像方勵之那樣，把傳播自由民主的思想，把變革專制制度，當成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號召：現在，全國佈滿了乾柴，讓我們都做火種！方勵之就是這樣的火種。

星星之火要達成燎原之勢，必須使塊塊野火連成一片。一個火星容易被風吹滅，而一旦成為燎原之勢，風不但吹不滅，而且會愈吹愈旺。因此，只有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以團體的形式運作，才能造成勢不可擋的局面。這就是中國民聯為什麼強調搞組織的原因。

讓我們都做自由民主的火種，點燃各地的乾柴，並且，組織起來，協同運作，讓民運之火，燃毀那專制的殿堂！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七年二月號總四十四期

一九八七年二月號總四十四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學習方勵之·做自由民主的火種·學習菲律賓的微笑革命·
讀者●作者●編者

6 ■致王策、致莫西·沒有白吃的午餐等 (中國大陸研究生) 王策等

特別專題 大陸民運·狂瀾驟起

11 ■大陸民運·狂瀾驟起·席捲全國 (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 周純青

19 ■民運領袖方勵之在內部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 方勵之

22 ■保衛方勵之——科大示威學生的心聲 (國內) 霍抗波整理

24 ■制訂中期目標·注重民運策略 (中國民聯) 王炳章

25 ■牢記兔死狗烹的教訓 (中國民聯) 林樵清

23 ■致中國大陸民運學生的聲援信 (中國大陸部分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26 ■中共應學會容忍民主運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曼克

●特輯●慶祝中國之春四周年及英文版創刊

27 ■中春四周年暨英文版創刊慶祝酒會散記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 馳遠

30 ■新的一代一定會逐步成熟起來 (中國民聯) 王炳章

30 ■萬人刊物 (中國之春經理) 林樵清

31 ■中國之春文摘英文版發刊詞 (本刊資料室)

●特輯●控告鄧力羣和人民日報一案的迴響

32 ■堅持到底·不准鄧力羣用外匯打官司·誰先拋棄誰?等 (大陸新移民·美國) 康仁義等

●人物專訪●

36 ■專訪朱承德教授:西安事變縱橫談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曼克

41 ■專訪熊玠、田弘茂二教授:

從海峽兩岸政情發展,看民進黨的「住民自決」

(本刊記者) 秦俠

●兩岸風雲●

44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兩黨競選·中國簽署國際禁止酷刑公約

·公廁與文明·中國通過試行企業破產法·李根道競選雖

敗猶榮 (中國大陸留學生) 彭秋野等

48 ■「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文摘 (本刊資料室)

編者的話

大陸民運一定會再次出現高潮，這是我們早就預料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猛。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卅日，中國民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決議中指出：「民主運動的高潮有可能在下列情況下出現：(一)改革徹底失敗、保守派全面反撲時；(二)共產黨內有影響的改革派人物公開支持和投入民運時；(三)改革停滯在一定程度而人民又尋求進一步突破時；(四)有外在力的衝擊，如國共接觸、台灣政治力量涉足中國大陸時。」顯然，這次民運高潮的興起，其原因是上述的第三種。如果其他因素綜合作用，中國大陸的政局肯定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本期對這次民運有詳實的報導和評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日，歷史學家朱永德教授接受本刊採訪，提供了很多我們在大陸所不知道的事實。

本刊向國內外公開徵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大陸民運的資料，包括演講稿、大字報、照片、錄音帶、訪問錄、回憶錄及中共官方有關此次民運的文件，以便匯集出版。

下期預告

由於大陸民運風雲驟起，原擬四十四期所刊載的雲南數萬下鄉知青大罷工事件，移至下期。

在大陸新興起的民運高潮中，中國科大的方勵之副校長，成了中外矚目的人物。本刊新近又從國內獲得了他的一些內部講話稿，下期將予刊出。

旅法的中國作家張諄女士，在中國大陸居住一年後，現已返回巴黎。她給本刊又寄來了佳作，擬下期發表。

下期還有大陸青年作家尹小明關於評論朦朧詩的大作。

特稿專欄

- 51 ■ 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是所有制改革 (中國大陸留學生) 痴心
65 ■ 中國民主同盟四十五周歲 (國內) 魏柔莉

台灣專欄

- 70 ■ 大小台獨 (台灣旅美作家) 劉添財
73 ■ 台灣政局突破的分析 (台灣留美研究生) 楊農
75 ■ 台灣民主運動的隱憂 (台灣旅美作家) 謝眉
79 ■ 國民黨再改造此其時矣！ (台灣留美研究生) 楊農

連續專題：文革·評毛·「五·一六」問題(之六)

- 78 ■ 法國安德烈·馬爾勞看毛澤東 (中國大陸留學生) 項明橋譯
80 ■ 論文革再現的可能性 (美國) 余森

報導

- 82 ■ 祝王克平首次巴黎個展 (中國民聯) 柯力思
83 ■ 小侯(德建)不開心 (美國) 江心

留學生園地

- 84 ■ 隨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 歷青
85 ■ 逛車房拍賣小記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南星
86 ■ 日本的大眾性賭博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高今航
87 ■ 人治、牛治及其它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晉
89 ■ 九九豔陽天 (中國大陸留學生) 李豐

文藝園地

- 88 ■ 詩兩首 (澳洲) 陳紆塵
72 ■ 龍鄉託事 (詩組) (美國) 哲子嬰
77 ■ 笑話兩則 (西德) 李彥台
81 ■ 存在與命運 (詩) (中國大陸留學生·澳洲) 孤子
90 ■ 逝者如斯 (小說) (香港) 蕭明
98 ■ 中英文訂單



致王策

王策先生：

讀了您在「中國之春」總三十五期的大作，甚受啓迪，特別是第一節歷史的分析，很有見解。但對您的幾個出發點不敢苟同。

一、您似乎把民主在中國的命運歸於偶然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先秦百家的「歷史悲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罪魁袁世凱的兩次斷送社會轉型。歷史的演變有根植於民族文化中的深刻背景，明治維新註定要在日本成功，戊戌變法註定要在中國失敗，決不是袁世凱式的某個個人所能左右的。這又牽涉到文化的概念。您在文章中把文化過分集中於少數文化人的經典著作和思想。西方社會學和人類學中，文化的概念包括整個民族的行為類型。正是這個「文化」決定了歷史的腳步。可以說，「中央之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必然是今天這個樣子，無論歷史上發生了多少次「如果」。這

樣說並不是促進民運，今天的民運也是歷史的必然結果。但您所號召的「人人爭當散勢派」，誓把共產黨拉下馬的勁頭，敝人不以為然。歷史不會因為你的激進而跳躍。

二、您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馬克思的信徒并宣傳了他的教義。您把西方文化的轉向歸結於「新的生產關係在封建制內部逐漸形成」。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說在西方學術界被稱為「經濟決定論」，它和諸如「文化決定論」、「人口決定論」、「地理決定論」、「權力決定論」一樣，同屬對歷史眾說紛紜的解釋。而在中國，馬克思的說法是正宗，致使許多大陸人在批判馬克思時都把馬克思的一家之說視為經典。我相信無論歐洲國家還是中國，在文化轉型中本身的文化、歷史無疑是關鍵因素。把中國缺乏民主的責任歸結於「中國共產黨的摧殘壓制」是毫無意義的。中共正是傳統的中國政治哲學的化身，無論現代生產技術多麼發達，現代中國的經濟基礎與過去多麼地不同，但統治的方法却與過去驚人地相似。所以民運等待的不是什麼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也不是某個民運領袖的誕生。

三、您在文章中對共產黨怒氣橫溢，并呼籲進行一場文化多元革命。仍沒出馬克思的俗套。革命 (REVOLUTION) 在馬克思的詞典裏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為。和馬克思相對立的社會變革理論則強調社會的漸進 (EVOLUTION)。革命要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而新的國家機器又很大程度上模仿舊的，這樣，統治者大換班，政治結構依然如故。從歷史上看，一切革命的結果都是這樣，中國的例子就很典型。我們不得不尋找其它辦法：漸進，社會的逐步改良。民主思想的出發點就是非暴力，妥協，共存。共產黨已不是一

個政黨意義上的組織，也不是一個團結、內聚的團體。它的頭目不如就直接說是現代中國的統治者，它的大部分成員不過是處在不同社會地位的老百姓。罵共產黨不民主無疑像罵老天爺不下雨一樣不着邊際。共產黨只是一座牌位，在這座牌位後面，是中國傳統的等級結構，填充這些結構的是我們十億同胞，我們和他們每個人都無冤無仇，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改變這個結構。

讀者莫西

致莫西

莫西先生大鑒：

「中春」編輯部轉來您的來信，承蒙您的關注，并不吝諄諄賜教，在此容我深表謝忱！首先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實際上我們的「出發點」並沒有什麼大的不同，正如您所說的：「我們的目標是要改變這個結構」。我那篇小文的中心論題，或者說出發點也就是主張要改變中國的一元性文化結構（等級結構也包含在其中），從而為現代民主政治鋪平道路。我們的分歧只是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提法，或對某些理論的認識，我想這些都是可以通過討論來進一步加以理解的。我一直認為無論是政治上或學術上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能互相切磋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國古代學人有所謂「雍容論道之風」，西方社會也有自由辯論的傳統，這些都是我們當前急需學習和發揚的民主作風。從您的來信中，我看到了恢復這一作風的希望。

現在我想就您所指教的問題作一簡單的答覆，談談我個人的一些淺見，以就教於先生。一是您認為「歷史的演變有根植於民族文化」的深刻背景，「在各國文化轉型中」文化、

歷史無疑是關鍵的因素」，從而責難我「把民主在中國命運歸於偶然因素。」對這個問題，我的文章實際上也在反復闡明文化歷史的重要作用，只是我在描述一些歷史轉變的關鍵事變中突出了一些個人的特殊作用，確有過分強調之嫌，在此我謹受尊教。但正和你反對各種「決定論」一樣，我認為歷史發展除受一般性的文化、經濟結構等制約外，也并不排除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響。一個國家的現狀是由各種因素滙合而成的。也可以說歷史是有規律的，也是沒有規律的。前者是常，後者是變。所以我並不認為「明治維新」定要在日本成功，戊戌變法定要在中國失敗」。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那麼還要我們去努力幹什麼？就拿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來說，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時不是被美國佔領，而是被蘇聯佔領，那麼日本現在又會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也許現在正淪為越南，柬埔寨的狀況也未可知。它的豐田汽車也不可能注定會在世界各地風馳電掣了。另外您說中國這個「中央王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必然是今天這個樣子，」那麼這個必然的樣子具體地說應該是指什麼樣子呢？是大陸型的、港澳型的，還是台灣型的？或者說注定是這麼個具有分離的、不同政制結構的國家？那麼這是什麼文化背景注定的呢？如果有什麼公式真能推算下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必然會是個什麼樣子，那麼我們的確不必再討論中國的前途，民主的希望了。

二是您認為把中國目前缺乏民主的責任歸於中國共產黨的摧殘與壓制是毫無意義的，罵共產黨不民主無疑像罵老天爺不下雨一樣不着邊際，對此我亦有不同的看法。共產黨之摧殘與壓制民主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性的。有目共睹，凡是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均缺乏

民主。如東、西德具有相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就是由於共產黨，東德的民主程度與西德就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柏林牆隔不斷文化歷史的背景，却豈起了一條民主與專制相判的藩籬。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主及對民主的摧殘壓制不是我們罵不罵的問題，而是客觀現實。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內部則自相整肅殘殺，外部則對人民群眾及民主黨派百般壓制，其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如果共產黨人真的已從歷次運動的消極後果中吸取了積極的教訓，那麼他就應該深自反省，容許黨內、黨外都要對他的不民主作風加以批評與剖析，而不是去掩飾它，辯護它。先生對西方的社會與政治有很深的研究，想必也注意到西方的政黨選舉上台執政，如政績不佳，失信於人民，自當下台。即使是各部部长及其它行政負責官員，一旦工作失誤，也大多引咎辭職。就拿中國封建社會來說，如遇天災人禍，封建帝王有時也會下「罪己之詔」，宣稱「天下無罪，罪在朕躬」。中共別的不說，單拿其發動十年文化浩劫為國家造成如此慘重的損失來看，也應該引咎自責，以謝天下。現在反而擺出一副「中共無罪，罪在天下」的架式來，如何令人信服。中共在其長期禍國殃民，醜態百出之後，現在又拋出什麼「子不嫌母醜」之說，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化身，祖國的代表，肉麻地乞憐於人民，為自己繼續賴在台上製造輿論，其顏之厚，實為罕見。如果依先生之見，我們民運人士不去批評中共，只是批評中國的歷史，中國的人民，那麼是否會更為不着邊際。我個人認為要促進中國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只有通過對中共不民主作風的批評，可能更為現實，更為具體。

三是對於「革命」與「改良」之爭的問題

。由於共產黨多年來濫用「革命」一詞，使現在中國人民大多談「革命」而色變，應該說這是個很好的現象，即表明了一種民心對中共式的「革命」的厭惡與否定。但我所呼籲的進行一場文化的多元革命，并非是使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為」這一「革命」含義，根據我的文章，革命一詞只是採取其社會文化轉型的意義。我在文章中已明確指出：「嚴格地說，革命一詞只有用在社會文化轉型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我同樣對「統治者大換班，政治結構依然如故」式的革命不表欣賞。我在文章中也曾指出：「中國人民求解放已求了一個多世紀，民主未曾得到，身上的束縛反而越來越多，其原因即在於未曾散去一元性文化結構之勢，變來變去都是調換統治集團或個人，而不是改變文化的結構與統治的方式，也就是未曾進行一場文化的多元革命，或者說散勢革命，而要實現中國社會的轉型，這一革命勢在必行。」可見我的見解與先生要求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見解十分相近。我所主張的「分權散勢」也沒有把共產黨拉下馬的意思，不過是主張在文化思想上實行行政權分離，開放「二禁」，使各派政治勢力和衷共濟互相制衡，以散其一元結構之勢。如先生以為我的這些主張就是要拉中共下馬，可能仍是以一元化的觀點來看問題，未知先生以為然否。

話再說回來，我在文章中雖不主張在中國進行暴力革命，但在理論上我個人並不認為「一切革命的結果」都是以暴易暴。就拿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來說，都是為建立與鞏固自由與民主的政體而努力，這樣的暴力行為也可稱之為革命，而且是值得稱道的革命。所以我不認為存在一種對一切國家在一切時期都適用的革命公式，一切因時因地而定。

對於社會的改良與漸進，我個人也認為必須去努力推進與追求，但我覺得只有改良與漸進，而沒有伴隨一些「革命」性的根本轉變，包括思想文化意識、政治經濟結構等方面，要想社會發生階段性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哲學講由「漸」而「頓」，馬克思主義哲學講由「量變」到「質變」。改良是「漸」是「量變」；革命是「頓」、是「質變」。所以改良與革命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如只是主張社會的漸進改良，可能又會回到「經濟決定論」上來，不知先生所指的改良是在什麼意義上的改良。

提到馬克思，我希望說明一下你來信中提到的對馬克思的學術理論的態度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不因人廢言，有可取之處，仍加引用，至於是否是他的信徒，又當別論。我文中提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形成時指出：「歐洲從十四世紀開始由於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新的生產關係在封建制度內部逐漸形成」，也是一種歷史事實，只是作為原因之一而提。至於整個西方文化轉型我是通過三個階段，包括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發展而來，而核心在其教分離與文化思想、政治結構的多元化，而不是簡單地歸結於：「新的生產關係在封建制內部逐漸形成」。所以對當前中國的民主運動，我同樣并不等待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或某一領袖人物的誕生，而注重於文化與政治結構的變革。

以上是我讀了先生來信後的一些粗淺想法，謹此作復。因忙，對先生來信中涉及的一些其他問題，恕不一一作答。再次感謝您的來信指教。專此

撰安！

敬頌

王策謹啓

針對制度，不針對民族

讀罷《中春》第四十二期《迴響的沉思》，掩卷而思，心裏有點像錢塘江的浪潮，久久難以平靜。剛踏入他國異土，首先在一本讀物上看到中國人評價中國人自己的詞句竟是「又窮、又懶、又詐」「為達到個人的目的，不擇手段，是我們許多人身上的通病」，總覺得言過其實，令人傷感、惆悵。

我不想反駁上面的觀點，只敬請那些發此觀點的先生們考慮：中國明天的強盛是要靠整個民族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識的提高，以及經濟、科技和軍事的發展，而不應自己貶低自己，從而產生一種偏見。就以「窮、懶、詐」來說，應該有一個客觀標準來衡量。如果沒有一個客觀標準，那麼某個人或某些民所說出的「窮、懶、詐」是他或他們的主觀印象。這種主觀印象往往形成偏見，而在刊物上值得刊登、討論這種「窮、懶、詐」的偏見觀點麼？

再說，在心理學家看來，任何人都曾有過或將會有「貧窮」的時候，有過或將會有「懶惰」「詐騙」心理，只不過每個人的程度不同。同時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也會有這些劣性（因為它們是人類共有的劣性）。

我們應該理解，身在他國異鄉，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主張，也有不同的社會及經濟地位。但我們大家（不管是美籍華人，還是中國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都是炎黃子孫，在外要的是相互團結、合作、幫助，不是相互分裂、鬥爭、歧視，更不是「漢人學得胡人語，爭向牆頭罵漢人」。試想中國人

在外瞧不起中國人，難道其他民族的人能看得起中國人麼？對同胞的歧視又何異於對兄弟的殘殺？！

另外，有一點不可否認：「磨洋工、吃大鍋飯」是中國大陸社會的普遍現象。但「為達到個人的目的，不擇手段」是否是我們許多人（留學生）身上的通病呢？我非常佩服編輯先生無私的自我反省心理，但這種說法（至少在措詞上）是否與客觀事實一致呢？我完全可理解要強調（提倡）民主、自由、法治的重要性，必須抨擊專制制度，但不能過份貶低民族本身，否則就會失真，難以令讀者信服。

（中國大陸學生）越婷於紐約長島

請阿昆莫為日本鬼子辯護

《中國之春》編輯部：

讀了貴刊第四十二期《讀·作·編》欄以頭條位置刊登的「為日本鬼子辯護」一文，我首先產生的感覺是懷疑，懷疑作者「中國大陸留學生阿昆」究竟是不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呢？因為他似乎完全徹底地站在當年軍國主義份子的立場上，把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間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罪惡一筆勾銷，要我們「勉強原諒他們算了」。

在這場侵華戰爭中，僅在攻占南京以後的數天內，日本軍隊就強姦了數萬名中國婦女，殺害了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卅多萬（比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所殺死的日本軍民還多！）。至於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所殺死的中國人少說也有幾百萬人。這筆血債，中國人能忘掉嗎？

當然，日本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是日本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日本人民不應承擔直接

罪責，何況他們當年也身受其害，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國內大學紀念「九·一八」海外華人也爲之呼應，這完全是正義的行動，因爲這一行動並不是什麼「反日」，而是反對日本國內現在仍十分猖狂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反對中共一些領導在對日關係中的某些錯誤做法，反對國內極不正常的「高幹子女接班風」。(阿昆先生要當反對這一「潮流」的勇士，他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爲誰講話呢?)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阿昆的「邏輯」。在他看來，「一個國家想併吞另一個國家是歷史上的常事」，「春秋時，秦國活埋越兵四十萬」，「成吉思汗打到俄國，打到歐洲」，而日本侵華「殺死的中國人還不算太多，對中華民族的摧殘還不算太大」，因而他說而不敢說的結論必然是：「日本侵華不是壞事，沒有罪過，也許還有功勞！」照此「邏輯」推下去，希特勒及德國法西斯當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沒有罪惡！根據阿昆先生的這套「邏輯」和這些觀點，我如果要扣帽子，只能認爲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當代軍國主義分子！當然，如果阿昆真的是一個中國人，我不想給他扣這頂帽子，而只是認爲他是一個不了解中國歷史、也不了解中國民情、更不了解世界歷史的糊塗人。他把中共執政後的錯誤與日本侵華的罪惡混在一起，以爲有了前者，後者就不算罪惡，就可以原諒、忘却，真是糊塗到頂點了！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史華于特拉華州

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是美國的中國人，非常同意你們免費贈閱雜誌給「新來」美國的大陸同學。但是，除了帶給他們民主、自由的思想觀念之外，也應

該讓他們認識到「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在他們領了老美的獎學金開着一千至二千元的小車，訂 PLAYBOY 和 PENTHOUSE 之後，花個十幾廿幾元買一些思想，應該是付得起的——如果他們真的很渴望的話。——我如此說，是因為要一個開五百元車，自己定中國之春的我來負擔開一千至二千元車的人的印刷費，是令人不平的。

同時要測試一個雜誌或報紙是否真的受歡迎，不是看他發行了多少本(如人民日報)，而是看他的銷路。台灣的黨外雜誌一向是不贈閱的。中國之春不是叫窮嗎？不是要和人民日報打官司嗎？財力有限，就得省錢。或者另闢財源，或者重新調整企業觀念，及編輯風格。一次叫窮還可原諒，老是叫窮，怨我直言，就得經濟學台北、學老美了。

讀者劉眞善

答「沒有白吃的午餐」

劉眞善先生大鑒：

來函敬悉。您的腰幹挺得直，言語擲地有聲，引我們再度沉思贈送「中春」雜誌之事。首先，我們要向您及讀者解釋贈送雜誌的財源和用意。中春是一非營利的機構，在我們向各界人士募捐時，曾允諾贈閱雜誌給來美留學的大陸同學。讓他們在打工讀書財力拮据的情況下，能有機會認識民主、自由的思想。但是，在贈送一段時間後，我們會寄函請這些免費贈閱的留學生訂閱中春，不再提供「白吃的午餐」。這是兼顧了發行和促銷的辦法。

您信中所提的情形，我們相信畢竟是少數。大陸來美的留學生打工一段時間後，或有人能攢到一筆錢，開上千元的汽車，花錢訂 PLAY-

BOY 和 PENTHOUSE，可是依然享受免費訂閱中春之惠。這樣的人也許是深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認爲取之「公家」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在此呼籲所有大陸來的同學，在民主制度的社會裏要有「付錢才享受」的觀念，踴躍訂閱中春，以具體的行動支持民運。

編者

探「配偶」不行！

我是大陸的留學生。前一段時間(在中共「留學生政策新規定」公佈之前)在留學生中流傳說，配偶將不准出國。國外的一些人稱此爲「扣做人質」。「留學生政策新規定」公佈後，我們對留學生配偶「扣做人質」的說法半信半疑，因爲新政策規定「一年半後可以來美探親」。最近我太太去國內公安局辦理探親手續，辦事員却說有規定：「來美探什麼親屬都行，只是探配偶一律不給辦。」真是一語洩露天機！儘管官方宣稱「扣做人質」的說法「居心不良」，事實上，這不是「扣做人質」是什麼？！

一個政權對人民、對輿論明一套、暗一套，真是叫人寒心。這種做法若用「卑鄙」形容確實受之無愧。這樣的政權能叫人信任嗎？當權者想一想，如果人民不信任你們，將會發生什麼後果？！

中國大陸留學生 衆聲於美國

不要再沉默

最近太太去公安局辦理來美探親手續，辦事員告訴她，最近上級有新指示，不論配偶在

美待多長時間（一年半以上也不行），一律不給辦理。聽到這個消息，心裏感到萬分憤怒，中國已有「出入境管理法」，但出國還要單位批准，那我們還要什麼法律？而登在黨的「喉舌」報紙上的文件，是爲了欺騙民衆，欺騙國際輿論，背地裏還有什麼不敢見人的指示，卑鄙！從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是在搞法制，還是搞官制？

做爲稱爲「第五代」的留學生，爲了祖國的繁榮富強，我們在國外刻苦學習，國家理應爲我們排憂解難。但事實却正好相反，我們滿腔熱血換來的是什麼？是不近人情的刁難，是不信任，是配偶扣做人質！面對這些，我們感到憤怒，更感到傷心。誰知道學成回國後還會遇到什麼刁難？！同學們，爲了我們共同的利益，我們不該再沉默，我們希望「中國之春」除了對我們同情和呼籲外，也希望美國政界、科技界的名人向國內呼籲。

楠平於美國

該打不及格的政策

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在八月份的一項決議中批評中國「不尊重人權」，要求中國「保證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被激怒的中共官方，連連發表文章反擊，稱中國百姓有充分人權和自由；諸如旅遊和出國權利。平心而論，如果對大陸領導人在人權和人道的知識方面打分，他們是不及格的。因爲他們制定政策、考慮問題時，一向是從集權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角度和利益出發，對於小百姓的個人困難和感情根本不屑一顧。

我的一個學生是大陸派來的留學生，正在

申請其夫人及孩子陪讀，但被國內拒絕，因此很沮喪。據他講，最近中國領事館有專人到此傳達中共有關留學生的新政策，其中講到：「今後取消陪讀，留學生配偶只能來短期探親，而且不是人人能享受此類待遇，須在一年半到二年後經層層關卡批准才能來。理由據說是留學生享受了天倫之樂，就不思學習了。此外，配偶來不准帶子女，理由是小孩英文學得快，以至丟掉祖國文化。」此言一出，滿場大譁，議論紛紛，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影響學習是假，扣留人質，迫使留學生早歸是真。這是一個不尊重家庭，對留學生及其配偶的人權公然踐踏的政策。這個政策非常愚蠢和專橫，傷害了衆多留學生的感情，明顯損害了中國的信譽和威望，我想不出有哪幾個國家有此類規定。

當前，確有大陸留學生學成不歸的問題。其中有政治制度、有體制、待遇上原因。中國人誰不思鄉！大陸領導應首先努力改變環境，創造更好的條件，才能吸引衆多留學生回國。有很多留學生怕回去是不滿大陸的某些專制作風，如果中共領導不在此方面改善自己的形象，反而進一步把專制手段施於留學生頭上，只有使更多人怕回去，即使迫不得已回去，也是心懷不滿，背離離德，就像徐策對曹孟德一樣，不獻一計一策，不知大陸領導考慮過沒有？

黃唯文於美國

毛小金被遣返大陸

中國之春月刊一九八六年總四十一期曾報導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廚師毛小金失蹤一事，

并呼籲各界尋找。中國之春對同胞如此關切，令人欽佩。

現向貴刊報告：毛小金已被紐約總領事館遣返回大陸。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七日，失蹤了三個月的毛小金突然出現在紐約總領事館。到底是怎麼回來的，我并不清楚。據領館內一位同事告訴我的消息，毛小金向領館負責人說，他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九日離開領館，被一位在德州開餐館的華人帶到德州。幹了近三個月，覺得不合適，就決定返回紐約領事館。毛小金曾乞求領館負責人不要懲罰他。

自毛小金突然出現在領館後，毛被看管和審訊了三天，然後被領館送上中國民航班機遣返大陸。

毛小金文化程度較低，在大陸當過兵，是個「粗」人。

通過毛小金事件，我建議那些會脫過隊的任何大陸外出人員，不要輕易返回使領館。專制制度的特點是，你只要背叛它一次，就永遠再得不到信任。要想追求個人的人權與自由，就要破釜沉舟，義無反顧。

中國之春，努力吧！領館內很多人是支持你們的。

願此消息借貴刊一角刊出。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 心在漢



中國之春四年有成·台灣成立反對黨鼓舞大陸

大陸民運起——狂瀾捲全國

——全國各大城市聯線報導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周純青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最近，大陸學生運動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一九八五「九·一八」期間，北京、西安、武漢、成都和上海等市的大學生，在「反日愛國」的口號掩護下，掀起了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可惜，這場運動被當局軟硬兼施地壓制下來（見「中國之春」月刊總四十四期）。

今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改革陷於停頓，政治改革虛幌一槍，物價飛漲，大陸人民怨聲載道。正在沉悶之時，九月廿八日，台灣成立反對黨的消息，像一聲霹靂，震撼了神州大地，震醒了茫然的大陸人民。

蘊藏的巨大能量終於爆發了。

春雷起於中國科大

十二月五日，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內，一千五百餘名大學生走出宿舍，在校園內集合遊行，向學校黨委示威，抗議黨委壓

制民主。事件的起因是：在安徽省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中，科大黨委不准許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們與官方指定的候選人進行競選。

大陸人民都知道，官方包辦的選舉，實際上是愚弄人民的一場兒戲。沒有競選，只在黨委指定的幾名候選人上畫圈，是對選舉的莫大諷刺。

科大的大學生們對黨委的無理壓制異常氣憤，他們找到著名的改革派健將、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同志。

方勵之鼓勵學潮

方勵之鼓勵學生們說，憲法保障了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學生們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省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合法的權利。方勵之還說，學生們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自由。

在方勵之的鼓勵下，一千多名大學生在校園內點燃了學運之火。
春雷起於科技大學，並不是偶然的。應該

說，科大掀起學運的思想與論準備早已做好了。科大擁有兩名著名的改革派先鋒：方勵之和溫元凱。溫是化學系主任，在科大進行教研室體制改革已有數年，名噪全國。溫元凱和方勵之名列全國青年四大導師（其餘兩位是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李澤厚和「走向未來叢書」副總編輯金觀濤），幾年來在全國各地發表了多次傳播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觀念的演講，備受各界矚目（方勵之的一篇演講曾刊於「中國之春」雜誌總第四十二期之上）。

方勵之曾在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進修，溫元凱曾在法國進修。他們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和多元，都有親身的感受。他們回國後，在青年學生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啓蒙的工作。

另外，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科技大學已向外國派遣了一百多名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他們對於自由民主觀念在科大的傳播，也起了相當的作用。



台灣於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十二月六日，台灣舉行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兩黨和平競選。這是反對黨領袖康寧祥高票獲選立法委員後接受群眾歡呼。

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大陸。

萬里下安徽

方勵之的確不愧為這場學生運動的點火者。一九八六年七月，他從美國回國後，在北京、上海和合肥，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鼓動民主運動。方的講話，驚動了中央。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底，曾在安徽工作過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來到合肥。萬里召集了各高等院校的首腦們，聽取意見。在會上，大家熱烈討論了「民主辦校」的問題。

雖然萬里主持的「民主辦校」的討論沒什麼實質成果，但「民主辦校」的口號鼓舞了合肥各大學的師生們。科大學生們說，既然提倡民主辦校，那就不應該壓制學生們自由競選。一場蓄之已久的學生運動再也壓不住了。

康寧祥 東山再起

台灣成立反對黨衝擊大陸

這次科技大學響起學運春雷，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台灣成立了反對黨。

九月廿八日，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告成立，使中國台灣省進入了兩黨政治的階段。

國民黨官方對大陸廣播的電台，雖然對民主進步黨的消息嚴加封鎖，但這一重要信息經由美國之音、日本NHK和英國BBC很快傳到了大陸。中國民聯也在大陸派發了大批「中國之春簡訊」，向大陸人民傳達了這一信息。

以前，大陸人民只對台灣的經濟繁榮持敬佩和肯定的態度，對台灣的政治並無好感，也不表認同。這次台灣反對黨的成立，大大改觀

了大陸人民對台灣政治發展的見解。事實勝於雄辯，台灣有了反對黨，這說明，台灣的民主政治已有了突破性的進步。

一位科大的研究生說：「過去老說國民黨獨裁，現在台灣有了反對黨，而我們連基層選舉都由共產黨一手包辦，我們太落後了。」一位學成歸國的科大的年輕教師，在向學生們介紹海外和台灣的情況時，介紹了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和台灣黨外雜誌的情況。他說，大陸的學生們對台灣民主發展的好奇遠遠超過對英、美、日民主政體的關注。著名台灣旅澳政治學者、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邱垂亮最近也指出，他今年八、九、十月在中國大陸各地做旅行演講，大學生們最歡迎的講題是：「台灣黨外運動」。可見，台灣在民主化方面領先大陸，是台灣在祖國統一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有利籌碼。不少大陸人士認為，台灣應充分利用這個籌碼，促進中國大陸政局的演變。

改革停頓的刺激

中國科技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為，這次學運再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國內改革已陷於停滯狀態。經濟改革遭到陳雲——李先念——李鵬集團的扼殺，今年未見重要起步。更糟的是，全國範圍的工人怠工（由於停發獎金所致），使國營企業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今年中，趙紫陽等改革派鼓動起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但不幸在九月份北戴河會議上，遭到陳雲、胡喬木等保守派的強力抵制。改革停頓了，但物價却在一個勁兒的上漲，全國高等院校的師生員工，普遍存在無望感和茫然感。青年學生們歷來是社會改革的先導，他們隨時在尋找機會，以突破國內沉悶的政治局面。

「還我自由民主！」

十二月五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終於忍受不了學校黨委對人民代表選舉的包辦，在方勵之副校長的鼓動下，走出宿舍，在校園遊行。學生們高呼：「還我民主！」「還我自由！」「要求自由選舉！」等響亮的口號。

科大學生的大無畏行動，立即鼓舞了合肥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的學生們。科大遊行示威的學生們派出代表，到合肥各大學串聯，大家決定，在「一二·九」運動紀念日那天，舉行各校大學生的聯合遊行示威。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十二月六日，台灣增額國大代表和立法委



在台灣可以公開反對國民黨。這是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在就選時把一頭覆着國民黨黨旗的小豬推上講台。

員的競選順利結束。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兩黨競選。結果，剛剛成立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獲得了百分之廿二的選票。台灣兩黨和平競選的消息，經過外電傳到大陸，再一次鼓舞了安徽的大學生們，大家的視野豁然開朗。安徽大學籌備遊行的大學生們說，人家台灣都能兩黨競選了，我們這裡的選舉還由黨委一手操縱着，我們連自由選舉基層人民代表的權力都沒有，我們不能再忍耐了。

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愛國運動五十一周年紀念日。合肥市寒風凜冽，來自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的三千多名學生，不畏嚴寒，有組織地排着隊向安徽省委大樓進軍。大學生們高呼：「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不自由，毋寧死！」「要求民主選舉政府！」等口號。遊行隊伍來到省委大樓前，學生代表們紛紛發表演說，抨擊專制制度，抨擊貪官污吏，要求政治改革。學生代表還把要求民主選舉的請願信遞交給中共安徽省委。

整個遊行持續了三個多小時，沒有發生武鬥，中共安徽省委也未派出警察鎮壓。安徽大學和合肥工業大學的黨委，在遊行前曾對學生們進行了勸阻，但未能奏效。

武漢三鎮響應合肥

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們，在十二月五日校園示威後，不但與本地合肥市的大學生們串聯，而且用電話和書信的方式，向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發出呼籲，號召大學生們投入到爭取民主的鬭爭中來。

十二月九日那天，在合肥市三千大學生遊行示威的同時，武漢三鎮的大學生們也走出校

園，向湖北省委大樓進軍。二千五百多名示威者，由武漢大學和華中工學院等院校的大學生組成。他們呼喊着類似的口號：「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我們要民主！」二千五百多名示威的學生，在湖北省委大樓前，聚集了一個多小時。沒有發生暴力衝突事件。

十二月九日前後，武漢大學和安徽大學的校園內，還出現了鼓動性的大字報。大字報要求盡快實施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在中國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在這些學校的外籍訪問教授們認為，這些大字報的內容，充分顯示出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已經傳入大陸，並在青年學生的頭腦中紮根。

「中國之春」在兩地流傳

在向國內傳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多元思想的過程中，由中國民聯出版的「中國之春」雜誌和「中國之春簡訊」，無疑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根據中國民聯總部的統計資料，現在，留美的中國大陸學生和訪問學者中，每四、五個人中間平均就有一本中國之春雜誌。中國之春已成爲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中流傳最廣、談論最廣的中文刊物。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回國後，紛紛向同事、同學和親友介紹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至於「中國之春簡訊」，每月都有上萬份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大陸。

在武漢和合肥兩地，都有中國之春雜誌在秘密流傳。武漢大學和安徽大學的文科大學生，曾千方百計地托人從香港帶進中國之春和「爭鳴」等雜誌。一位讀過中國之春雜誌的武漢大學的學生說，他見到的中國之春雜誌，雖已十分破舊，但有人用紙把封面的破口處糊起來，內容還是被保護得好好的。

中國民聯長期策動

中國民聯自今年夏天起，即開始策動國內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九·一八」之前，中國民聯總部動員國內外盟員，向國內各高等院校散發了大量的傳單，鼓動民運風潮。傳單上寫道：「我們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等待了！我們要行動起來，發揚去年『九·一八』愛國民主運動的大無畏精神，……」，傳單中最響亮的口號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見「中國之春」雜誌四十一期六至六七頁）。

暑假期間，中國民聯總部組織，動員了一批留學生和華僑盟員回國，到各校串聯，為民運的展開做了一定的組織準備。對於身份可以公開的某些盟員回國的行動，中國之春雜誌會做過選擇性報導，如黃奔和張俠等（見「中國之春」四十一期和四十三期）。

民主運動，水到渠成。「一二·九」期間，火終於燃燐起來了。

火燒到北京大學

對於合肥、武漢兩市的學生運動，中國大陸官方的新聞媒介開始採封鎖態度。然而，官方封鎖不了外電的廣播和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們投寄到全國各高等院校的信函。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從外電聽到合肥、武漢的學生行動後，大為振奮。十二月十一日，北大校園出現了署名「中國科技大學『民主鬥士』」和「北大生物系」的首批大字報，贊揚合肥市學生爭民主的行動，讚揚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同志的大無畏精神。大字報號召北大學生發揚「一二·九」運動的革命傳統。十二日以後，更多的大字報貼到學校的佈告欄上。一張署名王紀剛的大



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十二月廿日參加遊行。

字報，明確要求首先在中國大陸農村舉行民主選舉，然後在城市舉行民主選舉。

一張大字報極富鼓動性語言，它寫道：「現在，全國到處佈滿了乾柴，一點就着。讓我們都做火種吧！」大字報號召學生們不要袖手旁觀，否則，中國永遠不會強大。

還有一張大字報，把不關心政治的中國人比喻成豬狗，因為他們只知道填滿肚子就算完事。這篇大字報標明了宿舍樓號和房間號，叫同學們前往討論。

生物系貼出的大字報則明確指出：「我們是人，要把我們當做人來看待。」

還有不少大字報抗議官方對新聞的壟斷，鮮明地提出要爭取新聞自由。

總之，爭取民主選舉，爭取新聞自由，爭取做人的權利，是北京大學大字報內容的主流。

，也是這場波及全國的大學生民主運動的內涵。由於北京大學正值期末考試期間，學生們考試壓力極大，暫時未有結隊走上街頭。

全國各地紛紛響應

正如北大一張大字報所講的，現在，全國佈滿了乾柴。只要有足夠的火星，即可造成燎原之勢。

中國科技大學的第一個火星，激起了全國一片火花。

十二月九日，富有民運傳統的湖南師範學院和湖南大學一千五百餘名大學生，在長沙市舉行大示威，抗議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不公平選舉。遊行隊伍高呼着合肥、武漢大學生們相同的口號：「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長沙是近些年學運的中心城市之一。一九八〇年湖南師範學院的學運風潮，也是因為官方壓制學生競選人民代表引起的。那次學運觸發了罷課、絕食和北上串聯、請願等一系列行動。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湖南師範等院校的三千五百名師生會因該校教師被毆事件，走上街頭，舉行過一次大規模示威。國內有人認為，富於學運傳統的長沙市大學生們，今後還會在民運中扮演更為突出的角色。

在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位於成都的四川大學、位於江蘇南京的南京大學，都貼出了大字報或小字報，響應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們的號召。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大學。一九八五年「九·一八」期間，不但貼出了大批大字報，還有上萬名川大學生上街遊行，在抗議日本「經濟侵華」的口號掩飾下，要求政治民主。然而，由於消息閉塞，外界只知道北京、西安和武漢

的示威，對成都川大的示威未予及時而詳細地報導。其實，後來我們了解到，那次成都的學生運動規模，並不亞於北京、西安和武漢。

深圳也動起來了

十二月十六日，國內大學生運動蔓延至經濟特區深圳。新建的深圳大學十六日有上千學生到市區遊行示威，抗議校方頒佈的二十條守則，守則規定學費上漲並實行等級收費制（根據學生在上一學期的成績分為三等，收取不同費用）。在深圳市區遊行的隊伍，也同時高呼「還我自由！」的口號。遊行隊伍中個別人還

攔截了汽車。

與此同時，深大校園內貼出了不少大字報，除抨擊校方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外，還號召學生們關心政治改革，爭取民主權利。

上海掀起巨瀾

學生運動愈滾愈大，十二月十七日，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起而響應。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交通大學的校園內，貼出了一批富於鼓動性的大字報。

大字報號召上海各大學的同學們應「向安徽和北京的大學生們學習」，走上街頭去爭取

政治民主和新聞自由。

同濟大學的大字報，特別對十一月份校方私下圈定所謂「學生勞動模範」的作法表示不滿。學生們說：「我們不能再蒙在鼓裡，我們要有發言權！」

學生們還貼出大字報，號召十九號走上街頭。上海市長、留蘇派人物江澤民（江曾在一九五五年被派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學習），害怕上海捲起風潮，立即到交通大學等進行勸止。這一壓，反而激怒了學生。

十二月十九日，復旦、同濟、交和華東師大等校三千人走上街頭，遊行到市政大樓。六百名學生並舉行了靜坐抗議。他們舉着的標語牌上寫着「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學生代表在市政大樓前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要求新聞自由和選舉自由。

廿日，上海大學生遊行人數增至上萬。「民主萬歲」的口號聲響徹人民廣場，震撼着市政大樓。學生派出代表，與市長江澤民會談，向他提出了四點要求：

- (一) 加速政治體制改革；
 - (二) 新聞自由；
 - (三) 承認學生們遊行爲「合法行動」；
 - (四) 保證遊行者及其家屬的人身安全。
- 江澤民答應了後兩者，但對前者表示不敢負責，要上報中央。
- 要求未獲滿足，學生們義憤填膺，他們準備籌劃更大規模的遊行。

黃浦江在咆哮

十二月廿一日，黃浦江咆哮了！

上海各著名學府的三萬多名學生，湧上街頭，高呼口號，散發傳單。大約有五萬多名市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市數萬學生舉着要求新聞自由的標語牌在人民廣場示威。

民和工人佇立在街道兩旁，向遊行示威的學生們歡呼。

這是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以來的最大場面。

學生們的遊行是井然有序的。復旦大學的學生們，以校旗為先導，以班級為單位，每班都有領隊人，整齊地走出校園。

自廿日開始，人民廣場和上海市政大樓前，日夜都是萬頭鑽動，人聲鼎沸，場面極為壯觀。

學生領袖們一個接一個地在人民廣場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他們號召：我們再不能做奴隸了！

數百名學生遊行到美國駐上海領事館，高呼口號，要求外電傳播他們的聲音，把他們的正義要求傳向全世界。學生們的這個舉動，是



十二月廿一日，聚集在上海市市委大樓前的人潮。

對官方封鎖示威新聞的強烈抗議。

公安部長趕往上海

上海的風暴，震驚了中南海。中央命令公安部長、留蘇派阮崇武連夜趕到上海（阮崇武曾在莫斯科汽車機械學院學習）。阮崇武、江澤民調兵遣將，派了上千名警察，阻止人潮湧向人民廣場。在混亂中，學生們曾和警察發生衝突。十二月廿二日，上海市委官方稱，有卅一名警察被學生們打傷。而學生領袖們說，是警察打傷了學生，而非學生打傷了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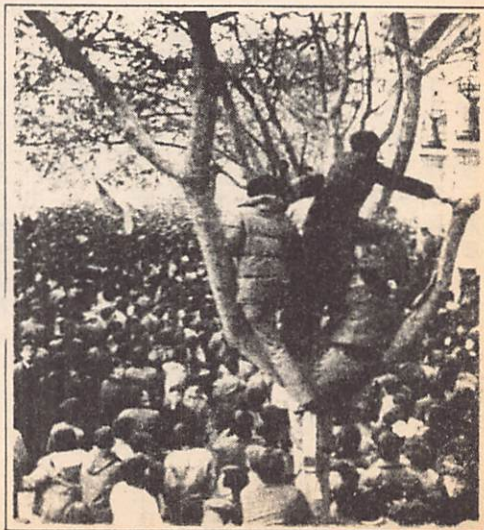
上海工人參加示威

十二月廿一日，即上海學生大遊行的第三天，富於光榮傳統的上海工人參加了示威行列。青年工人們成批成批地湧向人民廣場，與學生們並肩而戰。

中國歷來有句話，叫做「北京的學生，上海的工人。」指的是上海工人富於革命傳統。上海參與示威，是民主運動向縱深發展的重要一步。

示威工人們在人民廣場上發表演講，他們說：「學生們的要求，就是我們的要求！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時代來臨了！」

官方採取鎮壓措施後，上海民運開始進入穩健發展的階段。自十二月廿三日起，上海市街頭上的人潮開始減退。但廿三日那天，仍有三千多名大學生上街遊行；廿四日有一千多名學生上街。由於學生們對於新聞自由的要求未能得到滿足，復旦和交大的學生領袖們說，隨時都有再次爆發更大規模的遊行和全面罷課的可能。



十二月廿一日的上海人民廣場人山人海。

北京再也壓不住了

公安部長阮崇武剛飛到上海，北京的大批學生就上了街。北京，再也壓不住了。

自北大於十二月十一日貼出大字報之後，北京市委立即處於戰略狀態。市長陳希同要求各高校層層設防，試圖把學生們壓住。陳希同還公開發表講話說：「我個人反對北京的學生示威。」

由於受到校黨委嚴厲壓制，北京清華大學的部分學生不得不於十二月廿日南下上海，與上海學生們串聯，一起遊行。

十二月廿四日，北京學生們終於衝破了校方封鎖，走上了街頭。下午六時卅分，四千名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聚集在校園，高唱「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演講的學生領袖號召學生們衝出校園，用實際行動支援合肥、上海的學生。學生領袖們還要求選舉產生獨立的學生會。接着，大約一千名學生遊行到北京大學

，一部分學生遊行到人民大學，進行串聯，鼓動學生們走向天安門廣場。學生們邊走邊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西南響起春雷

民運風潮越滾越大，遍及全國，十二月十七日，西南響起春雷。雲南大學和雲南民族學院等院校的二千多名學生，高舉「民主萬歲」和「自由萬歲」的標語牌，在昆明市舉行示威遊行，並進軍到雲南省委大樓。

昆明學生的遊行，與官方操縱省人民代表大會基層代表的選舉有關。

昆明市的學生遊行時，大批警察設防，但未發生衝突。學生們揮動旗幟，向警察呼喊：「請站在我們一邊！」

穗寧津起而呼應

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們，早在十二月九日就貼出大字報，號召學生們響應安徽中國科大的學生運動。

十二月二十日，二千多名廣州各大學的學生們走向街頭，呼喊「要求民主」的口號。遊行自下午二時發動，晚十時結束。廣東省委的領導人被迫接待了遊行的學生代表。

十二月廿三日，位於長江沿岸的南京市，也有三千餘名大學生們上街示威遊行。南京大學和南京航空學院等院校的學生們，扛着「民主」、「自由」、「人權」的標語牌，與上海和北京的學生相呼應。人們高呼：「打倒專制！素以沉默著稱的天津市，十二月廿日終於

出現了民主的呼聲。南開大學貼出大字報說：「喚醒大眾及創造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社會，此其時矣！」

廿四日，三千名大學生在天津市舉行了自文革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示威遊行。

初步的勝利

中國科技大學發生學生示威遊行後，學運領袖、副校長方勵之發表談話，對學生們的行動表示支持。在方勵之與學生們內外配合、施加壓力之下，科大大黨委同意讓步，允許學生們自由提名省人大代表的候選人。

深圳大學的黨委負責人雖然對學生們遊行示威十分反感，但迫於壓力，已決定暫緩實施增加學費及其它的新規定。

上海學生舉行遊行後，學生領袖們一直與上海市長江澤民進行會談，迫其讓步。十二月廿二日，上海市當局透過官方電台和報紙，指控學生們打傷了卅一名警察。學生們聽後極為憤怒，他們要求上海市委當局更正不實指控，並保證不以此為藉口而逮捕學生。否則，學生們將舉行罷課並發動更大示威。在強大壓力下，上海市委當局於廿三日正式否認了官方關於卅一名警察被打傷的報導，並許諾不繼續逮捕學生。

學生們已從鬪爭中初嚐勝果。

爭取民主的政治內涵

國內學生運動方興未艾，正在深入發展之中。

此次學運與去年「九·一八」學運相比，有如下特點：

第一、如果說，去年「九·一八」學運披着一「愛國、反日」的外衣而行追求自由、民主之實，那麼，今年的學運則是直接的爭取政治

民主的鬪爭。

第二、在今年的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直接爭取的是選舉自由，這是一九八〇年大學生選舉風潮的繼續。爭取選舉自由，實質是向共產黨的權力進行挑戰。今後，如果中共仍然壟斷選舉，壓制人民群眾的競選自由，勢將激發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第三、此次學生運動提出的最響亮、最普遍的口號，是「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是一九七八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先鋒號京生思想的再現。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雖被鎮壓了，但她的精神經由中國之春的繼承和發揚，已在留學生和國內青年學生中紮了根。

第四、從現有資料看，此次大陸內學生民主運動的興起，明顯地受到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台灣反對黨成立的鼓舞。台海兩岸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和平競爭，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台灣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及其它民主勢力能夠更積極主動地把台灣民主化進展的實情輸往大陸，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必將獲得更大的啟發，民主運動必將有更大的發展。

讓我們都做火種！

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曾號召同學們去做火種，點燃那佈滿全國各地的乾柴。

據剛剛接獲的消息，國內不少人認為，觸發這場學生運動的直接動因，除官方壓制學生競選外，還有騰飛的物價。北京、武漢和合肥等地的物價，入秋以來不斷上漲。如豬肉漲到三元一斤，牛肉漲到四元、五元一斤，雞蛋漲到二元左右一斤，等等。物價雖漲，但人們的工資未漲，獎金也不上升，城市老百姓的怨言極大，用「怨聲載道」一語形容，正是恰如其

分。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們的生活標準，尤其是伙食標準明顯下降，學生家庭中對通貨膨脹的不滿，也直接影響着學生們的情緒。這些，都在尋求管道發洩。

當上海的大學生們上街遊行時，路邊有數萬市民、工人和幹部圍觀、支持，場面十分壯觀。有的工人和市民們對遊行的學生說：「你們遊行遊得好，物價漲得我們都快吃不住了，你們應該反對通貨膨脹，反對物價繼續上漲。」合肥學生遊行時，也有大批市民支持。

上海合肥的工人和市民情緒，是帶有普遍性的。如果當局不採取鐵腕措施管制生活必須品的物價，一旦工人和市民捲入學生運動，將會造成更大的社會風暴。

由容忍到壓制

對待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北京官方一開始採取容忍態度。國家教育委員會發言人於十二月廿日就學生運動對新華社記者說：「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遊行的自由。只要不觸犯法律，學生在遊行中理所當然不會受到壓制。」然而，隨着學運的迅猛發展，官方態度迅速扭轉。十二月廿一日，上海的官方「文匯報」和廣播電台，開始指責學生示威破壞安定團結，妨礙交通。并說學生示威人羣有壞人乘機破壞，給鎮壓學生埋下伏筆。公安部長阮崇武則下令上千武裝警察阻擋學生。與此同時，交通大學等學院的黨委，強迫「打傷警察」的學生出來自首，校黨委還以「畢業分配」向學生進行威脅。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于十二月廿三日發表論「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警告學生運動「可能被個別別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所利用。」

據北京高層透出的消息說，鄧小平已對迅猛發展的學生運動失去耐性，他已考慮實行嚴厲的鎮壓措施。

新華社十二月廿六日正式報導承認，上海官方當局已逮捕了若干人士，包括鑄造廠工人王貴山和公共汽車修理工薛文甄，罪名是「破壞公共秩序及故意破壞公家及私人財物。」

學運步上組織化

正在北京高層放出鎮壓空氣的時候，上海的大專院校的學運領袖們不畏強權，于十二月廿三日正式組織起來，成立了「上海大專院校聯合民主促進會」，還擬在各大學成立分會，協調整個上海市的民主運動。

「民主促進會」的成立是對官方的巨大挑戰，如果學生們迫使官方容忍它的存在，將是對結社自由的巨大貢獻。



菲律賓人民的微笑革命。

學習菲律賓模式

這次民運，還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注目的口號，即：向菲律賓學習，結束專制制度！北京、上海、天津的大學生們說：菲律賓人民能，我們一定能！台灣人民能，我們更應該能。

目前，大陸民運領袖們正在醞釀菲律賓模式，正在與工人、軍官們串聯，以便在未來民運高潮到來時，造成學生帶頭——工人、市民跟進——官方失控——軍方倒戈的局面。

迎接大變局的到來

本報導截稿于十二月廿六日。目前，民運還在繼續向縱深發展。

這次民主運動，只是初試啼聲。中國革新與守舊兩派的最後決戰，還在前面。

一般相信，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會在鄧小平辭世後出現更加蓬勃的局面，其原因有二：一、鄧辭世時遺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各派爭權時，可能顧不了學生運動。

二、鄧辭世後，中央某一派可能會明顯受壓。受壓的一派如果想到一句古老的中國政治術語——「民心可用」，則會向民主運動和民間力量公開伸手。

總之，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當前都在等待鄧小平辭世之時機。在此之前，各方都會小心翼翼地行事。

在這種情況下，民運人士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組織準備，以便有應付突變的組織能力。

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都做火種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大家聯合起來，形成集體的力量！

——民運領袖方勵之在內部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摘要）

中春編輯部：

國內大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如燎原之勢，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火，起於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而真正的點火英雄，是著名的改革家、國內青年四大導師之一，現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方勵之，男，五十一歲，著名天體的物理學家，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份子，受盡摧殘。前幾年，他被恢復名譽，並被提為科大的副校長。一九八六年三月至七月，他應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之邀，與夫人——北大教師李淑嫻一起，赴美進修。七月返國後，方勵之應邀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出席

了一些演講會和座談會，宣傳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觀念，鼓動青年學生們追求民主的激情，在輿論上堅定不移地支持黨內高層改革派。

方勵之是趙紫陽和胡啓立的好友。國內普遍認為，方勵之的一些開放言論，說出了趙紫陽等高層改革派想說而不便說的話。

我所提供的，是最近在國內廣為流傳的方勵之在今年一次內部座談上的發言摘要。由於多次傳抄和反復考貝，原整理稿有些地方已模糊不清（包括日期）我不得不重新整理。如與方勵之講話原意有出入，由我負責。

也有人說，這是方勵之在數次內部座談會上發言的綜合。

為理解國內這場民運的背景和方勵之同志的作用，我將此稿提供給貴刊發表。我希望海外能掀起巨大的輿論，聲援方勵之同志、聲援趙紫陽總理，聲援國內的學生運動。以往的經驗表明，海外輿論愈大，國內民主人士的安全系数就愈大。如果方勵之同志遭到中共保守派的迫害，請中國民聯發動世界輿論，予以聲援。

民主萬歲！

剛出國的留學生 鄭立雲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

改革已殺青

方勵之同志講：大家都很關心經濟改革。今年（一九八六年）是改革調整的一年，叫調整，實際上就是暫時剎車。已經結束的工資改革是完全失敗了。工資改革的原先目的是要打破大鍋飯，但結果却形成了一種更高層次、更整齊的大鍋飯。

舉例來說，城市經濟改革實施後，北京出租汽車司機有的一個月可賺五、六百元，一下子引起了北京公共汽車司機對低工資的不滿（

月薪一百元左右——編者），於是紛紛提出辭職去開出租汽車。公共汽車公司很強硬，對司機說，你可以走，但要交二千塊錢的培養費。也真的有人交了錢，辭職而去。隨之而來的是整個公司工人開始怠工，因交得起二千元的司機畢竟有限，而且，售票員怎麼辦呢？結果，北京公共汽車要麼不開，要麼一開十輛一條線緩緩而來。迫於壓力，最後給每個工人每月加了三十元了事。

再如，郵局工人怠工事件。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份左右，從北京發往本市信的信，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收到。這事最後也是通過給每位職

工塞了一些鈔票才疏通了郵路。

還發生了商店營業員怠工的事件。北京冬天菜油是結凍的，必須頭一天把油桶搬到室內解凍才能出售。但是，營業員就是不搬，造成有油買不到的局面。營業員就是鬧工資嘛！這就是我說的工資改革造成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大鍋飯。對許多人來說，工資的增長幅度遠低於物價的上漲，人們的積極性不但沒有提高，反而受到進一步打擊。

一些怠工事件雖然通過經濟手段暫時解決了，但問題的根源沒解決。這就觸發了學生運動。

物價飛漲，特權橫行

學生運動首起於去年的「九·一八」。這場運動是北大大學生以紀念抗日戰爭為名發起的，但目的並不在「反日」。當時物價飛漲是最直接的原因，因為它直接影響了學生們的生活。再有就是以培養第三梯隊為名突擊提幹，其中許多是幹部子弟，有些人坐直升飛機連跳幾級。這種世襲制引起了學生們的強烈不滿。「九·一八」示威遊行當天，北大校園一遍遍地播放北大校長丁石孫的講話，說是有壞人破壞搗亂，大家不要上當受騙。同時，還出動了軍警嚴密監視學生。這使人們想起七六年「四五」運動時天安門廣場反覆播放市委書記吳德講話的情景。

薄一波在關於北大大學生鬧事的講話中說：「共產黨和學生的關係就是老子和兒子的關係，打錯了也沒有關係。」這話引起了學生們的強烈反感。許多學生說：兒子也應該有自己的自由！有的學生乾脆說：他（指薄一波）的兒子教育得不怎麼樣嘛！

我聽李淑嫻（方勵之夫人，在北大任教——編者）同志說，事後北京大學學習中央對這場運動的決定時，各個黨支部全都反對中央的說法。北大大學生遊行時，北大老師雖沒有出面，但面對中央的決定，他們說：「如果你們要處理學生，我們就公開站出來！」這樣，確實沒敢對學生下手。

守舊力量強大

學生運動是得到很多支持的。「九·一八」遊行時，幾百名北大大學生去天安門廣場，路

邊圍觀的群眾有十幾萬人。事後許多人說：「還是你們學生好，你們一鬧，他們就不敢亂漲價了。」還有的說：「你們沒牽掛的在前面走，我們有家有小的跟在後面。」學生運動是起到一定效果的，研究生的助學金增加了，中央專門下了一個文件，指示對於越級提拔幹部一定要「慎重考慮」。

我認為，如果學生真的有事要鬧，我們當校長的也管不了。如果沒事，讓他們鬧兩天也就沒事了。

上海市大學生去年十二月廿一日街頭示威。圖為學生隊伍走在南京路上。

學生們舉着「未來屬於我們」的標語示威，有這麼多可愛的青年，中國定有光明的未來。



去年十一月，我應邀到北大作報告（此報告登在中國之春四十二期上——編者），在報告中點了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的名。事情是這樣的：去年十月在美國紐約州召開了一個國際同步輻射加速器會議，中國共有廿四個名額。同步輻射加速器國內僅有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我們科大兩家在搞。說來很氣，科大和高能所各分得五個名額，其餘十四個名額都被游手好閒之輩所佔，其中就有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混在隊伍中到美國逛了一圈。像這樣的副市長回來後（當時張百發尚在美國）就該辭職

！我講完這話，第二天就回到合肥。同時，中國科學院的電話打到了科大校長管惟炎同志處，要我向北京市委道歉。管惟炎當然不予理睬，因為，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這就觸怒了谷羽（胡喬木的夫人，科學院的行政官僚），胡喬木公開說：科大領導班子是哪個司令部的？這裡，我們又聽到了文革的語言！當時，學生運動正在風頭，尋根求源，自然找到了我。薄一波說什麼：「方勵之的講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有的話比學生還過激。」我則說：「我的話並沒什麼過激，你張百發佔了我們科大的名額，我當然要說。你懂同步輻射嗎？要不咱考考你！」

我原訂於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出國，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進修訪問。但去科學院辦護照時，科學院的領導說：「你的問題沒完，不能出國。」科學院的領導是很忙的，但我去辦護照時，盧嘉錫、周光召（科學院院長和黨委書記——編者）都到了，要我認識問題。我說：「我沒什麼好認識的。」於是，出國被卡了。回到合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黃璜找我談話，並說，上面叫我黃璜怎麼做我就怎麼做。我想，我反正當時也沒事，叫我去，去就是了。當時各省委坐鎮各大學，做學生思想工作。安徽省委的重點就是科大，因為穩住科大就可以穩住安徽。省委開各種座談會，向學生們宣傳黨的政策，這種座談會，都有些「進口貨」吃。有的學生說，現在是「上頭吃緊，下頭緊吃」。（抗戰時，老百姓罵國民黨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編者）十二月七日我們科大開紀念「一二·九」大會。那天，正巧科大研究生們請我去講物理學中的哲學問題，我沒有參加那次大會，慶祝「一二·九」的大會開了一半，省委的領導們擔心學生們沒看

到我與會而猜疑整我了，急忙把我從哲學討論會上拉去大會會場與同學們見面。

後來，胡啓立同志在中南海接見了我，和我談了一個下午。他說得比較實事求是，說現在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遇到許多困難。最後，胡啓立當場拍板：三月一日出國。這樣，我和李淑嫻同志才得以出國。我出國後，看到楊獻珍（中央高級黨校前校長，大守舊派——編者）的一篇文章，說某大學副校長怎樣怎樣，把我批了一頓。我認為，這樣的人沒有必要和他爭，都九十多了，把人氣死怎麼辦？

至於說到中國當前的言論開放程度，現在至少在黨支部會上已能公開「罵罵」了，但見諸於文字的還很少。新聞、報刊是喉舌，沒什麼自由言論可言。北大學生請歌星、舞星來校表演，黨委可給錢。但要錢辦刊物，是一分也沒有。學生自己出錢印，沒有黨委支持則列為非法刊物。

改革缺乏理論

經濟改革走走停停，政治體制改革更是如此。個體戶小打小鬧沒人管，但私人辦企業辦大了，上面是一定得派黨支書來的。深圳實驗大學已被取消了，原因就在它不設黨委。從現在的情況看，不是沒有再倒退的可能性。儘管我們已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性，但事實上我們已不止一次地犯文革類似的錯誤，只是每次出現的形式不同而已。

談到深圳特區，可以說是成功的。深圳特區的目的是對外開發，產品外銷，但事實上，在深圳的國外投資很少，產品多數內銷，是對內開放。

現在，改革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缺乏對理論的研究。我們仍是一個意識形態取決定作用的國家，理論問題不解決，改革根本無法走得通。另一方面，經濟問題更是沒人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最高級的經濟問題討論會所討論的問題的深度，和我們日常討論的深度沒多大區別，只是一般性地提出問題而已。老一輩革命者中，可以說是沒有一個真正懂經濟學的。

知識份子的責任

我認為知識份子應該有一種社會責任心。在這方面，歐洲知識份子比美國知識份子強得多，他們有一種歷史使命感，對世界大事予以關注和討論，他們認為只懂自己業務的人只能稱為技術人員或專家，不能稱為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我們也應該有這種知識份子的意識，因為至少我們還希望中華民族不被歷史所淘汰。

知識份子要團結起來，才能形成力量。現在文藝界情況很好，沒有人敢隨便攻擊作家了。因為，作家們認識到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批了別人自己也保不住，所以大家聯合起來，形成一種集體的力量。而科學界則差得多，風氣也不大好，往往看到什麼人要挨整，大家就一起去攻擊他。現在，雖然有很多知識份子做了官，但其中很多人被收買了，再也不站在知識份子一邊了。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到自己有社會責任感，有一個要追求的理想。

談到自由、民主和人權，這些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不獨屬於資產階級。我要強調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是爭取來的，不爭，就永遠不會得到。（文中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保衛方勵之

中國科技大學示威學生的心聲

(國內) 翟抗波整理

整理者按：科大學生示威點燃了合肥民運之火。我有幸在科大學生示威後，與參加大示威的一位科大二年級學生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談話。話雖不長，但真實反應了爭取民主的大學生們的心聲。我記錄下來，托即將出國的同志帶出，供海外參考。記錄未經被訪者過目。「問」代表整理者，「答」代表那位科大二年級學生。

問：你們為什麼要遊行示威？

答：爭民主啊！爭選舉的民主權利。

問：你們是怎麼鬧起來的？

答：我們的選舉和被選舉權被校黨委剝奪了。為什麼候選人都要校黨委圈定？為什麼我們學生不能推選自己的代表（指安徽省人大代表——編者）？聽說十一月底萬里到了合肥，將各高校的頭頭叫去開會，討論民主辦校問題。我們學生們原以為這次會議之後，學校內民主氣氛更濃些。沒想到，會議後校黨委繼續壓制學生們自由選舉的合理要求。於是，十二月初我們就鬧起來了。

問：你們的副校長方勵之不是挺民主的嗎？

答：是的。但他主不了黨委的事。提起方校長，我們學生們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那真是好樣的，他支持我們學生，我們也都支持他。將來歷史要寫這次學生運動的領袖，應該是方勵之。他的幾篇演講稿雖然不能公開在報刊上發表，但在我們學生中廣為流傳。有錄音帶，也有手抄本。讀起來真帶勁，喚起了我們的激情。

問：方校長參加了你們的遊行嗎？

答：他本人不便來。但在十二月五日遊行示威前，我們去問方校長民主選舉的權利應不應該受到剝奪，他很支持地說，民主選舉的權利是憲法賦予的，什麼人也不能剝奪。遊行後，他又發表談話，肯定我們的行動是愛國的表現，是關心改革和支持改革的表現。當然，他也告誡我們要注意策略，不要盲動，不要被那些反對改革的人抓住把柄。

問：聽說安徽省委內有些人很恨方勵之，聲音早晚要整他。也有傳言說，方很危險，可能隨時被捕。你認為怎樣？

答：我們也聽到了這種傳言。何止安徽省委，連中央都有人恨他，如胡喬木、鄧力羣之流。但我們想，保守派可能一時還不敢下手，

方校長的羣衆基礎太大了。如果要抓他，我們科大學生一定鬧翻了天，我們會去衝省委要人。

問：方勵之在教師中聲望如何？

答：聲望很高。一位青年教師稱他為中國的薩哈羅夫。依我們看，他比薩哈羅夫還有鬥爭水平。

問：溫元凱呢？

答：溫元凱也很棒，聽說他要去香港開會。我們科大三個改革家，一個是方勵之，一個是溫元凱，一個是校長管惟炎。比起其他兩位，方校長更缺少些官方味，更敢講。

問：我聽有的學生說，你們科大學生們對台灣的選舉很感興趣。你也關心台灣的民主發展嗎？

答：當然關心。我們學生們天天收聽美國之音。從美國之音我們知道了台灣已成立反對黨，前不久舉行了兩黨競選。這真帶勁！我們科大的學生以前聽說台灣有許多民辦的可以罵國民黨的雜誌，現在又聽說台灣有了反對黨，很受鼓舞。我們私下議論說，看來蔣經國比鄧小平偉大。我們太窩囊了，經濟上這麼落後，政治上這麼愚昧，不鬧鬧，解脫不了我們的苦悶，衝不開沉寂的局面。

問：你父母支持你參加示威遊行嗎？

答：他們在外地，管不到我。他們常來信，叫我安心學習，少管別的事。他們在文革中被整怕了。可是，他們來信中，今天抱怨這個漲了價，明天抱怨那個漲了價。我看，他們也希望我們學生們站出來講一講，鬧一鬧。但只是希望別的學生鬧，不讓我參加。那怎麼行？都不讓自己的孩子參加，還有誰能上街？

問：老百姓對你們的示威反應如何？

答：我們「一二·九」大遊行那天，不知你去了沒有，馬路兩旁站滿了圍觀的人羣。我

看見有人在向我們鼓掌。

問：學校黨委整你們學生了嗎？

答：現在還沒有。校黨委已讓了步，同意學生們自由參加競選。我們勝利了！

問：你們真的以為今後不會再有什麼事了嗎？

答：鬥爭總會有反復。我們私下議論說，黨委今後可能會整人，會整黑材料，會在畢業

分配上卡運動的積極份子。我們已做了思想準備。大家說，誰也不做軟骨頭，一人挨整，大家都站出來保護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特別專題 大陸民運·狂瀾驟起

就國內大專院校學生要求民主、自由 示威遊行，致國內同學的聲援信！

親愛的北京、武漢、合肥及全國各大學的同學們：

你們近日在北京、武漢、合肥等省市舉行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遊行，聲振中外，引起海外中國同學、華僑和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

十二月五日及九日，安徽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的三千多名同學，高舉着「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標語，上街遊行，要求中共不要延緩政治改革，使中國走向民主化。遊行隊伍一路高呼民主口號，行至省政府大樓前。十二月九日，武漢市武漢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校的兩千五百多學生，在武漢市省政府門前舉行示威遊行，學生們高呼「還我自由、實行民主」等口號。據報導：十一月中旬以來，長江沿岸各省市均展開了一九七八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對中共介入地方人民代表選舉、幹部不正之風等提出強烈抗議。幾日後，北京大學的同學們在校園內張貼了大字報，呼籲同學們上街遊行，為民主鬥爭。大字報說「中國是一堆乾柴，只需一點點火種把它點燃。奮起吧！同學們，做一個火種吧！」

從今年五月開始，中國大陸廣泛出現了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的言論，形成了強大的輿論

聲勢，這說明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已經在全國上下，社會各個階層行成共識。民主，是中國人民在一百多年振興圖強的頑強摸索中，找到改變中國落後狀態的最好途徑。無奈，在人民強烈的要求面前，中共黨內保守勢力仍然執迷不悟，採取各種手段對政治改革進行壓制和阻撓。今年九月中共的黨代會，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無聊會，對尚未開始的政治改革，不僅沒有提出任何實際方案，反而進行了種種限制和拖延。這種阻礙中國政治進步的愚蠢作法，引起全國人民的失望和憤怒。本次全國各大城市廣泛的學生民主示威運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

歷史無數次說明，青年學生是社會的良心，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變革的先聲。如果說，去年九一八北京、西安等地的學潮，還有一些民族主義色彩的話，今年的學生示威活動，便已不再採用什麼藉口，徹底地、公開地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號。國內同學大無畏的精神和壯舉，令海內外中國人感到巨大的振奮和由衷的欽佩。我們在此，僅向你們表達海外留學生對你們的敬意和聲援。

當今的時代潮流就是民主。在中國的另

一部分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已經成立。台灣人民的長期努力，已使當政的國民黨做出了明智的讓步。台灣最近的大選說明，台灣已開始走上政黨競爭的民主政治軌道。台灣人民的民主試驗，證明中國人不是民主盲，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進展，將會對整個中國大陸造成越來越強的衝擊波，而國民黨的轉變也應使共產黨有所醒悟。阻擋民主潮流對中國的發展，對中共的前途，都是沒有好處的，那將會造成中國政局的不穩與人心的動蕩。到頭來，阻擋民主潮流的人將會自食其果。

同學們，我們大家深信，只有步向多元化的民主社會，中國才能崛起，中華民族才有希望，民主是歷史賦與我們當代青年的責任。讓我們為歷史的責任奮勇進取，在不同的條件下，以所能採取的各種方式，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向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國內同學致敬！

部分中國留美學生和訪問學者
中國民主聯總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制訂中期目標 · 注重民運策略

(中國民聯) 王炳章

十二月五日，位於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點燃學運火種，烈火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大城市。這次波及全國範圍的民主運動，向人們揭示出，中國已進入革新勢力與守舊勢力總較量的前夜。

隨着運動的廣泛展開，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是制訂中期目標的問題。

民主運動一般有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有改善伙食、修改學校當局頒佈的某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以及要求參與本屆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等等。短期目標所涉及的問題，往往是學運的觸發因素，一般而言，是比較容易達到的。學運的領導者和鼓動者，要善於察覺和利用各種觸發因素。

民主運動的長遠目標是成立合法反對黨並最終建立民主政體。缺乏長遠目標的民主運動容易迷失方向。

短期目標和長遠目標都比較容易制訂。然而，要達成長遠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通過攀登一個個階梯而實現。這一個個的階梯，就是所謂的中期目標。

制訂切實可行的中期目標，是民主運動持續開展的重要保障。如果中期目標訂得太低、與短期目標差不多，即使目標達到也沒有什麼

成就感，不會起到激勵羣衆向下一個目標邁進的作用，羣衆運動則出現暴起暴落的現象。另一方面，如果中期目標訂得太高，羣衆長期奮鬥而達不到目的，則會大大挫傷羣衆的情緒，以致造成一蹶不振之後果。

針對新近發生、席捲全國的學生民主運動的聲勢和深度，我們建議的第一個中期目標，是創辦獨立的民辦校園刊物。這次，全國學生普遍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然而，新聞自由可大可小——大到獨立的全國性報刊，小到學校裏的黑板報和大字報。如果不把新聞自由具體化，這一要求就會流於口號。出版由大學生和研究生獨立創辦的校園刊物，可做為爭取新聞自由的第一步。有了獨立的校園刊物，學生運動就有了自己表達意見的陣地，就可以與全國各大專院校交流情況，從而打破官方對新聞和言論的壟斷。像方勵之、王若水和王若望等人的文章和講話，如經過校刊合法傳播，其影響將比手抄、拷貝和秘密流傳要大得多。

我們建議的另一個中期目標，是建立獨立民選的學生會組織。現在各個大學的學生會，基本上是官方旨意的傳送帶，不能代表廣大學生和研究生。學生會不是政權機構，學生們在努力奮爭下，官方是有可能開放民選的。民選的學生會在平時可反映學生們的意見、組織聯

誼活動；在民主運動出現高潮時，它還可以發揮協調的作用。

根據目前學運的聲勢和實力，以上兩項目標經過奮鬥是可以達到的。

第二個要談的是注重民運策略的問題。

要注重的民運策略有很多，針對上海這次數萬人上街的情況，我們在這裏只談四點。

第一點：要在口號上堅定不移地支持趙紫陽等黨內改革派，反對陳雲、彭真和胡喬木等黨內守舊派。

第二點：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示威遊行、演講甚至罷課，使運動開展得有理、有利、有節，不要採取激烈手段，不要給黨內守舊派的鎮壓留下把柄。

第三點：要緊緊地抓住中期目標不放，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將運動有韌性地開展下去。

第四點：組成宣傳隊，走出校園，到工廠去，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爭取工人的支持。一旦工人參與進來，運動的持久性將會大為增加。

這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其波及的地域範圍甚至大於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預示着社會大變局的到來。我們認為，這次運動只是民主力量在新舊勢力總較量的前夜初試啼聲而已。

在北京的遊行示威中，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說，菲律賓人民能辦到的，我們也應該辦到；台灣人民能夠辦得到的，我們更應該辦到。只要我們認真總結這次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在可見的未來出現下一次民運高潮時，民主力量將進一步發揮出她的實力。

未來屬於我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

牢記免死狗烹的教訓

——給國內大學爭取民主的人們

(中國民聯) 林樵清

八六年十二月五日，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數千學生首先在校內舉行示威，武漢大學也起而響應。四天後，兩地各有數千名學生上街示威，高呼：「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爾後，在全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大學也開始響應，到處貼大字報要求同學們繼承北大革命傳統，參與民主討論。其後深圳、上海和昆明的大學生也起來響應。

在政治改革聲中沉默了兩個多月的鄧小平，在合肥學生示威後突然露面，並兩次發表講話，強調政治改革一要大膽堅決，二要謹慎，並且要堅持到下一代，並以他的壽限定下時間表，要求在他有生之年看到政治改革有個頭緒。有在為這次學生運動打氣の意味。

這次學生運動較以往自發的學生運動有三點不同的地方：(一)是到現在為止，主要推動學潮的人物方勵之、溫元凱等尚未被捕，不同於以前北大學生張曉輝和李載安自動起來批評中共的一黨專政，立即被捕，至今尚未釋放；(二)是在國外由共產黨支持的報紙，一反以往對國內學生爭取民主運動的消息避之若蛇蠍的態度，開始大報特報，且以頭版頭條和社論的方式出之，並加以肯定和支持。(三)是如前所述，鄧小平在合肥學生示威後所發表的講話。而中國

的公安人員也因為鄧小平的這個講話，不敢對示威的學生採取過激的暴力行動。因他們摸不準上層權力鬭爭的真相。

從前述的種種跡象來看，有人推測，這次學生運動可能是中共中央其中一派一次有組織的行動，而在幕後牽綫者，可能就是鄧小平本人。而鄧小平這樣做，是有前例可尋的。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藉着一班青年民主人士所發起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向當時的凡是派進行了衝擊，鞏固了他的地位；後來凡是派垮台，鄧小平終於掌握實權。沒多久，鄧小平來個狡兔死走狗烹，把魏京生、徐文立等一班爭民主的人士，投入大牢。

同樣的例子也在台灣發生過。在六〇年代中，蔣經國鑑於讓他接班的阻力太大，乃利用一班由青年學者和學生組成的大學雜誌社，以及後來組成的台灣政論，向保守派衝擊，要求政治改革，並且藉此提高自己聲望，終於讓他順利達成接班的目的。而大學雜誌及台灣政論也就改組或銷聲匿跡了。內中諸人隨後也遭到各種不同的命運。有的被捕，如黃華；有的投奔中共，如陳鼓應；有的進入黨外，起來和國民黨進行抗爭，如許信良；有的遠赴海外，如丘宏達；也有的乾脆進入國民黨內做官，如關

中。

翻開中國歷史，這種免死狗烹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使中國知識份子統治者的眼光中幾乎只等同於走狗，成了一個被利用的階級，也造成了他們之中許多人悲慘的命運。

今天，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遭到了困難，他終於意識到：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是行不通的。這其實也是中國之春一貫的論點。但怎麼樣才能打擊陳雲這班阻撓政治改革的保守派們？聞聲鼓而思良將，於是再度祭出了學生運動的這張法寶。希望能藉此消弭保守派的氣餒，幫助改革派突破難關。

鄧小平要改革政治的苦心我們可以了解，但他以前對民主人士的作法和中共以往一貫權力鬥爭的殘酷性，却不由得令人心寒。



北京大學學生十四日在校園內觀看一張要求民主的大字報

在此，我們呼籲國內大學生們要特別小心。

。爭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不要再被利用了；可是我們也不要因為怕被利用，就退縮不前。因為要爭取中國走向民主，是我們的大目標，在這大目標下，一些小顧慮是可以暫時被放在一邊的。鄧小平可以利用我們，而我們也可以利用他所創造的這種情勢，把中國推向民主的道路。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幫助鄧小平打擊保守派，把這場政治改革進行到底；另一方面也要特別注意中國政情的發展。萬一保守派佔了優勢，或萬一鄧小平改變了心意，和保守派開始妥協，那時就有可能再來個兔死狗烹的局面。

爲了防止爭取民主的人士單方面的被利用，我們建議這些民主人士能夠組織起來，形成團體。因爲團結就是力量。並且在組織的過程中，防止被分化。然後將運動迅速推展到一個中共不能控制的程度。如此才能持久，才能壯大，也才能安全。

如果前述種種都難以或要持續很久才能達成，此時爭民主的人士仍不應氣餒，還應再接再厲。但在爭取的過程中，就要格外當心。萬一情況有異，此時爭取民主的人士就應該採取迂迴戰術，或隱蔽發展；或來到國外，再把民主思想傳播進去。總有一天，這股思想會滙爲洪流而把專制制度沖垮的！但無論如何，在這場政治改革的鬥爭中，我們不想再看到中國又出現幾個類似魏京生和徐文立悲慘下場的人士了！

鄧小平對政治改革講話中所強調的兩點，我們希望也能應用到這場爭取民主運動的本身。那就是一要大膽堅決，二要謹慎。

中國的知識份子到了應該跳出兔死狗烹命運的時候了！

特別專題大陸民運·狂瀾驟起

中共應學會容忍民主運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去年十二月內，中國大陸全國十多個省市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引起海內外華人和世界輿論的熱切關注。本次學運的主要目標是要求中共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和爭取中國實現人民的民主、自由等公民權利。學生們對國是的關心是可敬的；他們的主張是正義的；他們的行動是正當的，是符合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的。對這樣的學生運動，海外各界華人應予支持和聲援。

由於中共建國後三十多年一直實行一黨專制，無視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的正常化民主生活及人民應享有的自由、人權都遭到了極大的蹂躪和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學生運動，還將有助於中國大陸民主環境的建設和公民自由、人權觀念的樹立。

中共官方在初期對幾個省市的大學生示威活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容忍，頗令人欣慰。然而，隨著勢態的繼續擴大，人們擔心的緊張局勢正在出現，嚴峻的對峙與衝突的危險有上升趨勢。十二月二十日，據外電報導上海已有八十多名示威學生被捕，警察與學生之間，發生了對抗衝突。

對此嚴峻局勢，願中共官方以大局爲重，繼續保持冷靜態度，遵守憲法，避免局勢出現惡化。如逮捕學生一事屬實，應儘快釋放所有被捕示威學生，以免激起民憤，造成第二次天安門廣場式的流血衝突事件。

中共理應珍視廣大學生青年關心國是和政

局的熱情。對於學生們指責的黨方干政、左右人大代表選舉的政弊應公開糾正，對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應從速予以答復。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應果斷決策，順應民心。只有這樣，全國範圍的學生運動，才能保持和平方式，成爲中國向政治民主化方向發展的推動力量。

筆者亦希望學生們在運動中保持和平、冷靜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不要爲中共黨內保守派企圖鎮壓製造口實。建議各地學生儘快成立全國性協調機構，加強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提出短程和中程政治目標，使本次學運獲得更多的實際結果。

中國的政治在文革後這些年中，已經有了一定的進步。這些進步的取得，除中共改革政策的因素外，也是中國人民反覆爭取，不短較量，長期積累的可貴結果。如果這次學運勢態惡化，不僅將造成流血和生命損失，亦必然會使幾年來積累下來的有限自由和民主毀於一旦，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將會出現一次大倒退。這樣的結局是海內外各方所不願看到的。故筆者希望中共官方和學運方面，都能保持冷靜，避免暴力衝突的發生。

民主是需要妥協的，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內涵和特徵。基於中國的現實，希望中共領導層、學生以及廣大人民，通過此次學生民主運動，學得民主政治的運作、氣度與習慣，使中國大陸能夠有一個正常化的民主生活。

四歲堪^尚幼稚，前途仍^在光明

中國之春創刊四周年 中國之春英文版發刊 慶祝酒會散記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 馳 遼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紐約已是隆冬時節，但這一天，天氣奇怪地有些暖和。當晚六時，為慶祝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四周年暨中國之春英文版發刊，中國之春雜誌社在紐約中國城孔子大廈交誼廳，舉辦了慶祝酒會。

交誼廳裡佈置得一派節日氣氛。中國之春雜誌，從第一期到第四十三期，一字排開，掛滿了一面牆壁，象徵著中國之春走過的一個個艱難的腳印。對面牆上，掛著「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多元」五大大幅標語，招示著中國之春堅定的政治立場和信念。大廳中央，是友人們獻來的花籃，鮮花蕩漾著春天的氣息。

紐約各界人士共有一百多人參加了酒會。其中學人、教授主要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學界泰斗夏志清，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歷史學家唐德剛，正在紐約度假的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教授孟德聲，孟菲斯州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孫隆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東亞人權協會會長司馬晉(JAMES SEYMOUR)，發展與環境研究會總幹事寧明傑先生等；文藝界出席的人士有：著名女作家叢甦女士、作家兼政論家劉添財(阿修伯)先

生，中國大陸作家趙繼康女士、魯人先生等；新聞界人士有：前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周天瑞先生，前「華語快報社」社長鄭心元先生，「娛樂周刊」主編李勇先生等；中國問題專家和政論家司馬璐等也出席了酒會。

出席酒會的僑界人士有：廣西同鄉會副會長莫利人女士、美國共和黨亞裔總黨部主席陳本昌先生、皇后區華人選民協會理事長洪照榮先生、中國民主統一促進會召集人鄭寶羅先生、華人婦女會理事楊愛倫女士等；工商界人士有：著名律師李亞倫先生、中國之春雜誌長期捐助者、龍門家俱公司董事長劉阜先生，長期以優惠價印刷中春雜誌的林口印刷廠的林氏三兄弟，美中技術公司董事長徐大椿女士等。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中國民聯常委林馮清、李光和張俠教授，中國民聯監委主任黃仕中，監委李然，中國之春雜誌編輯程瑞雲、馳遼、陳美詩，中國之春英文版執行編輯董樹人等，出席了酒會。

在美國學習和進修的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也應邀參加了酒會。中國之春雜誌社秘書高淳兒小姐和夏志清

教授主持了酒會。

夏志清教授為酒會致了生動的開場詞。他說：「看到了中國之春英文版發行，可見中國之春做了很多努力和工作。我和王炳章認識四年多了。四年多前，中國之春尚未出版，我的學生梁恒就向我推荐王炳章，說他了不起，很愛國。後來梁恒走了另一條路線。我記得第一次見到王炳章，聽他演講說，要搞民主運動，要大家有錢出錢，沒錢出力。當時很多人當場捐款，我沒有錢，只好出力，到現在還是出力。王炳章堅持了四年不動搖，只是頭髮變了。過去是向右一邊倒的髮型，現在從中間分開了。兩邊倒。(衆笑)編雜誌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我一生從未編雜誌。中春第一期畫著小草，出頭一點點，象徵著春天。現在這棵小草長大了些，四年了。再過幾年，再大些，茂盛起來，就應叫中國之夏了(衆笑)。現在日文版、英文版都出來了，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了。」

接著龍門家俱公司董事長、長期在經濟上支持中國之春的劉阜先生應邀致辭。他說：「我和中國之春結緣，主要是因為很多觀點相同。做為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事情一向很關心。」



東亞人權協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司馬晉(James Seymour)致辭。



王炳章先生(中)與夏志清教授(左)、叢甦女士(右)共同切開蛋糕。



慶祝酒會一角。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路先生(左)、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系主任唐德剛教授(中)、廣西同鄉會副會長莫利人小姐(右)在酒會上。

我希望中國能夠有健全的民主和法治。中國之春宣傳這些主張，因此我支持它。」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人權協會主席司馬晉教授剛從香港趕回，在酒會上即席發言：「中國之春已經創刊四年了。我表示祝賀。現在英文版又出來了。中國在世界上是人口最多的國家，她的一切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是我們大家都十分關心的。現在，台灣海峽兩岸都在搞改革，希望中國能夠進步。」

作家叢甦女士在發言中說：「中國之春英文版上有我的名字。我要說明的是，第一，我只看過幾篇文章，做為翻譯顧問，作了些英文文法和詞句上的修改工作。這種工作也有其他朋友在做。但中國之春的編輯策略與我完全沒有關係。因為英文版剛剛出來，我應該幫些忙。第二，大家都知道，中國民主的道路，是一條相當遙遠而又艱辛的路，不少民主鬥士曾經開拓過，跋涉過。辛亥革命以來，已七十多年了。但真正的民主體制在海峽兩岸都相當難產。由於這個原因，我個人願意給予任何願為民主和人權而努力的團體或個人以精神和道義的支持，不管是在海外的中國之春，在大陸的民運人士，或是在台灣剛成立的民主進步黨。雖然極可能，這些團體與個人的想法、作法與意識形態，與我個人完全不一樣，但為了突破一言堂、一人獨裁與一黨專制的禁區，這些個人或團體還是應受支持的。這種支持並不是全然沒有保留及條件，什麼樣的條件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這些人或團體，必須是理性的、非暴力的、大公無私的、光明磊落的、不偏不倚的、獨立並超越於黨派政治的立場並為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全中國的民主而奮鬥的。是這樣，我會支持；假如不是這樣，我不會支持。我

想海外大多數人會同意我的想法。」

正在紐約度假的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教授孟德馨先生在致詞中說：「我一生中，三分之一時間在大陸，三分之一時間在台灣，三分之一時間在美國。我感到，中國是最大的國家，文化也很悠久，但不是最強的國家，不是經濟大國，也不是軍事大國。這不是我們中國人不行，而是因為我們有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今天在座就有很多名作家、名教授，我們中國人在海外有三千萬，台灣兩千萬，大陸十億，人才濟濟。我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共同為民主而奮鬥。現在中國之春創辦四周年，但願中國之春創辦十周年時，我們大家能在北京、在上海或在武漢相聚。現在，台灣形勢發展很快，最關鍵之處就是國民黨開放黨禁，實行憲政目標。但非常遺憾，新黨民進黨有很大的台獨傾向。因此，我們希望全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能夠出現反對黨，實現民主政治。這樣中國才能成爲一個經濟、政治都很強大的現代化國家。」



長期在經費上資助中國之春的龍門家俱公司董事長劉卓先生致辭。

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唐德剛在致辭中說：「台灣兩黨制已成定局。爲什麼我敢大言不慚的說已成定局了呢？我認爲，經濟發展與政治自由是相輔相成的。在今日世界上，沒有經濟高度發展而政治停滯不前的國家。台灣的經濟高度發展了，所以它的政治自由也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再看中國大陸，從人均收入上說，美國是中國的五十倍，台灣是中國的十倍。所以說，想讓大陸的政治達到台灣或美國的民主水準，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另一方面，



王炳章先生與王寶君小姐在酒會上二重唱「康定情歌」。



作家阿修伯先生在酒會上用台語引吭高歌。

經濟的發展是搞民主政治的條件，但不是充分的條件。政治的發展如果太落後，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所以，目前對中國大陸的民主思想的傳播，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政治永遠處於落後狀態，經濟就可能發展不起來。」

以優惠價格爲中國之春印刷雜誌的林口印刷廠的林氏兄弟，做了簡短講話說：「我們能夠爲有理想、有水準、有內容的中國之春作點事情，感到非常高興。」

中共問題專家、前「展望」雜誌主編司馬璐先生在致辭中說，從辦「展望」雜誌的經驗看，辦一份有水準的雜誌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希望中國之春能夠更上一層樓。

作家阿修伯則用清亮的嗓音，唱了一首台灣民謠「燒肉粽」，給酒會增添了活潑的氣氛。

酒會中，來賓致詞與歌星演唱交錯進行。一百多位來賓紛紛向中國之春雜誌工作人員表示祝賀。

酒會以切慶祝蛋糕達到高潮。林口印刷廠林氏三兄弟送來了一個二層的大蛋糕，向中國之春雜誌社表示祝賀。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持刀，他的手與夏志清教授、叢甦女士的手握在一起，切下了第一塊蛋糕。

酒會持續了近二小時後，由王炳章先生代表中國之春雜誌社全體同仁向各位來賓致謝辭（全文另發）。他回憶了自己四歲時和八歲時的兩個小故事，勉勵民運人士要爲民主的理想不懈地奮鬥下去。王炳章先生向來賓、向支持中國之春的各界人士，表示誠摯的謝意。

最後，王炳章先生與歌星王寶君小姐合唱了大陸民謠「康定情歌」，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

新的一代一定會逐步成熟起來

——在《中國之春》創辦四周年暨《中國之春》英文版出刊慶祝酒會上的致謝辭

王炳章

非常感謝大家說了這麼多鼓勵的話。

中國之春剛剛四歲，應該說，還是一個天真的孩童。

諸位來賓都會記得自己四、五歲時的一些往事。大家可能有這樣的體會：小時候的事，凡是記住的，往往都是蠢事，可笑的事。

記得我四歲多時，特別喜歡吃花生，可是家裡又捨不得經常給我買。一次，一個比我大三歲的堂哥帶我去偷花生。他帶我到了一片花生地，對我說：「你進去拔，我在外面看着人。」我偷了一帽子，和堂哥跑到一片小樹林中。堂哥又對我說：「你回家偷火柴，我們燒着吃，我在這裡等着你。」我蹣跚跑回家，偷了火柴，再蹣跚跑回來。一看，我楞住了。我那位堂兄不見了，只剩下我的帽子，帽子裏裝了一堆花生皮！

你看，我四歲多的時候，是多麼愚蠢！

中國之春辦了四年，巨大的成績談不上，但犯的愚蠢而可笑的錯誤倒不少。對此，我永遠不會忘懷。

我想，看一個人，一個團體有沒有智慧，有沒有前途，主要是看他（它）能否在錯誤中汲取教訓。

如果說我四、五歲還很愚蠢的話，到八歲時，就好多了。我八歲那年，住在同院的那位堂兄已十一歲了。過除夕時，他跟我打賭：大年初一看誰起得早。起得晚的，要輸掉炮竹，而且不能吃初一早上的餃子。

回到家時，已經很晚了。如果睡覺的話，我可能會輸掉。我偷了件不知是爸爸、還是媽媽的大棉襖，悄悄跑出家門，蹲到我那位堂兄的門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的除夕真冷啊！我縮成一團，堅持着。

我迷迷糊糊不知等了多長時間，突然聽見門咯吱一聲。我立即站起來，使足了全身氣力，大吼了一聲：「我贏了！」就聽「哐啷」一响，一個煤球爐子摔到地上——堂兄是端着爐子出來點火的。接着，隨着「有鬼！有鬼！」的尖叫聲，那位堂兄飛似地跑回屋裡。

我笑着走進屋，不斷喊：「我贏了！我起得比你早，你初一早上不要吃餃子了。」這時，伯母在屋裡罵道：「你這混小子，你哥別說初一吃不了餃子，我看他三天都吃不了飯了，被你給嚇壞了。」

這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你看，我八歲的時候，已經比四、五歲時聰明多了。

四歲的中國之春還相當幼稚。待中國之春八歲時，我們這一代人會成熟很多。只要像我八歲時除夕晚上挨凍那樣，有毅力、有決心，我們這一代人一定是會贏的！我們正是蹲在鄧小平、陳雲的門口上，勝券已操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

現在，中國之春還很弱小，專制政體看起來還很強大，專制者和其追隨者還看不起我們。但我願提醒他們：民主力量雖然幼稚，但專制力量已經老朽；民主運動一天天長起來，專制集權一天天弱下去。新的一代一定會逐步成熟起來，在可見的未來，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在我們弱小和困難的時期關心過我們，幫助過我們，教導過我們的朋友們。
謝謝諸位的光臨。

「萬人刊物」

——「中國之春」雜誌創辦四周年及英文版創刊的感想

（中國之春雜誌經理）林樵清

常常聽人家說：「你如果要害一個人，最好勸他去辦雜誌。」這話雖有點誇大，但可知

辦雜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姑不論是易是難，我們都已搞了四年。在這四年中的酸甜苦

辣，真是不足為外人道。

「中春」堅持了四年，成就是談不上的。如果一定要說她有什麼成就的話，那就是堅持了。而這一點點成就也是由於以前和現在工作同仁的努力，以及大家對她的愛護和支持才有以致的。

想起小時候聽過的一個名叫「萬人鞋」的

故事。大意是：一個父親對兒子說，他有一雙萬人鞋——是經過一萬人的努力才做出來的鞋子。兒子心以為這雙鞋一定是美侖美奐，金光閃閃而又高貴無比。於是一定要見識一下這雙萬人鞋。當父親鄭重其事地把這雙鞋拿出來的時候，一看，令兒子大失所望。原來那只不過是一雙你我都常穿在腳上，普普通通的黑皮鞋。

「這皮鞋我也有，那麼普通，為什麼稱它做萬人鞋？」

「不錯，但你想想看，一雙皮鞋的形成是要經過一萬人的努力？首先皮鞋是用皮做的，而皮是從牛身上取來的，於是要有人養牛，然後要經過屠夫，製革工人，批發商等才到鞋匠手中。鞋上有漆，要有人種漆樹、取漆……鞋上有釘，釘是鐵做的，於是要有人去開礦、搬運、冶煉、製模及販賣等等。鞋上有綫，於是要有人去種棉花、採棉、紡紗等等。綫上有蠟，於是又要有人去開採……等等。總之，一雙鞋的產生確實是需要一萬人的努力才能成形的。」

同樣的，「中春」能夠堅持到現在，並在全世界發行，也是經過了眾人的努力才有以致之。從作者寫稿開始，到審稿、打字、校對、排版、印刷、運輸、發行一直到讀者購買和訂閱。其中所動用的人力和物力，真是難以數計。故說我們這本刊物是「萬人刊物」，實不為過。

至於說到英文版的創刊，更令我們汗顏。早在三年前，各地匯集起來要求我們出英文版的聲音已是甚囂塵上。但由於人力、物力、財力的短缺，足足拖了三年，直到今天，才能如願以償，而且還是出版在日文版之後，真讓我們覺得十分慚愧。現在我們希望英文版能夠在

堅持的基礎上，再向高品質發展。

「中春」辦到現在，值得驕傲的地方實在不多。她所達成的使命和大家對她的期望比起

●特輯●慶祝中國之春四周年及英文版創刊

「中國之春文選」(英文)發刊詞



中國之春文選(英文版)封面。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時，美國未能預見毛澤東會使中國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六十年代初，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很少有人預測到中蘇關係的破裂。一九七一年，當林彪發動宮廷政變的消息傳到美國情報機構時，它被當做不值一晒的笑談。

隔閡誤解不僅擋住一個人的視線，而且更糟糕的是，會導致錯誤的決策。舉例來說，本世紀二十年代初，孫中山博士曾向美國和英國尋求援助來進行北伐。然而當時美英兩國的決策層却視孫中山先生為一個夢想家，而拒絕對他加以援手。這迫使他不得不轉向蘇聯，因而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勢力的膨脹。沒有多久，西

來，還是相差太遠。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再站在愛護她的立場上，給我們支持和鞭策，因為：「中春」是一本大家的刊物。

方列強所支持的北洋軍閥，就被孫中山的追隨者們擊潰了。

今天，中國重又處於巨變的前夜。某些西方人士樂意相信鄧小平正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並將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實際上這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中國問題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正如中國人難以了解西方一樣，西方人士往往也昧於理解中國。而原因也是共同的：缺乏信息，並對已有信息解釋錯誤。當前，有關中國大陸的英文資料主要是中共官方的宣傳品，如北京周報、中國建設、中國日報等等。這些宣傳品經常誤導人們，包括誤導許多中國人。

「中國之春文選(英文版)」的宗旨，即在打破中共官方對信息的壟斷，披露那些中共故意隱瞞的事實，從而幫助讀者真實地認知當代中國。

我們的信息來源主要有兩個，一為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目前其人數已達三萬人之眾；另一為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廣大的信息網絡。

我們希望「中國之春文選(英文版)」對您會有所裨益，並歡迎您的反饋和支持。

對「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的迴響

(本刊編輯部)

編者按：自中國之春第四十二期披露「中春」控告「人民日報」一案後，本刊收到許多對此案產生感想的信件。現將其整理後發表。唯有些不及刊載，尚望作者見諒。

堅持到底

貴刊終於鼓起勇氣，不畏強權，起而控告人民日報的污蔑造謠及誹謗，實在大快人心。幾十年來，被這張造謠報害得家破人亡的人在少數，我就是其中之一。

由報導中得知，人民日報有錢有勢，現在正使出一個「拖」字訣，想把此案拖到不了了之。這種陰謀，絕不能使之得逞。我勸貴刊一定要堅持下去，打到底，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法治，什麼是人權。

寄上小小款項，聊表敬意。

大陸新移民康仁毅於芝加哥

對控告人民日報案的感想

關於貴刊控告人民日報誹謗案本人讀後有

如下感想；

1. 貴刊勇於堅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正義思想，面對極權專制制度，毫不畏縮。不像此間一些報刊名為中立，實則投機，閱後令人噁心。

2. 人民日報捏造事實整人鬥人，乃貫徹共黨的一貫手法。對胡娜、週羅錦等無不如此，其餘藉古鬥今，藉貧農之口鬥地主，藉文痞之手鬥知識份子，藉紅衛兵鬥垮反毛派手法無不如此。

3. 這次在美國運用同樣卑鄙手法，但為貴刊揭穿，又不敢面對現實，這種做法非但丟盡人民日報的臉，連素來實事求是，講話有信用的鄧、胡、趙三位先生顏面也給它丟光。

華僑唐生於紐約

蠢笨透頂

中國之春第四十二期一郵到本校，便迅速在留學生、訪問學者中流傳開來。大家一見面，頭一個話題便是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凡讀了這事件報導的人無不感到振奮，甚至有點揚眉吐氣，有人說：「人民日報，日日誑報，想不到也有今天。」對中國外交部致美國政府的那份外交照會，在我們之間互相傳閱後，大

家更是笑得前俯後仰。一位同學說，「中國領導人簡直就是將王炳章當作汕頭的走私分子，將美國政府當作廣東省，下一個文件責令廣東省制止汕頭走私活動似的，給美國政府也來一個文件。八股文寫多了也不看看對象。」

一位來此間研究中美兩國政府比較的訪問學者說：「好在美國政府裏有人知道我國的有些官僚得進醫院小兒科就診，對照會也就不予多大理會，否則，如果有人將此照會用英文發表，如果我的美國同事讀了，叫我這個教授的臉往何處放？美國總統對法官都敬畏三分，他又怎敢讓法院去制止王炳章訴訟？再則照會中對美政府的要求已遠遠超過了美國憲法，換句話說是在要求美國要修改憲法，這不是明目張胆地干涉人家內政嗎？也不知起草這份照會的人是那位教授的高足，如果他落到我手上，我不打他三板屁股才怪呢。這些傢伙用『蠢笨絕頂』來概括，毫不過份。」

但問題是，只是起草人蠢笨絕頂呢，還是中共蠢笨絕頂？

中國大陸留學生朝開牆於美國

這個狀告得有意思

王炳章及中國之春在美控告人民日報，這

狀告得有意思。不論打不打得下去，結局如何，不須妄加推斷。筆者對崔陳先生的話甚感噁心。寥寥數語我們已經看到「偽君子」、「江湖騙子」、「政治娼妓」等骯髒詞句。王炳章姓名公開、觀點鮮明，和幾個同道辦「中國之春」，對共產黨所持的態度也是公開的。中共可以不同意王炳章等人的政治觀點，批判他們的立場。像今天這樣僅用沒有真憑實據的幾句髒話，是不能服人的。

據外電報導，台灣國民黨開放黨禁，對立黨已正式出現。大陸人民要求民主的浪潮也在高漲，包括共產黨高官在內的許多人都經常呼籲民主。那麼，若是台灣出錢叫王炳章等協助大陸的民主運動，也是好事一樁，因為正好可以溝通兩岸的活動，有利中國的統一。

美洲柯奇

我願作證

看到貴刊要求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出庭為貴刊控告人民日報一案作證，我很願意出來作證。

我是八五年出國的，出國前曾有教育部的負責人向我們訓話，對中國之春污蔑、造謠，其內容與人民日報所刊載的如出一轍。可見中共內的保守派對中國之春誹謗是有組織的活動。

我現在已決定在美國留下來了，什麼也不怕了，任何時候，只要貴刊一個電話，我會毫不猶豫的步上法庭為此案作證。

中國大陸留學生何華於紐約

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

閱讀貴刊一系列的有關控告人民日報案

報導，只讓我覺得人民日報像個潑婦。我有錢有勢，罵了你，打了你又怎樣？你告我？我就動用外文豁免權，再向美國政府施壓，你告得進去嗎？我有的是錢，有的是閒，拖吧！

「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據我看，此案不要再糾纏下去了。貴刊主要是爭一個正義，而每一個了解此案的人都知道正義已屬於貴刊。當人民日報醜態百出的外交照會一出，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你們已經贏了，拖下去徒然耗時費力。

美國華僑唐聞聲於加州

不准鄧力群用外匯打官司！

讀了貴刊四十二期的文章「訴諸法律，粉碎謠言，討回正義」一文，我們不禁要發問：鄧力群和《人民日報》有什麼權力動用幾十萬美元的國庫巨資來打這場官司？衆所周知，中國那一點可憐的外匯是靠幾億人民辛勤勞動，一分、一釐換來的。按五百元人民幣一年的農民生活收入，那幾十萬美元可供上千的人生活一年。鄧力群之流一貫說話不負責任，在國內早已是臭名遠揚。這種惡劣的行徑所造成的後果本應由他們自己負責，但他們却敢動用人民的血汗為他們辯護，真是豈有此理？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為人民服務」。我可憐的祖國，你哪天才能擺脫這種人的統治呀！

群思于西海岸

人民日報是反面教材

讀完總第四十二期「王炳章及中國之春控告鄧力群及人民日報」的消息後，我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靜。我既欣慰又憤怒。欣慰的是王炳章先生及中國之春有勇氣及胆量向鄧力群及人民日報提出挑戰。憤怒的是人民日報幾十年來作風依然如故，執行其一貫撒謊及造謠的伎倆。

人民日報竊取人民兩字作為報刊名稱，簡直是污辱人民！他們所登的消息都是為共產黨宣傳服務，報喜不報憂，未曾真實反映人民的意願及真實消息。極力典解自由法治制度從而鼓吹「社會主義優越性」。

人民日報刊登的荒謬例子不勝其數。過去宣傳得熱火朝天的千斤田、萬斤田及毛澤東思想能治好啞吧和瞎子的荒謬神話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有被共產黨的宣傳欺騙好幾十年的感覺。現在不論「人民日報」大吹大播什麼消息，我們都視作反面教材。

在此，我寄上美金支票一百元，以表支持你們的一點心意，雖然數目微不足道，但集腋成裘，我熱切地希望你們把此消息告訴每個華僑及海外人士，尋求多數人支持，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正義的一方。

香港讀者海萌

大家都來做證人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開展後，我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擔任中國大陸學生和訪問學者聯誼會會長，多次接待來校視察的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官員們。「三信危機」在外交官中也很嚴重。他們之中，少數人在海外已叛離中共專制制度；多數人對當局政策懷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與抵觸情緒，用各種辦法保護留學生和中國之春；一些人身在其職，不得不照本宣科，以明哲

保身；只有少數人願為專制制度效力。

在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一案中，被告辯稱什麼「人民日報說中國之春接受台灣津貼，指的是接受人民的捐款」，妄圖以此逃避誹謗之罪。在這裏，我願意站出來，作為證人，以確鑿的事實駁斥這種詭辯。

早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二等秘書黃某來我校傳達中共「內部文件」。文件明文說：「中國之春拿國民黨的錢，為國民黨幹事。」本人及多名大陸同學在場。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國大使館教育處官員孫某在給本人的親筆信函中，更直接了當地誹謗王炳章博士「拿台蔣的錢，為台蔣幹事。」孫當時負責我們這區的工作，他的信顯然代表了官方的旨意。此信在我手中，白紙黑字，不容抵賴。

如果美國法庭開庭審判，我願出庭出證，申張正義。我希望有良知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都挺身而出。

（大陸留美博士後）林斌雲

是誰拋棄誰

人民日報刊文污蔑王炳章是「拋棄大陸的妻女另求新歡的偽君子」。中共的這種宣傳，的確也迷惑了一些人。我們理解王炳章先生在此點上本人不大力辯駁的用心，因為，中國之民主運動畢竟是一場嚴肅的運動。

然而，我要揭開一個公眾一直忽略的事實：在王炳章與其前妻的關係上，是他的妻子首先拋棄了他。

我們在出國前，就聽教育部文件傳達，給我們打預防針，叫我們出國後不要接觸中國之春和王炳章。中共文件中，曾洩露了一個大天

機：文件指出，王炳章在出國後不久（那時王和其妻尚是夫妻關係），其妻就曾跑到教育部，向領導告密說，王炳章這個人思想反動，你們怎麼放他出國？他將來會叛國的！當時教育部領導認為這是其妻不理智的表現，并未聽信。

中共在文件中指出此事，目的是指出王炳章思想一貫反動，以便把他搞臭。可是，這一下，中共也不打自招了一個重要事實：在王炳章與其妻尚是夫妻關係時，其妻已徹底背叛了他，拋棄了他。不但背叛，其妻已決定將王炳章置于死地！

我們從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向領導告這種密的後果是什麼。如果不是教育部領導當時偏袒王炳章這個人才，王炳章恐怕早進了共產黨的冷宮了。

一個想把自己的丈夫置于死地的女人，有誰能同情呢？我們留學生們聽完教育部的上述文件傳達，都在背後議論說：王炳章的愛人太可怕了，這種女人，趁早離得遠遠的。

中共保守派常說，頑固派往往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話，用在中共守舊派頭上也很合適嗎？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鄭滿靈

人民日報無人民

中春從原來的襁褓狀，發展到現在成熟的專業作業，我算是個歷史的見證者。

我們早就聽慣了一句話，真埋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人民日報無人民。如今能揭開這個馬列偽學的畫皮，并繩之於法，大快人心。中春的八字宗旨「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已逐漸形成時尚，願上帝保佑中國人多

福。

現寄上美金五百元，做為支持你們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的官司之用。

中國大陸新移民子川

我願去北京送傳票

本人非常支持中國之春打這場官司。我有美國國籍，已年過花甲，一直想為民主運動盡些力。看到中國之春第四十三期說，中國之春需要有人出面送狀子和傳票。我在這裏報個名，有需要本人效力的地方，儘管吩咐。

（華僑）李勝筠

株連九族控告人民日報

讀過中春總四十二期關於王炳章及中春控告鄧力群及人民日報內容後，不覺生出許多疑竇，萬望賜教。

在當今人人都知文責自負的時代，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何中春藉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雜文控告人民日報、鄧力群等人及書報通訊社，大有一種株連九族的遺風。照此辦理，似應連同人民日報印刷廠及為此提供紙張的造紙廠、伐木廠及其相關的機械廠等等都屬誅伐之例了。假若你們僅僅控告作者崔陳一人倒也不失情理，如果你們能夠拿出證據證明崔陳乃是鄧力群、秦川、李庄及人民日報的筆名，也就另當別論了。

大陸公費生羅廷生於伊州

是依法行事，非株連九族

羅廷生先生大鑒：

敬讀您對《人民日報》案提出種種疑竇的來

函後，我們相信：您是不遺餘力維護真理的人士。因此，我們願意很誠懇地就此問題與您一同磋商、思考，俾能使更多的讀者進一步了解此一案件。

您在信中指出：王炳章及中春控告鄧力群和人民日報，「大有株連九族遺風」。在確立或推翻您這個觀點之前，我們必須先說明什麼是「株連」。「株連」是硬把那些與事件不相干的人牽扯到被指控的事件裏來，要求這些不相干的人承擔責任或刑法。譬如，中共過去曾對有海外關係的人施予種種處罰。這是極不公平的！有共同血源、並不代表思想與言行也一致。中共怎能要求這些大陸人民對其海外親戚所做的事承擔責任呢？

我們控告人民日報及其負責人是依據美國法律行事的。美國法律規定：凡出版物刊登具有毀謗性的文章，文章作者和編輯部主要負責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若是編輯部的文章，編輯們要承擔全部的責任；若有署名的來稿，編輯們對於文中的訛誤也不能免於法律責任。但對於後者的情況，如果編輯部在發現錯誤後能刊登更正啟事，則能免於法律責任。

我們認為美國法律的這項條文是有道理的。試想如果沒有此項規定，則任何出版物都可以藉任何人的口恣意攻擊他人。所以，我們認為人民日報最聰明的辦法是登個更正啟事，說明崔文中的幾點錯誤，並向中國之春及其指涉的個人賠禮道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之春只告崔陳一人。否則則說明，人民日報與崔陳的立場是一致的。中國之春控告人民日報是依法行事，並非株連九族。望羅君明察秋毫！

編者上

銷路、浪費與質量

看到貴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號上刊登一篇「人民日報的銷路為何如此之慘？」一文，我認為該文的論點是站不住的。

一份報紙如果可以免費提供的話，願意花錢買的人一定大大減少。這與報紙的質量無關，辦得再好的報紙，如果可以白送，結果也是一樣。

根據經濟學原理，任何一種商品如果定價過低（更不必說白送），必然造成過度或浪費的使用。把報紙丟進垃圾堆，在樓道的走廊裏踏來踏去，這都和報紙免費贈閱有關，同樣，也和辦報的質量無關。這個道理不用經濟學，憑常識也是可以理解的。

人民日報辦得是好了壞是值得評論的，但從它的銷路和浪費却並不能得出質量差的肯定結論。

大陸在哈佛大學經濟系的訪問學者茅于軾

答茅于軾先生

茅于軾先生大鑒：

謝謝您的來函與指教。

我們同意您的觀點：從人民日報銷路極差和浪費嚴重並不能得出其質量差的肯定結論。因為，要得出這種肯定結論，須經過嚴格的對照研究和相關性研究。

然而，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銷路慘是質量差的結論。因為，同理，我們也缺乏排除這一結論的對照性和相關性的科學研究。

不過，有幾件事實還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一）《美洲華僑日報》被一般人稱為中共出錢辦的左報，它也免費贈送給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儘管它在紐約唐人街銷量不理想，但據報攤老板講，它的銷路要比人民日報好。

人民日報平均一天賣不掉一份。同樣給留學生送，《美洲華僑日報》零售為什麼比人民日報為好？

（二）我們《中國之春》雜誌也給一部分大陸公費留學生贈送，因他們經濟條件一般不佳。但《中國之春》在紐約唐人街每期能賣出數百份至上千份。我們也贈送，為什麼《中國之春》銷路却如此之好？

衆所周知，零售報紙和雜誌的買主，多半是華僑。向大陸留學生贈閱，恐怕並不嚴重影響零售市場。人民日報零售極慘，至少說明對華僑沒什麼吸引力。人民日報似乎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故將簡體字改為繁體字。但據紐約報攤的反映，改為繁體字後，人民日報的銷路并未好轉。這就說明，人民日報的內容對華僑太缺乏吸引力了。人民日報應該在內容上多下些功夫，不知茅君以為然否？

無論如何，您的來函提醒我們；今後做任何重要結論時，都應以科學的分析為基礎。再次感謝您的指教。

編者

遍地千萬富翁

看了貴刊四十二期的有關控告人民日報案。貴刊竟然獅子大開口，要求人民日報賠償兩千萬美元。你們想想，這可能嗎？就算法庭判決人民日報敗訴，人民日報會賠償兩千萬美元給你們嗎？這是一個用常理就可以想到的問題。

人民日報幾十年來浩謠是一貫的，如果每個造一個謠就要賠償兩千萬美元，則中國今天遍地都是千萬富翁了！

大陸新移民何文欽於加州

專訪朱永德教授

西安事變縱橫談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編者按：朱永德教授，現年五十四歲，湖南省漢壽縣人。早年畢業于台灣大學，來美後獲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歷史學碩士學位，及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文學院歷史學教授兼國際教育及服務中心主任。朱教授曾任亞洲學會董事（八一年—八四年），現任該學會紐約州分會會長，此外亦曾任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第一任會長，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的秘密宗教結社，中國農民運動史等，以及中國現代史問題等。曾發表「中國統一的展望」，「中國農村的變化」，「北美洲中國秘密結社的發展」等專著和論文。朱教授近年曾應邀到中國大陸訪問。

本文發表前，已經朱永德教授過目。

事變的兩大時代特點

與兩個動因

楊：朱教授，您剛剛參加了「西安事變國際討論會」。現請談談西安事變學術研究的進展。首先，請您分析一下西安事變發生時的中國社會概況。

朱：西安事變發生於三十年代，當時中國

社會的背景有兩大特點，它們對西安事變亦有直接的影響。首先，當時中國社會還可說是軍閥割據的時代。雖然二七年北伐後，名義上中國是統一了，但軍閥們依然故我。例如在北方，中原有閻錫山、馮玉祥，河北有宋哲元，山東有韓復榘。西南方呢，四川有劉湘，雲南有龍雲，兩廣則有李宗仁、白崇禧、余漢謀、陳濟棠等。這些軍閥間每年都發生戰爭。當時，雖然蔣介石有三民主義、共產黨有共產主義，

但在一般老百姓看來，各派勢力都是在打自己的天下。實際亦是如此。無論理論多麼高明，都是在割據一方，擴充自己的地盤，而理想未能實現。

第二個特點是，日本人對中國的不斷侵略。「九一八」事變後，接踵便是「一二八」，然後熱河、察哈爾以至整個華北，日本在一步步蠶食着中國。所以，上述兩個背景或特點，在研究西安事變時，一定要了解。

至於西安事變的直接動因，我想，張學良個人的氣質、思想、處境都需要研究。張當時失守東北；父親被日本人炸死；老蔣又把他送到西北打共產黨，結果打得不順利，兩個師長陣亡；蔣介石要撤消東北軍番號等。這些都與張學良要發動兵變有關係。另一面當時的東北軍的確受到中共很大的愛國主義的宣傳，張學良因此受到部下很大的壓力。西安事變以張學良為主，楊虎城固然是參與者，但畢竟是配角。此外是中共的狀態，它用各種方法求生存，也不可忽視；他們在西北搞宣傳戰、思想戰，同時用遊行、學運等各種政策來統戰。共產黨統戰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有相當成功之處。這兩點對西安事變有比較直接的影響。

楊：中共當時並未直接參與吧！事後張通知延安時，中共還感到很突然嘛。

朱：中共知道張學良要有所行動，但也不知他要怎麼動。更想不到張如此斬釘截鐵地扣押了老蔣。張學良的個性是具有相當魄力的，要殺人就殺人，要反就反，很有傳統的豪傑味道。張的行動，共產黨是沒有料到的，蔣介石也沒料到。

楊：不過張學良還是很尊重蔣介石的，這很怪。幾乎可以說是效忠。

朱：一點不假。這次討論會上，唐德剛教授提到顧維鈞講的一段話，很有意思：在張、蔣尚未合作之前，蔣就派人去東北，帶着重金和美女賄賂張。這是很可能的。老蔣與軍閥的周旋，除軍事外，常用金錢作賄賂的手段。張歷來對蔣忠心。一九三〇年馮閻聯合倒蔣，若不是張支持蔣，北閥統一北方是不容易的。另張學良三五年從歐洲回國，途經香港、廣州時，胡漢民和廣東軍閥都想拉他，希望他留下，張亦不幹，還是回到北方支持蔣，而且提議用德國、意大利的辦法，讓蔣介石做「大領袖」。

張學良與宋美齡關係亦很好，有說孔、宋諮詢張如何在美國投資。他是頗現代化的，說英語，開飛機，打網球，是年輕時受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我的意思是，張學良與蔣的關係是多方面的，所以他對蔣是支持的。

西安事變的國際背景與反應

楊：西安事變發生後，國際間的關注是很強烈的，各國都表示了態度，打電報或派使者打招呼，這方面有何新史料面世呢？

朱：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際影響中，真正的兩大主角，我認為還是蘇聯和日本。

一九三六年的蘇聯，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九三三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重新進入國際社會，加入「國聯」，和美國建交。因為那時蘇聯最擔心的事情，就是德日反共聯盟，形成東西夾攻蘇聯之勢。三六年十一月德日結盟，年底就發生了西安事變。當時德、意都認為西安事變是蘇聯一手製造的。而蘇聯宣傳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製造的，是日帝爲了侵略中國，挑動內戰的陰謀。我們知道，蘇聯

十二月十六日給中共的電報，表明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只有蔣才有威望領導中國對抗日本，其立場很清楚。中國有個強有力的對抗日本的政府，蘇聯就可集中力量對付德國。

日本的態度也是極爲明顯的。它就怕西安事變導致東北軍、西北軍、共產黨和老蔣力量合在一起對付日本。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多次找張群、何應欽談話，暗發警告，讓他們儘力處理，使事件向有利於日方的形勢發展，即不要讓各方面達成妥協而聯合。日本威脅說，如果幾方面想聯合起來打日本的話，中國要小心，日本不會坐視不問。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也接到日本外交部的類似表示。資料說明，當時日本與中國方面接觸極爲頻繁，他們竭力反對聯合勢態出現。

德、意方面也很有意思。三三年法西斯納粹在德掌權，斯大林進入國聯，羅斯福上台。故一九三三在近代史上很重要，德國、意大利的政府反共反得厲害。這是它們的主要政策之一。德、意在三十年代與蔣的政府走得很近，蔣的空军完全是意大利幫助訓練的。而蔣的陸軍則是德國訓練，江西剿共時的地毯戰略，碉堡戰術以及焦土政策，都是德國顧問的主意。蔣介石也學德、意的統治術，藍衣社之類都是那時學來的。當時，意大利打電報給張學良，告他不可隨便處理蔣介石。德國與日本有同盟，在這種情況下，也認爲西安事變是蘇聯製造的，也就認爲保蔣是反蘇聯的策略。所以，德、意兩國的态度也是保蔣反張，把責任推在蘇聯身上。

英美的態度是很簡單的。第一，英美要維護在中國的商业利益，特別是在江南的英國利益。所以，英、美兩國大使都出面要調解這件事情，希望和平解決。他們在談判上起了很大

作用。他們透過澳洲人端納，即張學良的前家庭教師，來說合雙方談判。英國大使還告端納，和平解決後，願意提供安全場所，接張、楊出國。美國也表示過這種態度。他們那時就預言，若是和平解決，中國就不會被日本滅亡。他們的經濟利益也能在中國繼續下去。這說明，英美除了讓老蔣要保障張、楊兩人的安全外，好像沒有提過其他保證。英美是保蔣的，孔、宋也是親英美的。何應欽和張群是親日的。所以蔣手下親日與親英美二者皆有，政策轉換也不難了。

總之，國際大國的态度就是如此。

各方勢力態度和蘇聯電報之迷

楊：更進一步說，在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有那些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呢？

朱：從南京方面說起，親日派以何應欽爲代表，主張用武力消滅張學良，這對蔣的生命不利，動機很清楚。天下亂則易取蔣而代之。

親美派的孔、宋兩家，都是皇親國戚，是當權派，蔣若死，他們的權力就沒根了，所以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但事實上，南京方面的軟硬兼施政策，結果對蔣的被釋，是極有利的。

從西安方面看，張學良根本不想殺蔣。他最後以至於愚蠢地送蔣回南京，是要向世人表明，他在這件事上，決無個人動機，完全出於反日愛國之心。楊虎城的情況有所不同，他持保留態度。他說得很清楚：你張學良與蔣家，與孔、宋的關係非常密切，你的頭可以保得住，我楊的頭保不住。楊沒說一定要殺蔣，但希望得到自己不被殺的保證，結果沒拿到，還是被殺掉了。他的實力不夠，非聽張學良的不可。所以楊是事件中最大的悲劇人物。



發動西安兵變時的張學良。

從中共方面講，按張國燾的自傳來看，朱德是表示要殺蔣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呢，比較保留一點，要看全局問題，但當初也很想把老蔣拖出來公審一下，這種心理是存在過的。後來呢？我相信中共還是受了蘇聯的影響，就是那封電報。有趣的是，直到最近，電報的事才算正式公布出來。中共原來出的書籍資料都沒提電報的事。過去蘇聯的外交人員與西方外交人員談話中，曾透露可能有這麼一封電報，但始終未見電報原始文件。今春中國史學家班喬索「第二十六期」，提到共產國際總書記於十二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堅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中共爭取反日份子、國共合作、以及中蘇聯合抗日等，內容與張國燾書中所言大致相同。班喬索雖未說明該電報之出處，但其文確已證明該電之存在無疑。

楊：中國學者在討論西安事變會議上講到此事沒有？

朱：一般來說，中國學者在國際性會議上，不大會主動提到這一類的問題。除了極少數學者，對一般敏感性的問題，他們大多採取官方解釋，對西安事變來說，大多強調和平解決政策，或強調張學良的愛國情操等。在今天的情況下，並不一定是大陸學者們完全不能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依我的接觸和觀察，乃是一般學者缺乏西方社會科學的訓練，自然也受到不少框框的無形約束。所以我一直覺得，大陸能多多派員參加類似的國際會議，對學者們是一種極好的訓練。此外，我覺得中國對於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方面，也應多多派遣年輕學生出外觀摩、學習，應當與科技方面的人才同樣重視，才是今後當走之道。

楊：中國學者以往很強調，中共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的促進作用。其實中共在求條件下，每個決定都必須合乎實際，還是很明智的，早在「八一宣言」中就提出聯合抗日了。

朱：「八一宣言」中提出聯合抗日是沒錯，以後周恩來等在處理西安事件時主張和平解決，聯合抗日也沒錯。可是我們學歷史的，不能單從外表的類同就認為這是中共一直未變的主張，前者是在蔣介石沒有被捉，中共在迷的情況下所提的主張，有其特殊的背景。後者是當老蔣已成階下囚，中共也大致穩坐陝北了。故二者不能同日而語。張國燾形容的中共中央大員們得到老蔣被囚消息後的各種反應，在今日讀後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依我看，從當時整個形勢來講，周恩來、楊虎城對張學良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但一切重要的最後決定，仍操在張學良手中，放蔣一節，是張的決定，吳天威的文十分清楚。如果他們有合理建議，張

會採納。張總的來說是要抗日。抓住蔣介石後，蔣開始是很怕，但一見張學良的面，就知道張無意殺他。所以我認為從開始張就無意殺蔣。中共方面，周恩來到西安後，從未要殺蔣。但在延安窯洞裡，說過殺蔣的話，不無可能，各種意見大概都講過。一些個人看法是不重要的，而最後的決定才是重要的，事實證明和平解決有利於中共的壯大。

當時各地軍閥的表現很有意思，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都給張學良打過電報，制止張殺蔣介石。但又有資料證明，這些軍閥實際上希望張學良解決蔣介石，背後還做了許多工作。

由此可見，西安事變是很難研究的。雖然有許多原始資料，但都是日記、自傳、回憶錄等，且都按各自的利益說話，不見得很真實，必須作很多調查分析工作，確定到底誰講得更接近真實情況。

左、右兩派學者皆有 偏論值得商榷

楊：這次會議上，台灣和大陸兩方學者都持什麼樣的觀點呢？有否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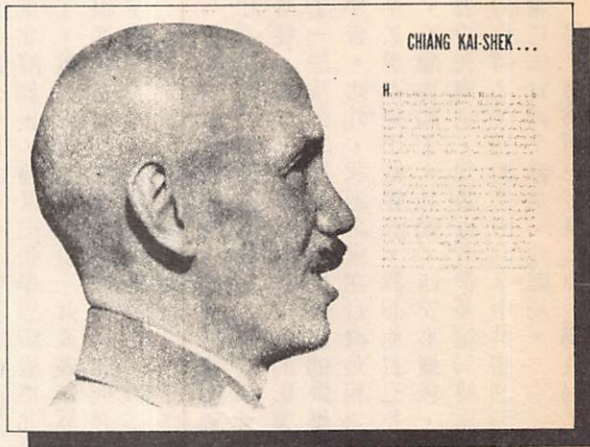
朱：當然有所分歧。我只從各人看法上，講講學術上的問題所在。

從右派方面說，有幾點是他們十分強調的。第一，他們認為在老蔣被釋放前，沒有作任何承諾。但左派刊物認為，蔣有八點承諾，不外是「不再打內戰，組織聯合政府、一致抗日等」。蔣從未在紙上簽過任何承諾，這是事實，所以蔣自己總說他未作任何承諾。第二，右派認為老蔣本來就要對日作戰，不是因西安事變才打日本的。宋美齡的日記也這樣說。第三，右

派認為，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就被消滅了。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得勢的開始，最終佔領整個大陸。這是右派學者研究西安事變的三個要點。

據我分析：首先，蔣是作過承諾的。這不僅由很多西安事變參與者記述或報告可見，從常情上講，張、楊扣蔣就是要蔣作些承諾，不作承諾怎麼會放他呢？最好的證明是聯合抗日後，蘇聯對「聯合政府」的支持。因為當時英、法、美根本顧不上中國。蘇聯對蔣空軍、炮兵的支持都是大量的。而且，蘇聯完全幫國民黨，不幫共產黨，要國民黨領導抗戰。這足以說明放蔣之前各方互有承諾。第二點：沒有西安事變老蔣也會抗日，這一點我認為是對的。在日本侵略下，沒有人不恨日本的。連汪精衛、周佛海這些做漢奸的人也恨日本，但他們沒有辦法。老蔣為何在西安事變前沒對日宣戰呢？他沒辦法打日本，那時各地軍閥實際並不聽蔣命令，蔣自己打日本等於以卵投石。老蔣有心打日本，但認為共產黨和各地軍閥的問題更大，否則先打日本，他自己就先完蛋了。老蔣在三十年代加強軍備、經濟建設都有些成就，也是準備打日本的，不是光打共產黨的。第三點，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不見得會被完全消滅。從西安事變到共產黨佔領大陸有十三年時間。今天回頭看，老蔣有很多機會實行對他有利的政策，這樣，共產黨就不會得勢。可是蔣不去實行，所以並非因西安事變共產黨才得的天下。況且，中共那時還有幾步棋沒下：第一，共產黨可以退到新疆去，盛世才與中共早有聯系；第二，中共還可以退到外蒙，蘇聯還會接濟中共。共產黨沒被消滅，主要是因老蔣後來犯了很多致命錯誤，有政治的，也有軍事的。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是西安事變的最大受益者。

左派學者的看法有幾點值得商榷。第一，左派至今，在所有正規刊物中，完全不提蘇聯對中共政策的決定性的影響。試看一九三六年的斯大林，其時，蘇聯五年計劃已完三年，清黨也大多清乾淨了，蘇聯已重新進入國際社會。而中共當時處境險惡，重要決定不可能不請示共產國際，中共的政策是受蘇聯影響的；第二，張學良是否因中共提出和平解決和放蔣，才導致西安事變的最終化解呢？這一點不盡然。只能說，中共的周恩來對張有一定影響。張是一切的最後決定者；第三，左派學者講，在張學良跟老蔣去南京時，周恩來曾趕到飛機場，一看飛機已經走了，周仰天長嘆說，張學良太情感用事，實在不應該去。後來，每十週年中共都講幾句紀念張、楊的話。但我認為，以中共立場來看，張學良這種下場，對中共是最有利的。周知道，張學良去南京就回不來了。

。我認為周恩來早就知道張學良要跟蔣介石去了，但事前並未加阻止。張學良離開西北，楊虎城就會垮台。結果呢？西北軍、東北軍的相當一部份人都投向中共去了，中共勢力，在短期內，大大擴張了起來。當時除國民黨的部隊，其它地方武裝勢力，很多都被中共吸收去了。如果張、楊繼續在西北，張的力量還是最大，中共也就不能這般地擴大力量。我這種看法，別人不見得贊成，理由是因為中共當時不見得能看得那麼遠。我想周毛之輩却可能有此遠見。

西安事變後各方力量起伏觀

楊：西安事變除造成聯合抗日的局勢外，對中國各方政治力量的起伏有何影響呢？

朱：西安事變以後，可以說中國政治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此變化中，我認為蔣介石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共是第二大受益者，各地軍閥都吃了虧，而楊虎城是最慘的一個。

中共無疑是受益了。這方面國民黨講過很多，因為中共在事變後，解除了國民黨對它的壓力，吸收了很多東北軍、西北軍，實力大增，經濟亦有所好轉。抗日後中共武裝大大地發展。但對中共不利的一點是，蘇聯支持了蔣介石，而沒有支持共產黨。這是美中不足的一點，所以它不是最大受益者。

蔣介石是最大受益者。當然，西安事變對他是一生未遇過的奇恥大辱。他的生命那時在別人手裡。但是，首先，他真正成了全中國的領袖。抗戰開始，國共合作，國民黨內左派汪精衛等人的勢力垮台了，因為蔣已經聯共聯俄了，左派沒意義了。第二，他得到共產黨的公開支持，承認他為中國的領袖。第三，蔣在西

安蒙難回南京時，南京城大街小巷到處都歡慶他回來。蔣發現他的聲譽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他對自己也更有信心了。他因抗戰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第四，東北軍、西北軍被瓦解了。不久，山東的韓復榘完蛋了，華北的宋哲元的勢力也因抗日沒落了。與蔣對抗的軍閥勢力，只留下兩個力量，一是閻錫山的山西軍，一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抗戰開始後，中央政府遷至內地，雲南、四川也成了蔣的天下。劉湘、龍雲最後也被削掉。故抗戰時期中國出現從未有過的統一，蔣介石一路順風地成了名正言順的大領袖。到抗戰後，中國政治就從多元變成了國共二元。

張學良的歷史貢獻及地位

楊：最後請朱教授談談西安事變以後的張學良好嗎？張在台灣後來有自由嗎？

朱：這方面台灣的傳記文學上有好幾篇文章。張學良在台灣今有相當的自由，他自己在籠中關久後，也不想出來飛了。我認為張學良是個相當了不起的人。首先，張的軍事和政治訓練相當實際，二十多歲掛帥帶兵，參與中國政治的縱橫變化，他殺掉楊宇庭，很有魄力、果斷，以承父業。其次，張受的中、西教育都相當扎實，他開飛機、跳舞、找女朋友，是很有色彩的人物。這種新潮態度，使他在東北辦教育、辦大學，對國家建設也有建樹。他追求新的思想，赴歐考查。中國第一次參加世界運動會，都是東北的張學良出的錢。老的中國體育家如郝更生等，都是東北大學出來的。再者，民國以來，最早的現代海、空軍，也是東北訓練出來的，張的炮兵也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張的愛國心更是世所公認。

張對蔣的態度，我看張有不智之處。張沒料到送蔣回南京後，蔣會不讓他回西北，行前老蔣保證張兩三天就可回來的。當然，蔣也沒料到張會扣他。張有些江湖豪傑氣味，他曾說，蔣不讓他回陝他也不在乎的，實際心裡還是在乎的，不過這一着是走錯了。

張對蔣是夠忠的，他曾對蔣說：「我老子在時，我侍奉老子，老子不在，我侍奉你。」張去歐洲時，把自己的部隊完全托給蔣去管。但張對一切都有他的主見。

楊：張如回西安，還會在後來中國政治舞台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吧！

朱：那當然，張有二十萬大軍。老蔣不放張，是因為一放張，抗戰的功勞就會被分去很多。說明蔣的肚量不夠。不過，抗戰後，林彪佔據東北時，蔣若明智的話，應立刻放出張，讓他回東北對付共軍。當時共產黨派了張學思回去，即張學良的弟弟，做林彪的副司令。後來東北解放後，毛又把張學思調離東北搞海軍去了，做了海軍副司令員。共產黨統戰的棋走得準。而蔣的眼光就不夠準。蔣把異己統統視作敵人，這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

楊：張學良到台灣後做過些什麼事嗎？

朱：他做了兩件事：一是研究明史，研究得相當深透，成了明史專家，一是成了虔誠的基督徒，這一部份是受了宋美齡的影響。他翻譯了一些基督教書籍，所以後來的張學良變成了學者。此外，我認為張在台灣是相當自由的。至於說不能出國等等，我想他自己並不想出國，不想再起了。其實，西安事變後，張如沒有被扣在南京，想必也有很多難局面要對：怎樣對待蔣？怎樣對待中共？中共勝利時留在大陸還是去台灣？都是一些難局。

楊：蔣為何一直沒殺掉張學良呢？

朱：如前述，張學良實際對老蔣很忠，這是原因之一。蔣與張都有些江湖氣的。另外，英、美的壓力和蔣在宋氏兄妹前保證過日後不殺張學良，也是緣故之一。因為蔣不放張回去，有說宋子文曾和老蔣拍桌子吵過嘴。

兩岸研究未能脫開環境影響

楊：這次芝加哥會議上，外國學者有否獨到見解？

朱：斯坦福大學和約克大學的兩位學者范力沛和蔣志讓，都講了一個問題，即危機應付政策（CRISIS MANAGEMENT），是現代政治學的熱題。兩人都特別提出，西安事變時南京方面是非常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地應付危機，而張、楊方面則是混亂原則，所以造成南京方面轉敗為勝。徐乃力對各省軍閥的反應有很清楚的交待。主辦人吳天威教授是西安事變的權威，爲了辦事，他沒發言，很可惜。

楊：中國學者未注意這些研究方法吧！

朱：台灣方面，黨史會副主任李雲漢，基本代表右派史學家的觀點。他的史學方法很好，也是很好的學者。大陸方面的學者，我想學術水準方面較差一點，你只要看過一本大陸出的有關的書籍，就知道大陸學者的基本論點了。台灣、大陸的學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點脫不出所在政治環境對學術研究的影響。不過大陸學者能經常出來參加國際學術活動，是很好處，可以了解不同的觀點，不再局限於黨的觀點。此外，楊虎城之子楊拯民也出席了會議，他是大陸政協副秘書長，沒提論文。總之，西方學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這比中國兩方的學者都要有獨立性。

楊：就談到此，謝謝朱教授。

從海峽兩岸的政情發展 看民進黨的「住民自決」

本刊專訪

熊玠·田弘茂二教授



田弘茂教授



熊玠教授

(本刊記者)秦俠

編者按：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治，最近都有新的進展和變化，我們訪問了海內外知名的熊玠和田弘茂兩位政治學教授，請他們針對局勢，從政治學的角度發表一些看法。熊、田兩位教授看法各有長見，甚至可以說針鋒相對。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上分析了中國激變的政治勢態，頗有價

專訪熊玠教授

值和趣味。在此同時發表，以饗讀者。
熊教授為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田教授為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
文中「記」代表本刊記者秦俠，「熊」代表熊玠教授，「田」代表田弘茂教授。
由於時間倉促，完稿後未經熊教授和田教授過目，故由本刊負起文責。

(一) 為了統一， 必先縮短政治差距

記：熊教授，您可否估記一下，台灣政治的發展，會否促使大陸也向民主化方向發展。
熊：關於台灣民主化對大陸會不會形成影響，這裡有個技術問題，就是大陸老百姓怎樣才能知道台灣的實際情況。上面領導人自己當然知道了。現在大陸的學生在遊行，但學生對台灣的民主化到底知道多少？就無從得知了。論理來說，台灣如果更民主化些，勢必強迫大陸也要民主一些，否則雙方差距太大，就不好講統一了嘛。

可是也有一個問題。假如台灣民進黨如果堅持自決的話，對大陸上的民主化也不利。因為大陸人會起反感。當然，反感可能先從上層開始，但逐漸就會蔓延到學生和普通老百姓。我個人感覺，大陸的年輕人，比台灣的年輕人有更強的民族意識。他們如果聽說在台灣的反

對黨要自決，而他們理解「自決」就是獨立的話，他們一定會產生反感。這樣，大陸人的注意力就會放在如何防止台灣獨立，而不是放在台灣怎樣才民主化的問題上。如果這個假設成立，聰明的領導人一定會把學生和民衆的注意力，引到自決的問題上，即從民主化問題轉移到如何防止台灣獨立的問題。故我認為，新黨強調自決，除了其本身站不住腳而外，還會對大陸產生負面的影響。

(二) 自決概念可能引發 民族意識高潮

記：大陸對台灣新黨的自決主張反應是很強烈的，彭真講話講得很清楚。

熊：目前還只是政府的反感，還沒有傳到民間。如果大陸政府反對人民的民主要求，它會想辦法把民衆的注意力引開，而它也就會向老百姓強調台灣自決的危險性。這樣一來，就會把大陸人民要求民主化的聲音轉成民族意識

的高潮。如果民族意識的高潮一來，就會使得大陸政府對台灣實行鐵腕政策。如果我們能想到這一點，中共領導人也會想到這一點。

我歷來主張一種理論，就是：「統一而非現在」。最近大陸來的朋友同我講，這種理論已被很多中共領導層中的人所接受。大陸如果因台灣要求自決而出現民族意識高潮的話，將造成一個後果：迫使中共對台灣一定要硬，硬就是武力。也就是說讓中共合理地使用武力。

記：這是在大陸產生的負面影響。

熊：這種自決論還可能對美國對華政策造成影響。大陸如果說台灣獨立就要動武，那麼美國就會想，美國幫助台灣民主是件好事，現在反變成壞事了。美國不願意幫台灣與大陸對打，那對美國不利。而美國也不想因台灣而與中共決裂，美國與中共決裂的話，中共可能會倒向蘇聯，這對美國也不利。美國人很現實。大陸硬，美國就會軟，到時可能不鼓勵台灣的民主化了。

(三) 民主政治

要區別於暴民政治

記：熊教授對大陸學生運動有何看法？

熊：大陸學生要求民主是相當好的事情。如果現在領導人的政治改革，能在大陸紮下根，能夠進行到下一代，當然很好。可是問題不是那麼簡單的。大陸人民爭取民主，我感到一則喜，一則憂。喜是認為要民主是好事，就像我對台灣民主的看法一樣；憂就是憂大陸會掀起民族意識。中共會向群眾說：台灣不是在搞民主，而是在搞獨立。

另外，不知大陸民主化的條件和民衆素質怎樣。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說：民主政治搞不成功，就會成爲暴民政治。拿台灣來看，許信

良關、民衆翻警車、打警察、燒國民黨旗。這不是暴民政治是什麼？不過後來選舉時，選民倒很理智，把反對黨中的溫和派都選出來了。激進派如大家看好的謝長廷就沒選出來。選民很清楚，如果民進黨激進派出來，必會刺激國民黨強硬派出頭，這樣雙方打起來，倒霉的還是我小老百姓，所以選民很理智，這次大選其實是選民的勝利。

(四) 兩岸都應加強民主教育

美國是公認的民主社會，但警察是打人的。可是台灣相反，是市民打警察。台灣好多人把民主理想化了。在美國都不可能發生的，台灣却會發生。而台灣同外界接觸如此多，民主搞了這麼久，都是這個樣子。因此，對大陸，我就更擔憂了。學生爭民主是好事，但千萬不要鬧過頭了。我想大陸人對民主的了解，會比

專訪田弘茂教授

(一) 台灣政治演變

會對中共有所刺激

記：請問田教授，您認爲台灣最近的政情發展，會給中共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田：從中共現在的情況看，台灣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這兩方面向前邁了一大步，對中共

台灣差。學生們可能並不知道什麼叫過頭。大陸政府要想長久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就應透過教育和宣傳來討論清楚民主究竟是什麼？

記：我想大陸的問題還沒到「民主鬧過頭」的層次，因爲現在還在爭論民主的階級性問題，還在討論西方式的民主可不可以搞？而台灣的民主教育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了吧？

熊：台灣仍然需要民主教育，因爲以前的教育很不完善，常常出笑話。台灣的公民課本上明明寫着，有三個人就可以組黨。所以有人就說國民黨騙人。我們在學校受教育時就知道三個人可以組黨，好，我現在有三個人要組黨，你又說不可以了。我想當年編教科書的人有意埋了一步棋在那裡。這樣從小被訓練出來的台灣人民，國民黨就無法不讓他組黨。我也希望大陸的人爭民主時，要注意實際問題，如果要求太高，政府做不到，就只好鎮壓了。而一鎮壓，民主過程就要退後很多年。

當權者來說，應該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如中共不做大幅度改革，就會使台灣的民衆和海外中國人對中共的政治狀態更失望。而兩岸的差距也就會更大。如果說，一點刺激都沒有，不在大陸的中國人就會對這一代中共領導人不再有任何希望。

記：您認爲台灣的政情發展，會對大陸民衆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田：據海外去大陸觀光的人講，大陸學生

對台灣的情況很關心。但我懷疑大陸老百姓不太了解台灣的情況，因為他們的渠道可能是很有限的。假如說，這次大陸學生運動，是受到了台灣政情發展的影響的話，那麼這些學生的責任感，確實是蠻可愛的。據說文革後的青年人只是追求物質實惠和科學技術等，對社會、政治和人文科學都不再過問了。但這次學生運動說明：大陸學生對國家的事情，還是會去動腦筋思考的。

(二) 住民自決

反應台灣的壓抑心態

記：我看台灣政情的發展，可能會使大陸的統戰政策作適當的修改。因為它提出了一些新問題。比如，民進黨提出的「住民自決」的概念，就引起中共很大的反感。彭真的講話，清楚地表明了態度。

田：這個概念，反應了台灣人長期以來存在的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他們害怕台灣的前途可能有一天，會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幾個人，坐下來談一談就決定了，就擺平了。這種恐懼的心態一直到今天都存在着。其實，「住民自決」的概念，島內、外已經提出很久了。最近的選舉，黨外又提了出來。它本身不再是什麼新的問題了。

記：我覺得這個概念本身，是有很強的民主內涵的。但在現實條件下，它也隱含了一種台獨的傾向。況且，由於它本身的層次比較高，故現在提就顯得不合適。如果台灣大陸都達成了民主政治，到時更高的、更激烈的問題也都可以提出來討論。

田：是的，現在，民進黨在黨綱中把這個概念提出來，不僅對國民黨、甚至對共產黨，都有些挑戰性。但我希望國共兩黨都不要視之

為OFFENSIVE（冒犯），因為一個社會如果不夠民主和自由，那麼長期下來，一般人都會有一種壓抑感，總感到自己的前途不能由自己來決定，而由幾個人來擺佈。這種感覺在台灣的確存在，不管它怎樣有商量的餘地。

(三) 國共兩黨都應取諒解姿態

我認為，不是說民進黨在黨綱裡這麼一講，就馬上要在邏輯上推理成主張台獨。若給民進黨戴這種帽子，我認為是不必要的，因它容易造成反效果，有時甚至會製造出更大的衝突面。這個主張中的住民一字，已經用得很謹慎了，它不是專指台灣本地人，而是包括了現在住在台灣的所有人，它同時也包括了國民黨。在台灣的人是應該被允許對台灣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的。民進黨現在還很年輕，它的主張是不可能完全附和國民黨和中共的胃口的，如果那樣就不叫反對黨了。國共兩黨對此感到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如能以一種這樣的諒解的態度對待之：把民進黨的出現，看成是台灣三十多年來爭取民主的目標的完成，而在此過程中，爭取這一目標的人，心裡確實是負擔着一種壓抑感的。如國、共兩黨都能這樣思考一下，就不會感到民進黨太OFFENSIVE了。

(四) 住民自決有積極成份

記：我感覺，民進黨由於年輕，還未能老練地處理這樣的問題。

田：事實上，從尤清、江鵬堅等人對這個問題發表的談話看，民進黨的領袖們是相當理性的。我的感覺是國共兩黨的反應太過激烈了

些。中共沒有必要這樣激烈反應嘛！至於對住民自決的提出時間是否太早的看法，也不很確切。民進黨內有些人非要這樣講，就讓他講好了。沒有一個時間是最好的。現在只是講講，對如何做、怎麼實現，根本沒有具體的實踐方案。

同時，「住民自決」這麼一講，如能使國、共兩黨在未來處理台灣問題時，能多考慮一下一般台灣住民的想法，這就夠了。也等於促發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了。

記：大陸人民在將來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田：不管大陸與台灣將來形成怎樣的政治關係，我想台灣的人應該有他們自己的發言權，我甚至說，大陸的人民也應該有他們自己的發言權，不能什麼事都要黨中央命令允許才能講。例如使用武力的問題，是不是大陸的人民同意用武力對付台灣呢？假如大陸人把台灣人當作中國人，就是自己的骨肉兄弟，怎麼能自己人互相打呢？

(五) 住民自決

亦可延伸到大陸去

記：不過民進黨因住民自決惹了一身麻煩

田：如果把住民自決概念延伸的話，也可以用在大陸上嘛。所以，不要把這一概念看得太敏感，沒有必要大家都去圍剿民進黨嘛！許多學人平時都講民主政治，但一碰到這樣的具體問題，大家就都去鞭撻反對黨，好像非要把它殺死不可。我看應該給民進黨一些時間來處理它內部的問題。國民黨內部的脚步也不一樣嘛。

記：謝謝田教授。

在台灣島上舉行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兩黨競選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秦俠

(一)雙方都宣稱獲勝的選舉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政治反對黨參與的競選，于十二月七日在台灣揭曉。選舉結果如下：

(1) 國大代表應選額為八十四席：
國民黨當選六十八席，占百分之八十點九五；民主進步黨當選十一席，占百分之十三點十。

(2) 立法委員應選額為七十三席：
國民黨當選五十九席，占百分之八十點八二；民主進步黨當選十二席，占百分之十六點四。

從總得票率上看，國民黨候選人獲得百分之六十九點九的選票；民主進步黨候選人獲得百分之廿二點二的選票；其餘百分之八的選票，由無黨籍人士獲得。

從選舉結果上看：國民黨在兩項選舉中，均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席次優勢，故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宣佈本次選舉中，執政黨獲得成功；然而，如果拿本次選舉與上次舉行的選舉結果比較，民進黨比當年「黨外」階段所得選票總數遞增了數倍。故對倉促建黨，內部派系分歧尚未整合的新黨來說，遞增儘管只是幾席，亦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新黨的相當支持與期望，所以新黨亦認為在此次選舉中大獲勝利。總之，這是一次雙方都宣佈獲勝的選舉。

(二)民進黨新試啼聲競選經驗 反優于國民黨

從選舉前的政治局勢來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七十多年政治經驗的大黨，且長期處於執政地位。本次國民黨元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順應兩黨政治的民主化潮流，亦應贏得民衆的廣泛支持。可是，國民黨的總得票未升反降，是值得國民黨人士深刻檢討的。反觀民進黨，組黨倉促，黨內派系分歧很大，且因提出「住民自決」的主張，招來島內外統一派的各種指責。此外，黨外激進人士許信良「反復衝鋒」式的闖關回台，亦使新黨在公開姿態上，處于為難的境地，既要守法反對暴力，又要支持許氏回台。故選前政治氣氛對新黨是很不利



選舉前反復闖關的許信良先生

的，這是很普遍的看法。

民進黨總得票數的增長，除表明人民歡迎兩黨競爭的民主政治外，還說明新黨在「黨外」階段便已積累了充分的選戰經驗。民進黨候選人在各選區普遍高票當選（僅謝長廷一人意外落選），票源分佈平均，穩定，可見僅有兩月黨齡的新黨在組織競選方面的經驗是優于長期執政的國民黨的。「世界日報」台北記者戎撫天在「民進黨獲得結構性成果」這篇文章中說：「民進黨似乎已得到『結構性』支持，而非偶然的僥倖。」這一分析是相當有道理的。

民進黨做為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第一個反對黨，任重而道遠。筆者為民進黨在本次選舉活動中，表現出的高度理性和政治運作成熟，表示寬慰。它在處理許氏回台和桃園機場衝突事件時，能夠保持民主的立場與平和的態度，說明該黨的前途是很看好的。對於海內外有爭議的「住民自決」的立場，筆者認為，儘管從字面上看，這是一個符合民主精神的提法，但在現實中，這種提法與台獨傾向是有關聯的。如果整個中國都實現了民主化，提出這樣的問題，也不會引起尖銳的衝突。因此，這樣一種層次的問題，只有待兩岸都實現了民主化之後提出，才是適宜的，否則可能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

(三)民主意義高于黨派選舉勝敗

筆者認為，選舉結果究竟誰獲得了勝利，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灣終於走上了有反對黨競爭的民主政治軌道。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的選舉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民主的實踐，其真正的意義在於此。從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看，政治民主化已成為本世紀末世界的主要趨勢。自今年三月菲律賓馬可仕獨裁政權倒台以來，引起了亞太地區許多國家與地區出現連鎖反應。而蔣經國在台灣適時地開放黨禁，對新黨成立的忍讓態度，則是極其明智的，贏得左、中、右、獨的一致讚許。

台灣島內的形勢發展是令人鼓舞的。自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等民主先驅的努力開始，台灣的民主化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然而，由於台灣人民的持之以恆地努力，由於經濟的成功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台灣的政治也出現了良性的變化。這種情勢亦使得國民黨不得

就選期間有人在街上燒國民黨的御用宣傳品。



不面對新形勢，改變了「以不變應萬變」的僵化政策，取消「戒嚴令」，開放黨禁，徹底實行孫中山的「政黨政治」構想。從這種意義上講，國民黨已向成熟和開明演變，這也是非常可喜的事態。雖然國民黨在本次選舉中與上次選舉比，失去了幾席選額，但筆者認為，只要能使台灣政治向民主化方向進展，國民黨即使失去了半數席位，亦雖敗猶榮，它將會因反對黨的制衡與挑戰而改善。而力主開放黨禁、推動政治革新的蔣經國先生，將在歷史上獲得一個值得讚許的地位。

（四）台灣政治發展對大陸造成心理衝擊

作為一個中國大陸人，筆者深感台灣形勢的新發展，對大陸人的心理衝擊和影響。中共與國民黨同為一塊土壤、一個時代的孿生兄弟。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一個一黨獨大，一個一黨專政，兩黨都與對方誓不兩立，遂造成中國國土分裂的悲劇。于今，國共兩黨都在

搞政治革新，而客觀上，本次新黨成立與民選，已使得台灣在民主化方面走到了前頭。筆者認為，目前中共強烈呼籲統一祖國，但如兩岸人民不僅生活水準有差距，而且政治差距亦越來越大，統一的要求將難以被台灣人民所接受。但如果中共在大陸能夠實行民主，政治昌明，那麼台灣對祖國的向心力，自然會出現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面臨嚴重的政治瓶頸，這方面中共本身亦有所認識。然中共已對尚未開始的政治改革，劃定了一「體制內」的界限。相形之下，中共的政治改革魄力已遠遜于台灣。中國大陸理論界正對台灣的民主試驗注以極大興致，甚至在言論上躍躍欲試，他們自然地會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台灣能組黨，大陸為何不能組黨？筆者相信台灣政治民主化進展，將會促使中國大陸的改革，朝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中國的政治會進步，中國的政治一定要進步！

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兩岸風雲●

公廁與文明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

國內自實行「開放、搞活」這幾年，千方百計引進先進國家的資金、科技、經營管理方法等等，現在連公共廁所也開始引進了。

據悉不久前，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第四次訪

華，贈給中國兩套先進的公廁設備，於是北京興建了兩處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化公共廁所。親友來信還特意提及此事，字裡行間喜形於色。可見一向只重視吃而不講究拉的同胞們，對

於修建一處現代化公廁的興奮心情，並不亞於修建長城飯店。

說我們的同胞只重視吃而不講究拉，並非大家真的不願「講究」，而是實在沒有「講究」的條件。就看國內幾十個開放的大城市吧，幾乎街上找不到一處清潔像樣的廁所。去年，政府有關部門曾對全國十大城市的公廁進行過抽樣調查，結果無一處符合起碼的衛生標準。不是「糞便四溢，臭氣薰天」，便是「年久失修，危樓欲傾」，使人望而怯步，嗚呼，哀哉！

國內的同胞總算經歷過長久鍛鍊的，當腹壓漲到忍無可忍的情急之際，也敢去應付一下那種使人望而生畏的公廁。可憐的是外國遊客和僑胞，進入那種公廁，真如進了地獄、刑場。只有怨恨自己山珍海味吃得多了，為貪口福而不顧「後事」。許多去過大陸的外國遊客，至今對中國的公廁談虎色變，甚至因此而不想再去中國。

六年前，王崇倫在北方某城市任市委副書記時，曾抓過豆腐供應，解決市民吃的問題；也抓過公廁的建設，解決市民拉的困難，是位能考慮到抓兩頭的幹部。後來抓豆腐雖有了起色，但修公廁却未能落實，原因是國家缺乏經費，這也是全國普遍存在的難題。自古云：「民以食為天」、「活人不會讓屎尿憋死」。所以，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情況下，還是先緊吃的一頭抓，拉的問題暫且「發揚傳統」。然而，國家是否真的窮到連廁所都修不起的程度？一顆原子彈，一架軍用飛機的價值能修建多少公廁？筆者不會算這筆賬，但人們會思考一個問題：將龐大的軍費開支只要削減一個零頭，大概全國的公廁都可以實現現代化，根本不必連公

共廁所也要靠洋人援助、施捨。

日本的城鄉各地都十分注重公廁，不僅數量多、方便；而且設備現代、整潔。到日本人的家中做客，觀察主人的文明素養程度，先要留神他家的廚房、廁所，即可知其大概。憑心而論，日本人的家庭無論貧富，廚房、廁所都相當整潔、衛生，因為他們將此視為文明的一種標誌。文明的真正體現往往是在那些容易被忽視的方面和角落，而不是做作的自我標榜。

前些年提倡「五講四美」，公廁始終「美」不起來，現在又強調「兩個文明一齊抓」，公廁依舊不「文明」。癥結究竟何在？倘若中國連修建公廁也要等靠外援，即使我們將「文明」的口號喊得再響，也不過是一種自我嘲諷而已。

●兩岸風雲●

中國已簽署國際禁止酷刑公約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馬燕

的部分條款表示了「關切」。這種「關切」也許意味着中共未來某些實際做法的可能性，即全面、徹底地接受該公約的精神並執行其條款，或是部分地、有保留地執行其條款的規定。

中國政府能夠注意到基本人權與人道主義這無疑是可喜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實際的所做所為。如果徐文立、魏京生等人仍在獄中受着「不人道的、有辱人格尊嚴的待遇」，那麼簽署國際禁止酷刑公約只能說是對於國際輿論的一種欺騙而已。



差不多

一九八七年二月
華君武作

李根道競選雖敗猶榮

(台灣留學生·美國) 林雄高

中國之春曾於上期(總四十三期)刊出我投寄給貴刊的一篇訪問記,談大陸學者、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之弟李根道教授在台灣競選一事。在那篇稿中,我向貴刊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息:李根道競選立法委員。事實是,他競選的是國大代表。無論是立法委員,還是國大代表,在台灣都相當於國會議員。

台灣此次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增額選舉,已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結束。

李根道教授在其本選區——台中市,以獨立候選人的姿態,向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提名的候選人進行挑戰。由於勢單力薄,沒有組織的強有力支持,李根道教授落選了。

但是,李教授此次競選也頗有斬獲。

第一,李根道教授是中國大陸赴台學人中,第一位敢於站出來,以「第三勢力」的姿態,與國民黨競爭者。李教授挺身而出,為今後大陸赴台學人參政,鋪墊了道路。

第二,李根道教授此次競選,在本選區中獲得了一九〇〇五票,台中選區中,得票最多者為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謝憲明,為七二四七一票。得票最低者為民社黨候選人賴超明,獲二六五〇票。李教授首次參選,單槍匹馬就獲得了近二萬票,應該值得欣慰。

第三,李教授通過此次競選,擴大了知名度,建立了關係網,聯絡到不少支持者和同情者,同時也積累了選戰經驗,為今後參選從政,準備了條件。

現在,台灣很多人在議論「第三黨」的籌組問題。所謂第三黨,是既不同意國民黨的偏安保守、又不同意民進黨的自決和台獨傾向的黨,是更具理性的黨。第三黨可否成立?如何成立?李根道教授願否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都是我們台灣人關心的事。

中國通過了試行企業破產法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彭秋野

受到各界普遍關注的中國大陸企業破產法(試行)已經被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為在全國範圍內制定和實行企業破產法提供經驗,中國從一九八五年年初開始就先後在瀋陽、武漢和重慶三大城市進行了建立企業破產制度的試點。瀋陽是率先進行企業破產試點的城市,瀋陽規定,企業長期經營虧損嚴重,失去償債能力即為達到破產界限。對這樣的企業,市政府要向其發出「破產審誠通告」,限

令一年整頓,逾期不能復甦的,則宣告破產。

在吸收瀋陽、武漢、重慶三市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經過充分醞釀和討論,擬訂了中國企業破產法草案,於今年八月提交六屆人大常委

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在這次會議上,許多委員認為,目前公佈、實施「破產法」的條件不成熟,影響企業經營管理的客觀因素很多,企業還不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企業的自主權很少;價格體系沒有理順,企業各種雜稅太多;而且關於工業企業的幾個重要法律尚

未公佈。在這種情況下,頒佈「破產法」,執行起來會有困難,因此,在這次會議上,企業破產法草案沒有被通過。

但是,企業破產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客觀存在。多年來,中國國營企業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發生虧損。這些企業的資產已經虧損完了,失去了自身償還債務的能力,實際上已經破產,只不過以前沒有採取破產處理辦法,而是由國家財政予以補貼。現在,通過了企業破產法,全民所有制企業一旦宣告破產,將以國家委託它經營管理的那部份財產抵償債務。實施企業破產法,有利於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有利於打破「大鍋飯」、「鐵飯碗」制度,消除平均主義,這將對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素質,加速技術進步,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台灣與大陸，看誰更民主些！

——「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文章選登

正確對待資產階級統治時期所創造的文明

摘自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海外版

周修強

在此，特推薦「人民日報」和「中央日報」的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形成比較。「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分別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機關報，這兩黨能夠在民主的認識上，有所增進，是值得人們加以鼓勵的。然而，由於兩黨的局限性，這兩篇文章在闡述民主的問題上，都還有欲語還休之處。我們的讀者和海內外廣大華人，都密切注視着國共兩方的漸變，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相信台灣和大陸的當局與民眾，都有一種不落人後的心情。那麼，來一場民主競賽吧！願中國在未來的時間裏，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指出：「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這個論斷將使人們的一些模糊認識得到澄清，是很有必要的。對這個問題，我們某些同志思想上還有些疙瘩；國外則有人認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是權宜之計，過些時候又會把大門關閉起來。這些疑慮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他們對中

國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情況缺乏瞭解。開放，決不是哪一位領導人心血來潮想出來的點子，而是基於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而作出的決策。

世界文明發展到今天，國與國之間的聯繫緊密而頻繁。任何國家要發展和進步，不學習和接受別國先進的文明，是不可能的。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就得落伍「挨打」。要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科學文化的落後狀態，必須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面向世界，積極吸收當代世界優秀的文明成果。正是根據對歷史、現狀及發展趨勢的認識，對外開放作為我國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被提了出來……

不僅在物質文明方面，不能把資產階級統治時期的創造當作資產階級特有的，在政治領域中許多東西也是如此。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形成的一些具體制度和觀念，當然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同時也反映了人類發展到這一歷史階段對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認識和要求。普選制就是一個實例。普選，即公民普遍參加國家權力機構的選擇。「普選」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反對封建專制的政治

口號。資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以後，對選舉和被選舉資格作出了種族、財產、居住年限等種種限制，實際上使之成為「有限的普選制」。這一點才是資產階級特有的。然而，無產階級並不因為資產階級實行普選制有局限就摒棄它。相反地，無產階級要破除的只是它的局限，更為充分地發展它的民主性的一面。無產階級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就採用普選制。我們國家的各級權力機關也是在普選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裡，被搞得最為混亂的是自由、民主問題。自由、民主是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在反對封建專制時提出的進步口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總是把自由、民主當作資產階級獨佔的口號，這是很不恰當的。應該看到，自由和民主的提出，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不但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中，自由和民主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鬥爭中，也一直使用自由和民主的口號。資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以後，採取種種措施來限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這是資產階級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剝削和統治所帶來的局限。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自由、民主，更不能把自由、民主當作資產階級的私產。我們決不能把自由、民主的口號拱手讓給資產階級，而是要更高地舉起民主、自由的旗幟。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真正地、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開闢了道路。社會主義要摒棄的只是資產階級給民主和自由

帶上鍊鏢而已。人民的民主，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聯繫在一起的。我國經歷了幾千年封建統治，近代又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包袱十分沉重。要在這樣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很長的過程。加之建國以後，特別是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和領導體制上權力過分集中，延緩了民主發展的進程。……

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一百五十四頁）民主主要制度化，在發揚社會主義的同時，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視為「洪水猛獸」，「與無滅資」的口號就盛行過相當長的時期，影響至今猶存。其實，把資本主義時期所創造的思想文化都當做腐朽的東西，拒於千里之外，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因為，在思想文化領域，人類認識的歷史連續性，是那顯而易見。人類發展到資本主義時期，由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提出的觀念、思想和理論，雖然有許多是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但同時也反映了人類發展的認識水平。因此，這些觀念、思想和理論，既是資產階級的精神財富，又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歷史思想家（歷史在這裡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神學的——總之，一切屬於社會而不僅僅屬於自然界的領域的集合名詞）在每一科學部門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

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致弗·梅林」，「馬恩選集」第四卷第五百零一頁）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學說，應該是階級性最強的科學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就是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創造的理論中最有價值的內容的結果。列寧在無情地抨擊「無產階級文化派」時說：「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論無產階級文化」，「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三百六十二頁）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創造的思想文化採取分析的態度。我們要吸取一切有益於我們的東西，要抵制的只是那些腐朽的東西。……

●兩岸風雲●

對當前國內政情發展的幾點觀察

——兼論許信良返國之時機

（原載《中央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八日）

黃光國

建立民主政制解決中國問題

七十五年度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從十一月廿一日開始，正式展開競選活動。在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這次選舉能否順利舉辦完成，將具有十分深遠的涵意。今年九月廿八日，「民主進步黨」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方式宣告成立。十一月十一日，「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組成正式組織。執政黨盱衡國內外政情發展之局勢後，宣佈採取「不承認，不取締」之對策。換言之，開放組黨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所以對新組成的「民進黨」未便予以取締；可是在「人民團體組織法」修訂完成之前，政府對人民組織之事又無法律可供遵循，因此也不能立刻予以承認，一切都必須等到「人民團體組織法」組織完成後再說。在這種態勢下，「民進黨」雖然尚未取得合法政黨之名，却已經有了政黨組織之實；而今年度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在新黨成立後，形成國內首見的「兩黨競爭」之局面。

這種局面的形成對於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甚至對於中國民主政治前途，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我個人一向主張兩黨式或多黨式民主政制。在我看來，將來中國問題的解決，取決於海峽兩岸能否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制。我們在臺灣建立兩黨或多黨式的民主政治之後，將有力地鼓舞大陸上的民主運動，進而迫使中共開放政權，而不得允許大陸人民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制。唯有在海峽兩岸都建立兩黨或多黨式的民主政制之

後，中國問題纔有根本解決之日，中國纔有統一的可能。如果國民黨和共產黨分別在臺灣和大陸堅持「一黨獨大」或「一黨專制」的路線，則任何形式的中國統一，都等於宣佈內戰重新開始；如此一來，中國問題豈能獲得解決。

台灣不需革命亦無分離意識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希望執政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民進黨」在心態上都能夠作一番大幅度的調整；請你們把對方看做是中國走向民主之途的競爭伙伴，不要把對方看做是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在我看來，當前的臺灣並不需要「革命」，國民黨也不應當成為「革命」的對象。國民黨過去在臺灣執政的四十年間，雖然有過不少缺失，但是國民黨對臺灣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貢獻，却是不容否定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民黨也將繼續是維持臺灣政治安定的主導力量。在這種局面下，反對勢力豈可輕言「革命」？

同樣的，國民黨候選人也不應一味跨大「民進黨」的「分離意識」。「民進黨」是從臺灣本土社會中自生出來的政治勢力，這種草根性的政治勢力當然會有比較濃厚的「本土意識」。值得強調的是：「本土意識」並非「分離意識」，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比方說，「民進黨」曾經提出「自決救臺灣」的政治口號。其實「自決」並不等於「臺灣獨立」。如果國民黨在未來的歷次選舉中都能穩定獲得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選票，「自決」的結果，不過是支持國民黨當前的政策而已；執政黨對「自決」一詞何須太過敏感？

「民進黨」組織成立後，有些人大聲指責：「民進黨」在其黨綱，黨章中未曾明載蔣總統經國先生所昭示的三原則：「遵守憲法、反共、反臺獨」。其實，大家都知道：「遵守憲法、反共、反臺獨」是我們當前的國策。任何人有違反國策的具體事實，政府都可以繩之以法。新黨亦不例外。可是，國民黨却不能要求新黨按照國民黨的標準來制定黨綱和黨章。如果新黨的黨綱和黨章完全符合國民黨的要求，那麼「民進黨」豈不又變成了國民黨的尾巴黨派？

目前當非許信良返國良機

行文至此，我不能不再度表示我對許信良回國一事我的看法。最近報載：許信良預計於十二月一日闖關回國。桃園地區的黨外人士已經發起

一個目標為五至十萬人的簽名運動，支持許信良等人返臺。我十分瞭解：許氏是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人物。當年他撰寫「風雨之聲」一書，強烈反映出他的道德勇氣；他在桃園縣長任內的治績，至今猶為地方人士所津津樂道。許多人即使不贊同他在海外的政治主張，他仍然可能支持他返臺回鄉。然而，我却認為：目前並不是許氏返回最恰當的時機。更清楚地說，如果執政黨堅拒任何政治革新，又以鐵腕取締黨外人士組織新黨，則以許氏個人的政治魅力，挾其在海外的激越主張，一旦闖關回國，便很可能像艾奎諾或金大中般，激起反政府的浪潮，進而迫使政府從事政治改革。

然而，當前臺灣的政治情勢是否已經演變到非要許氏回來引爆「革命」的地步？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否定的。目前執政黨正在擬議六大政治革新方案，其中最重要的「開放組黨」、「解嚴」二項，已經獲致初步結論。「民進黨」倉促宣佈組黨之後，還來不及進行內部整合工作，便已經投入今年度的激烈選戰。當前國內政治的民主前途，可以用「曙光乍現，前程尚遠」八個字來加以形容。在這種態勢下，國民黨和「民進黨」雙方都應當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互相忍讓，在和諧的氣氛中辦完這次選舉，然後「民進黨」才能夠一面整合內部，一面督促執政黨進行六大政治革新方案。如果許氏堅持己見，不顧一切回國闖關，群衆前往機場迎接，情治人員一方面要堅拒許氏入境，一方面要維護機場安全；萬一雙方發生衝突，釀成類似「中壢事件」或「高雄事件」之類的悲劇，則國內民主運動必然會再度面臨大幅度的倒退，「民進黨」的前途也難以預卜。在這種狀況下，請問：許氏此時返國對臺灣的民主運動，究竟是有功？還是有過？

不必玉石俱焚可暫保全實力

以許氏當年與友人合寫「臺灣社會力之分析」時展現出來的晰理透剔，我不相信許氏看不出當前臺灣的情勢。許氏此刻之所以堅持要返國，不過是因為他已經對外作出承諾，騎虎難下而已。然而，「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許氏究竟會了維護自己的面子，不惜玉石俱焚，而一意孤行到底？還是會顧念臺灣的民族前途，暫時保全實力，毅然取消此次回國闖關之行？現在該是許氏衡量客觀局勢，有所抉擇的時候了！（原載十一月廿五日自立晚報，作者現任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 在於所有制改革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痴心

一、引言

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改革剛開始時，許多人認為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稍後，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是經濟改革要學習西方先進的企業管理方法。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當農村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就時，實行集體或個人承包責任制的觀點佔了上風。一九八四年十月公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改革方案。今年五月以來，國內思想領域比較活躍，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及國內其他學者相繼提出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所有制改革。上海一些理論工作者在討論中認為，所有制改革的關鍵是國家所有制的改革（注1）。張維迎從改革財產關係與放活市場兩方面論述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也討論了所有制問題（注2）。企業股份化也在討論之中（注3）。

作者的觀點是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所有制改革。先進的企業管理方法、擴大企業自主權、物價改革、工資改革等等改革措施，只有在

適當的所有制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本文將闡明各種經濟制度的優缺點，論述為什麼所有制改革是經濟改革的關鍵，指出經濟改革應有的目標及採取的適當步驟，並討論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

二、中國經濟改革七年來的成就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經濟改革逐步展開。開始主要形式是「小組承包」，很快就發展成「包產到戶」。到一九八二年秋，全國農村大部分地區由「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改成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承包責任制」。一九八三年開始，經濟改革由農村向城市擴展。在城市，改革在開始時是學習西方的企業管理經驗，繼之是推廣承包責任制，然後是按行業組建公司、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及實行物價改革、工資改革等。

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趙紫陽總理的報告（注4），在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農村經濟改革比較成功，在這五年內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

長百分之八點一，這是自一九五三年以來最高的農業增長速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注5），一九八五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人民幣七七八〇億元，人均七四四元。

城鄉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根據趙紫陽總理報告（注4），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七，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九。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注5），一九八五年農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人民幣三九七元，城市居民則為七五二元。雖然許多城鎮居民抱怨蔬菜與副食品價格上漲太快，但把食品、服裝、家庭日用品、耐用消費品等各類消費品及各種服務的價格綜合考慮在內，通貨膨脹速度還是低於城鎮職工工資上漲速度，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提高了。農民生活的改善則更為顯著，城鄉差別有所縮小。在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飢荒之中，成千上萬的農民活活餓死。在七十年代，農村情況比「三年困難時期」好得多，餓死的人很少。但農民仍然十分貧窮，時常要用南瓜、蘿卜之類代替主糧，有時甚至須用蕨根、葛根之類充飢。許多邊遠山區的農民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在天府之國

的四川省，用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糧票買一個十八至二十歲大姑娘的事例屢見不鮮。

過去，雖然農民之間的貧富差別較小，但實際情況是「共同貧窮」。現在，雖然農民中貧富差別比十年前略有增大，但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更重要的是，農民在生產上有了較多自由，所以巴結、賄賂當地幹部的事例也大為減少。

然而，在城市經濟改革中也出現了種種問題。例如，幹部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黨政幹部及其子女親屬蜂擁經商；企業、事業單位濫發獎金或實物；通貨膨脹；一部分行業利用其壟斷地位損害社會利益，如許多地方出現「電霸」、「水霸」，鐵路系統野蠻待客、野蠻裝卸；等等。這種種弊病已經嚴重阻礙經濟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保守分子亦以此作為反對改革的借口。

我認為出現這些弊病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方面。第一，城市經濟改革中沒有進行最關鍵的所有制改革，沒有對蘇俄式的計劃公有制經濟制度作出根本性改變。當舊的所有制沒有改變，壟斷結構繼續存在，公平競爭而又相互制約的市場經濟系統沒有建立時，僅僅放鬆政府管制，部分地引進市場機制，不一定能使社會獲益，反而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利用其優越的地位損害社會利益。例如，當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並存時，因為對生產資料與原材料的分配實際上很難有客觀標準，這就促使企業向掌握物資分配大權的政府官員行賄以便獲得廉價的計劃物資；這些官員不是聖人君子，自然會利用其對計劃物資的分配權「以權謀私」。當擴大企業自主權時，企業的行為可能無人約束，經理人員關心的是他們自己與工人的工資與福利，對於擴大再生產並不真正關心，這就導致濫

發獎金與實物，出現消費基金膨脹。相反地，在市場私有制經濟中，由於市場是公平競爭的，物資分配官員沒有可供賄賂的機會；濫發獎金的經理一定會被股東們解僱；損害公眾利益的壟斷者會受到競爭抑制與法律懲罰。因此，不會出現上述弊病。關於這一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博士候選人楊小凱有過精闢的論述（注6）。

第二，政治與經濟沒有同步改革。中國目前狀況是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沒有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難以成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寫道（注7）：「我們目前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難，主要不在於引進了市場機制，根本問題是沒有充分保證人民應有的參政權、發言權、決策權。缺乏民主成為改革的重要障礙。」真是切中要害。

三、四種經濟制度的比較

目前世界各國的經濟制度可以說是千差萬別。根據所有制形式與作出經濟決定的過程，這些經濟制度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如美國、日本、西歐諸國，以及新加坡、香港、台灣、南朝鮮等地區。這類經濟中所有制以私有為主，伴有不同數量的國營企業；作出經濟決策時以市場方式為主，伴有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預，因此可稱為市場私有制。中國、蘇聯、東歐諸國、北朝鮮、越南、古巴等國實行的經濟體制可以歸納為第二類。在生產資料上以公有制為主，雖有不同程度的私有經濟成份如個體戶；在經濟決策中以中央計劃為主，地方與企業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因此，這類經濟可稱為計劃公有制。第三類經濟制度以南斯

拉夫為例，處于以上兩者之間。對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但企業的生產活動主要由市場調節，因此可稱為市場公有制。第四類經濟如薩爾瓦多、索莫查統治下的尼加拉瓜、杜瓦利埃父子統治下的海地、四十年代的中國，等等。全國經濟由幾個極富裕的家族控制，大多數人民生活於貧困之中，這類經濟應稱為壟斷私有制或封建私有制。這裡所說的封建私有制與數百年前封建社會中的封建私有制不完全相同。當時的封建私有制之特徵是地主擁有大片土地，而農民一無所有，生產商品化程度低。現代的封建私有制之特徵是數個家族壟斷全國經濟，攫取超額利潤，貧富懸殊，而生產商品化程度則較高。除了上述四類經濟外，還有一些國家處於過渡性經濟。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正在從封建私有制向市場私有制過渡。再如印度、坦桑尼亞、贊比亞等國，其國營經濟佔主導地位，但並不否定私有經濟，處于封建私有制與計劃公有制之間。

中國在四十年代實行的是壟斷私有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壟斷全國政治與經濟，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等損人利己的自私自利行為未受到足夠限制，再加上連年戰爭，造成經濟停滯，貧富懸殊。一九四九年以後，照搬蘇聯的計劃公有制經濟制度，全盤否定私有制，使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被扼殺，經濟發展缺乏原動力，經濟發展緩慢。

(一) 各種經濟制度的優缺點

關於何種經濟制度較為優越的問題，多年來爭論不休，眾說紛紜。一般說來，各國執政者總愛把本國實行的經濟制度說成是最優越的。我認為，判斷一種經濟制度是否優越，不

應該根據某種「主義」，某位偉人的言論，而應該分析經濟是否得到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迅速提高並享有較多自由。應當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各種制度均有其長處與短處。但對各種制度加以認真的分析比較之後，我們會找到相對來說長處較多而短處較少的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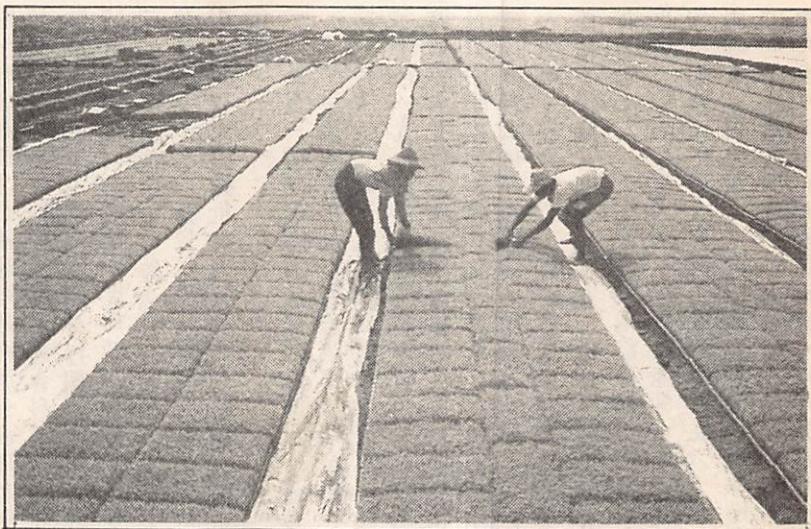
1. 壟斷私有制

在這種制度下，全國經濟由少數富有家族控制與壟斷，廣大人民生活在貧困之中。既無社會公正可言，經濟發展又慢。這種制度的缺點遠多於優點，故應被淘汰。對於這種制度，應該採用和平方式剝奪富裕家族的壟斷權力，使封建私有制逐漸轉變為市場私有制。五十年代初台灣在農村實行「和平土改」，由政府購買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促進了農業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採用暴力革命方式推翻封建私有制往往導致一個新的專制政權，並不理想。例如七十年代末，伊朗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巴列維國王封建政體，但產生了霍梅尼專制政權，並未給伊朗人民帶來幸福。

2. 計劃公有制

計劃公有制經濟有許多優點。首先，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理論上沒有失業，醫療免費，退休後生活有了保障，給人一種安全感。它也沒有激烈競爭使人覺得舒適而不緊張，貧富差別較小。其次，對於經濟落後國家，計劃經濟可以利用政府的力量，學習工業化國家經驗，在短時期內建立起大規模的骨幹工業體系。再次，計劃經濟可以比較容易地控制積累基金與消

台灣實行的土改很成功。



費基金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對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再生產的投資，以利經濟成長。計劃公有制的致命缺點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公有制否定了人們本性中自私的一面，不能利用人們的自私行為使個人利益協調發展，因此人們沒有生產積極性，工作效率低。其次，計劃體制容易造成社會性的壟斷，使商品信息被歪曲，結果是資源分配不合理，浪費寶貴

的人力與自然資源。舉例來說，如果國家制訂的能源價格過低，企業就誤以為能源易得，不珍惜使用，浪費短缺的能源資源。

綜上所述，計劃公有制在短期內有其長處，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家，在初期可以使經濟較快發展。但隨着時間推移，其生產效率低與資源分配不合理的缺點便逐漸顯露，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因此從長遠觀點看，計劃公有制不是優越的經濟制度。中國在五十年代利用了計劃公有制經濟的長處，經濟發展很快，以後便緩慢下來。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前半期高于美國，而在七十年代後半期與八十年代則低于美國。

3. 市場公有制

這種制度以南斯拉夫為例，對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但企業按照市場規律運轉。企業主要由工人自治委員會管理，使工人有主人翁感，關心企業盈利，生產積極性較高。企業按照市場規律運行，信息歪曲較少。企業管理人員由工人自治委員會選舉或招聘，不大可能出現市場私有制社會中常見的勞資糾紛。因此在短期與中期，經濟能得到較快發展。

這種制度的弊病是經理人員只對選舉或招聘他們的工人負責，所以每當企業獲得利潤時，大部分利潤會被用於工資增長或獎金，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很少，對經濟長期發展不利。另外，現有企業工人不歡迎新工人來分享利益，導致失業率增高。南斯拉夫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經濟發展較快，一九七五年國民生產總值為一九五〇年之四倍。進入八十年代後緩慢下來了。今年上半年南斯拉夫外債總額高達二百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達百分之八十，

全國六百萬勞動大軍中失業人數達一百一十萬。

4. 市場私有制

市場私有制是一種比較先進的經濟制度，優點頗多。首先，公平競爭與法律抑制了人們損人利己的自私行為（如嫉妒、壟斷、敲詐）；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鼓勵了人們發揮生產積極性，減低不必要的浪費，給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其次，市場的自動調節，使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大體上有效地分配到各行各業，有效地生產出符合人民需要的物品和服務。再次，人民享有較高的經濟自由。在法律允許下及個人能力範圍內，人民有開辦各種企業，從事各種工作，及選擇、消費各種產品的自由。最後，市場私有制下的經濟分散決策，有促進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的作用。

當然，市場私有制並非十全十美。這種制度強調的是機會均等而不是結果均等。由於人與人之間能力不同，努力程度不同，在一生中的機遇也不相同，最終的結果一定會有不同，出現一定程度的貧富差別。縮小這種貧富差別的途徑不是由此否定市場私有制，而是由政府採取一些「均貧富」政策，例如個人收入累進稅制、社會保險與福利等政策，幫助老弱病殘及失業者。

毋庸諱言，與其它經濟制度一樣，市場私有制也有種種弊病，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這已經在一些歐美國家顯示出來。也許在將來，世界上會出現更為合理的經濟制度。但在目前條件下，在現存的壟斷私有制、計劃公有制、市場公有制與市場私有制幾種經濟制度中，市場私有制缺點較少而優點較多，是一種比

較先進的經濟制度。最近二百多年來，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先後由封建私有制轉變到市場私有制經濟。隨着這種制度帶來的經濟繁榮，一定會有更多國家逐漸過渡到市場私有制經濟。同時，市場私有制本身也會日臻完善。

(一) 實踐是檢驗經濟制度的標準

判斷一種經濟制度是否優越，不能僅靠理論，社會實踐才是檢驗各種經濟制度優越與否的標準。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很難在實驗室裡把衆多因素分隔開來逐個實驗。世界各國實行着不同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產生不同的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其它因素如國民素質、教育水準、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地理位置等對經濟發展影響也很大，但制度因素恐怕更為重要。

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比較常用的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GNP）。表一列出部分國家與地區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三年國民生產總值與人口之增長倍數（本文所談國民生產總值之增長均為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質GNP增長）。可以看出，實行市場私有制的國家，如美國、瑞士、日本、西德，經濟繁榮，人民富裕。尤其是日本、西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迅速重建，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內實現經濟起飛，成爲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大國。被譽爲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台灣、南朝鮮亦在六十年代開始實現經濟起飛，現已成爲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值得注意的是，實行計劃公有制的中國大陸與北朝鮮則發展較慢。對於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緩慢這一點，歷史背景、國民素質與教育水準、人口、地理位置等等「客

觀因素」均可給予部分解釋，但我認爲最關鍵的原因是實行了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亦即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計劃公有制在落後國家發展初期有其優越性，但從長遠觀點看並不可取。現在，儘管蘇聯的軍事裝備大致相當於美國，但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美國一半。況且蘇聯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犧牲人民生活的前提之下，其居民的消費水平遠低於美國。日本的領土只及蘇聯的一·七%，人口只爲蘇聯的四四%，原料資源更是不到蘇聯的百分之一，但去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爲一萬七千億美元，與蘇聯的一萬八千億美元相差無幾。

這裡有需要指出，以計劃公有爲主，市場私有爲輔，試圖同時利用二者優點的混合經濟體系並不成功。實行這類混合經濟制度的印度、坦桑尼亞、贊比亞經濟發展緩慢，便是例子。匈牙利實行經濟改革以來，允許某種程度的私有經濟與公營經濟並存，取得了很大成就，一九八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爲一九六〇年的二·八倍。但由於仍舊停留在以計劃公有制爲主的框架上，匈牙利在經濟上與西歐相比距離甚遠，發展速度也遠遠不如亞洲「四小龍」。

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裡，公營經濟部分的生產效率也往往低於私營經濟。在西歐各國與台灣，大多數國營企業的效率比私營企業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國營企業在一九八三年分別虧損了二十八億和四十億美元。日本國鐵一天的虧損就在兩千萬美元以上。英國一九七九年國營企業的產值相當於國內生產總額（GDP）的十分之一，全國投資的百分之十五是投在國營企業上，然而國營企業的投资效率却幾近於零。印度「社會主義」公營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國營公司控制着全國四分之三的工業

資產，但其生產只佔印度工業生產的三分之一，大多數經營管理混亂，連年虧損，管理人員貪污受賄。在匈牙利，私營經濟所使用的勞動力僅為全國勞動力百分之五，而其產品與服務據估計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民自留地裡的莊稼總是長得比生產隊地裡的好。當時，得到大量國家投資、擁有眾多農業機械、大規模生產的我國國營農場生產效率比集體所有制的農村生產隊還要低，十個有九個虧損。

根據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歷史與現狀，研究各國不同的制度實踐與經濟發展速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私有制經濟不僅優於壟斷私有制，也勝於計劃公有制與市場公有制。

(三) 市場私有制會導致兩極分化嗎？

反對發展私有制經濟的主要理由是私有制會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我認為壟斷私有制的確會造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而市場私有制則雖有貧富差別，但並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由於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是殘酷的，正如馬克思所論述的那樣。隨着社會的發展，工人的勞動時間減少，工資與福利提高，資本家投資的利潤率會降低，貧富差別會縮小。這已為過去八十年來美國及西歐的歷史所證明。

談到貧富不均，有人往往僅比較全國最富裕的個別人與最貧窮的少數人，而忽略佔人口多數的其他階層，這是不科學的。我們必須研究財富在各階層人們中的分配狀況。表二為部分國家與地區個人收入之分配狀況。按照收入高低將所有家庭分成數目相等的五個組，列出

每組家庭之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數，並觀察收入最高組與最低組所得之比。

從表中可以看出，貧富差別較大的國家多為低收入、的壟斷私有制或封建私有制經濟，如尼泊爾、肯尼亞等。實行市場私有制的工業化國家，貧富差別並不大。日本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實現經濟起飛，今天却是世界上所得分配最平均的國家之一，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所得之比僅為四·三。荷蘭、比利時、西德的貧富差別也不大。台灣在五十年代初反對壟斷，鼓勵競爭，並在農村實行「和平土改」，縮小了貧富差距；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經濟起飛，貧富差別進一步縮小，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所得之比由一九六四年的五·三降低到一九七九年的四·四。市場私有制經濟中貧富差別較大的香港、南朝鮮、美國與加拿大，其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所得之比為七至八。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市場私有制並不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從表二還可看出，實行計劃公有制的中國、匈牙利與實行市場公有制的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高收入組與低收入組所得之比為五至六，貧富差別遠小於壟斷私有制經濟，與市場私有制經濟相比則無明顯區別。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裡，貧富差別雖然不大，但這是用行政手段均分財富所造成，結果是扼殺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經濟發展緩慢，所以並不可取。

四、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

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所有制改革。在逐步改革所有制的同時，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與消費市場），將經濟制度由蘇聯式的計劃公有制

轉變為高效率、高速發展的市場私有制。所有制不變，只實行其它改革如承包、利潤留成、企業擴權、物價與工資改革等，經濟雖有發展，但不會起飛。稍一不慎就可能導致經濟混亂，一九八四年底至一九八五年的混亂就是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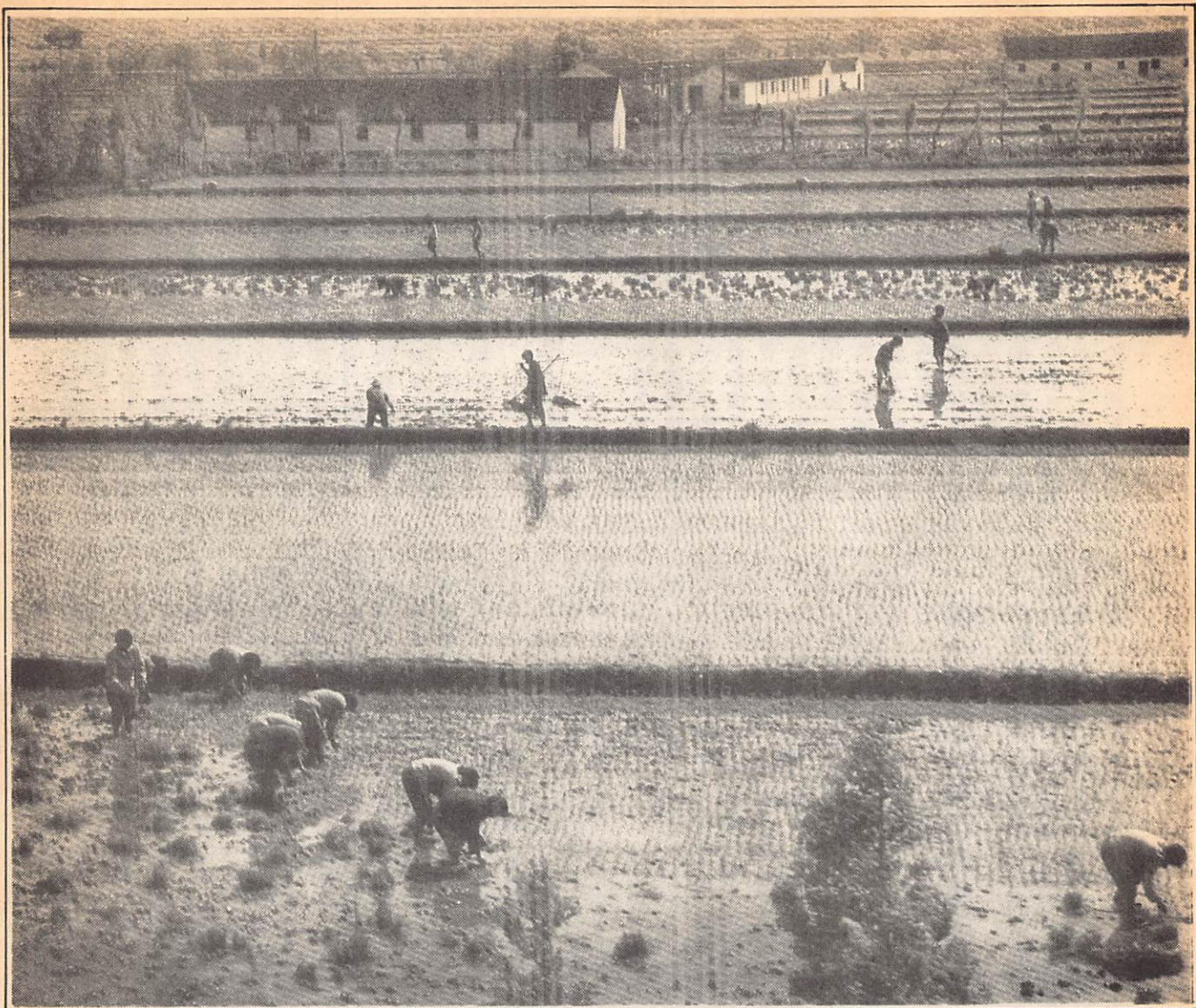
七年來，農村改革比較成功，實際上是因為放鬆管制，所有制有了部分改變。雖然農民對土地只有經營權而無所有權，但由生產隊經營變成家庭經營，集體所有制實際上變成了半私有制。城市改革成效不顯著，主要原因是沒有改革所有制，並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

(一) 三十七年來我國所有制變更的回顧

一九五〇年以來，我國在農業、工業、商業及其它領域先後實行過所有制變革，其中農業變動比較頻繁。這裡先以農業為例，回顧三十七年來我國所有制的變革。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我國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摧毀了舊的封建私有制經濟制度。廣大農民分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高漲，農業迅速從戰爭的創傷中得到恢復。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全國基本上實現由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農業集體化。農業第一次由私有制變成以合作社為形式的集體所有制。在初級社裡，大部分收入按勞分配，少部分收入按生產資料（土地、農具、耕牛等）分配。在高級社，全部收入按勞分配。高級社一般以村為單位，每社三百到一千人。這次的農業集體化限制了農民發家致富的思想，雖然在短期內（一九五四—五八年）未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



大陸農民承包責任田後，農業出現了生機。

響，但集體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病給後來幾十年的農業發展緩慢種下了禍根。

一九五八年，農業的基本組織形式轉變成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一般以原來的鄉為單位，小者（如山區的一些人民公社）六千人左右，大者（如廣東省的一些人民公社）三萬人左右。先是土地、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歸人民公社所有，後來連鍋、碗等傢俱也要歸公。人民公社化加上大躍進，立即導致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大飢荒。有人估計當時餓死的農民人數是數百萬，更多的人則估計是兩千萬。雖然當時伴有自然災害，但制度方面的問題可能是主要原因，正如劉少奇所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一九六一年制訂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六十條」，規定人民公社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形式，把公有化程度由人民公社降低到生產隊一級。每個生產隊只有三十到二百人。同時，農民被允許耕種少量的自留地。因為這一點，劉少奇受到農民讚揚。一九六二年起，農業生產逐步恢復，農民生活得到改善。其後在文革中與在七十年代的學大寨運動中，農業雖受到一些影響，但因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沒有提高，農業再也沒有受到如一九五八年式的衝擊。七十年代的農民雖然很窮，有時甚至填不飽肚子，但與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相比好得多，餓死的人很少。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實行農業改革。在頭兩年，改革主要是把生產隊分成數個生產小組實行承包，效果並不理想。一九八〇年至八二年，中共中央果斷地決定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改革。在這次改革中，鄧小平受到人民稱頌

。這次改革實際上是使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再次降低，變成以家庭經營爲主的半私有制。改革的結果是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農業得到高速發展。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國的農業發展速度高於一九五三年至八〇年的任何一個時期。糧食、棉花大幅度增產，多種經營全面發展，社辦工業發展更快，湧現許多「農民企業家」。今天，與農業合作化以來至一九八〇年的任何時期相比，農民都享有更多的經濟自由與人身自由。

然而農業的所有制改革並不徹底，私有制受到太有限制。農民雖然有了對土地的經營權，却沒有所有權。因此多數農民沒有長遠打算，出現了對土地的掠奪式經營。由於土地不能買賣，使得土地難以向種田能手集中，生產達不到高效率的規模。從事其它行業的農民也有後顧之憂，因爲無人照顧他們所承包的土地。

我國在工商、商業、服務業等行業中實行的所有制變革較農業爲少。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對全國政治經濟的壟斷，摧毀了壟斷私有制經濟制度。在此之後，在五十年代，我國依靠國家的力量建立起一大批骨幹企業（其中典型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一五六個大型項目），這些國營企業利用了計劃公有制中規模經濟的長處，爲我國工業化打下初步基礎。但這些國營企業生產效率低的缺點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便逐漸顯露。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至五六年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幾乎所有的私營企業改造成公有制的國營或集體企業。雖然在當時對生產力的影響不大，但公營企業雇員沒有工作積極性，生產效率低的致命缺點在以後二十多年中逐漸顯現，現在幾乎已成爲一種痼疾。這次「改造」的另一個惡果是使人們對私有財產的信心喪失殆盡，相信政府可以任意侵奪私有財產。

產的信心喪失殆盡，相信政府可以任意侵奪私有財產。

（二）中國應該向外國學習什麼？

中國是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進行太多的社會實驗。每次實驗往往影響到幾代人，其損失難以估量。好在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其它國家與地區提供了多方面的經驗，我們不必事事從頭實驗，「走自己的路」。我們所需要做的是比較研究各國所採用的不同經濟與政治制度，把先進的制度拿來爲己所用。

反對向外國學習的人所依據的理由之一是「本國特點」，似乎「本國」就只適用於落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實學習先進的經驗時不必過份堅持「本國特點」，強調「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之類。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後被美軍佔領，在美軍監督下制訂和平憲法，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因而有了今天的繁榮。四十年來，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上迅速成爲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其民族特點並未消失。傳統的中國式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一支優秀的日本文化。人們在研究日本的經濟繁榮時，往往強調管理、技術、教育的影響，却忽視最關鍵的因素——虛心學習先進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但在具體做法上，應依各國特點，也就是依各國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國民素質、教育水準以及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

還有一些人，往往盯住外國的缺點，強調自己的優點，認爲外國不值得學習，這也是十分錯誤的。「三人行必有我師」，任何國家與地區均有其長處與短處，我們應該用人之長，

補己之短。博採各國之長的國家，一定會變成最強的國家。對於美國、日本、西歐，我們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科技與管理，更重要的是學習他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制度，對於他們的社會風尚與道德觀念也不必排斥。

（三）適用於中國的經濟制度

經濟改革的最終目的無非是使人民富足，國家強盛。何種經濟制度能達到這種目的便應採用何種制度，沒有理由劃地爲牢，把自己限制在某種意識形態的框框裡。綜上分析，在目前情況下，比起其它幾種經濟制度來，市場私有制具有較多優點，能夠給經濟高速發展創造條件。中國要想達到經濟繁榮、民富國強之目的，必須採用以市場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混合型經濟。

中國的混合型經濟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應以私有爲主，公有爲輔；在經濟決策上，應以市場爲主，計劃爲輔。具體說來，易於開展競爭的行業如製造業、商業、服務業等，大多數應該是私營企業。由市場競爭決定產品產量與價格。各種生產要素之價格（如工人工資、投資利潤、生產資料價格）等，則由該要素的邊際勞動生產率之價值決定。企業的行爲符合在一定技術與市場條件下使利潤最大化的規律，消費者的行爲符合在一定收入條件下使效用最大化的規律。企業股東、經理人員、工人、消費者以及同行企業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制約而又相互依存。企業與個人利己的自私自利行爲得到鼓勵與發揚，而損人利己的自私自利行爲則受到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最大化的規律使企業必須講究信譽，提高產品質量，因此不會出現國營工廠中那種粗製濫造產品與國營商店

裡那種售貨員冷若冰霜的現象。政府的作用是制訂各種法律與市場競爭規則，反對壟斷，保護公平競爭，就像體育競賽場上的裁判委員會一樣。

另一方面，許多公共產品如國防警察、交通幹線，一些有外部效果的經濟活動如教育、科研、醫院，以及一些因交易費用太高而不易開展競爭的行業如水、電、郵政等，必須由政府直接管理或雖為私營但由政府加以監督。

市場私有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企業股份化。其形式是全民自由參股，企業為股東集體所有。股份制的優點首先是所有制關係具體化，改變中國過去那種在理論上誰都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但誰都對企業資產不負責任的狀況。其次是使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在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生產者之間建立相互制約的關係，促使企業經營行為的合理化。家族企業在創建初期，家族成員同心協力，管理效率很高；由於沒有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規模大了之後往往經營不善，因為這類企業選用人才常常是憑親緣關係而不是看能力，作出經營決策。據統計，美國的家庭企業平均壽命只有二十四歲。股份化的第三個優點是可以籌集社會資金，使更多的閒散資金用於生產性投資。最後，企業雇員購買本企業的部分股票，更關心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在市場私有制條件下，企業的規模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從競爭的觀點看，每個行業都有許許多多的小企業，市場完全競爭的狀況是理想的。但企業規模太小則生產效率低。從生產效率的觀點看，規模經濟有其長處，應當鼓勵大企業發展，擴大生產規模。從動態方面來看，大企業有更雄厚的資金用於長遠投資，用於研究與開發新產品，對經濟發展有利。此

外，為保持公司信譽，大企業往往比較注重產品質量。但企業太大，也會造成管理不善，浪費增多，效益降低。因此企業有某種最佳規模，這種最佳規模隨行業與時代而異。一般而言，較理想的情況是各行業都有數家大企業與一些中小企業，既保護了競爭，又利用了大企業效益高，研究發展經費充足的長處。

與其他行業相比，農業有其特殊性。目前還沒有統計數據能夠證明，在農業上大公司的效益高於小家庭經營。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農業是以家庭經營為主，歐美國家也只有種子、肥料、農藥、運輸、銷售等產前產後服務實現了社會化生產。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從事農業，然而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中國農業又是非常落後的。為促使農業持續發展，必須在下述兩方面進一步改革。第一，用法律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處置，包括作為遺產、轉讓、出賣，這樣才能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而消除目前的掠奪式經營。第二，提高效率。八億農民在這樣有限的可耕地上從事生產，是農業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逐步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其方式不是過去那種農業集體化，而是允許土地轉讓與買賣，鼓勵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這樣，所需的農業勞動力將大為減少，剩餘農業勞動力應該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由其他行業如製造業、商業、服務業來吸收。

作為一種先進的社會制度，一方面必須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鼓勵人們積極進取，使每個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另一方面也應該考慮到因為每個人能力不同、機遇不同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別，採取某種程度的「均貧富」政策以便縮小貧富差距。這種政策可

以包括個人收入累進稅制（收入越高交稅越多，窮人則不交或少交稅）和社會保險、福利等。

（四）經濟改革的步驟

要達到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目的，就必須堅決地把蘇聯式的計劃公有制經濟改革成以市場私有制為主的混合型經濟。這個轉變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實現的，改革步驟太容易引起經濟混亂。如果執政者決心照此方向改革而又措施得當，多數人民支持的話，這個轉變大約需要五至十年。中華民族雖有比較嚴重的封建專制傳統觀念這一缺點，但也具有勤勞節儉、奮發向上的傳統美德這一優點，關鍵在於如何克服缺點，發揚優點。當制度改革成功之後，我國就打下了經濟起飛的基礎，隨後十至二十年內就會出現像日本、西德、香港、台灣、南朝鮮等在六至七十年代所出現過的經濟奇蹟。否則，制度改革不成功，我國經濟就會永遠停留在侏儒狀態，不斷需要尋找「客觀」原因為自己的落後解釋。

認識到改革的艱巨性與複雜性，就應該鼓勵人民拋棄各種框框教條，提出多種改革方案。在這裡，本文就經濟改革應採取的計劃與步驟提出筆者的一些看法。本文將首先討論經濟改革成功的前提，這就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然後提出如何建立市場經濟體系，最後將探討國營企業私有化問題。雖然情況在不斷變化，改革方案必須隨時修正，但有一個大致的改革步驟與目標，總比無目的地「摸索」強得多。

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是確立私有制的合法地位。三十多年來，我國雖然保障生活資料如衣服、房屋等私有財產，却由政府對生產資料



湛江市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的宣傳欄。

一類的私有財產任意侵奪，使人們對私有財產的信心喪失殆盡。例如，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的土地、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交公；一九五四年至五六年把私營工商業「改造」成公有制企業；六十至七十年代將一些辦得較好的集體企業「升格」為國營企業。

為了使經濟改革獲得成功，我們首先需要制訂充分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不受侵犯的私有財產不僅

包括生活資料，也包括土地、機器、資金等生產資料以至整個企業。只要不是從非法途徑所得，人們應該對這些私有財產享有充分的所有權與處置權（如轉讓、出賣、遺留給後代）。任何損害他人財產的個人與團體都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其次，我們必須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只要不出現壟斷，不違犯法律，不損害社會利益，就不要對私營企業設置任何障礙。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起關鍵作用的是內在經濟因素。因此，國內私人資本的產生與成長，比吸引外資更為重要。在大力吸引外資的同時却設法限制國內私人資本的成長，是極其荒謬的。雖然這些私營企業追求的是利潤，但在公平競爭條件下，企業損人利己的自私行為受到約束，利人利己的自私行為受到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客觀上對社會有利。

對待私營企業，在原料供應、產品銷售等方面應與國營企業一視同仁，使之能夠公平競爭。對於有不法行為的企業（如偷稅漏稅、賄賂官員、獨霸市場），無論私營或公營，都應被罰款，其參與人員應受到法律制裁。對於利用職權對企業進行刁難、敲詐勒索的政府官員、警察或公安人員，更應該用刑法嚴厲懲處，決不能官官相護，對他們姑息遷就，僅僅檢討或黨內警告、行政記過了事。

為了保證公平競爭，防止利用特權壟斷市場，損害社會利益，在改革初期應當嚴禁黨政軍官員及其子女辦企業或經商。利用特權批條子、發貸款、非法進出口等「官商」行為，嚴重阻礙了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之建立，最後有導致數個富裕家族控制全國經濟，回到四十年代式的壟斷私有制的危險，這決不是經濟改革的目的。當實現政治民主化，人治廢除、法治

建立之後，政府官員的子女親屬、黨的幹部是可以經商或辦企業的，只有政府官員不能。經濟改革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系，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市場、生產資料市場與消費市場。

資本市場包括金融市場與股票市場（又稱為投資市場）。金融市場的開放可分四步。第一步是將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分離，政府雖是各銀行所有者，但並不過多干預專業銀行的日常事務，而是任命董事會管理。第二步是允許民間團體與個人組織自負盈虧的信用社。第三步是允許民間組織私營銀行，這時中央銀行應該設立保險以便一旦私營銀行倒閉時保障儲戶利益，減少對經濟的震盪。第四步是在經濟起飛之後，民間有了雄厚資金，金融市場成熟的條件下，逐漸實現國營專業銀行的私有化。股票市場的開放則應先由政府制訂各種股市規則；再由一些經營良好並有一定規模、在公眾中有一定信譽的私營企業上市發行股票，籌集資金，接受公眾監督，並促使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時，政府可以在股票市場上出售國營企業的少部分股票（開始時可以沒有投票權）。在中國這樣一個資金匱乏的國家，鼓勵投資應該是一項長期國策。中國人素有喜愛儲蓄的優良傳統，為積累現代化所需資金，應鼓勵儲蓄。對於一個亟需資金的窮國，西方政府降低利率刺激經濟的辦法不可取，我們應該始終保持實際利率（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為正。

勞動市場指所有層次的勞動者，不僅包括工人、農民、服務人員，也包括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還包括政府官員與公務員，因為他們的工作也是一種勞動。我國過去的勞動制度實際上剝奪了企業與勞動者雙方的相互選擇權利

這種制度給人一種安全感，但消磨了許多人的銳氣與進取心，造成效率低下。中國政府最近宣佈，從十月一日起對新招收的職工，實行勞動合同制，這可以說是勞動市場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應是對所有的職工實行合同制。目前固定工與合同工並存的狀況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待遇，容易導致對合同工的歧視，只能作為權宜之計。這一步改革只需要允許職工辭職另找工作，允許企業解雇職工就可。第三步是允許勞動者在企業之間、在城市之間流動。第四步則是完全取消戶口限制，使農民可以自由進城工作，工人也可下鄉種地。勞動者的工資應該由市場決定（勞動者邊際生產率之價值）而不是由政府規定。對於因企業破產而失業或被解雇的勞動者，可以由政府設立失業保險基金來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費。

生產資料市場的開放包括土地、原材料與自然資源。農村土地市場的開放目前條件已經成熟，開放後有利於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提高生產效率。城市土地市場的開放應在農村之後，開放後將有利於珍惜土地（據統計上海在過去三十多年工商業用地的土地利用率普遍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低）。原材料與自然資源市場的開放有助於解決計劃分配系統中的種種弊病，減少壟斷，使所有企業得到同等待遇。應當說，物價控制的直接結果是商品信息被歪曲，資源分配不合理，因此，必須由市場決定物價。我認為，目前我國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並存的狀況只能作為改革初期的權宜之計。試想，當煤的自由市場價格是統配價格的五倍時，只能從自由市場買煤的企業怎樣與使用統配煤的企業競爭？這必然導致各企業競相向掌握煤分配大權的政府官員行賄。要解決我國城市中嚴重的住房短缺，必須開放房屋市場，允許私人



大陸自由買賣興隆。

或私營企業建房、賣房或出租房屋，廢除過去那種把住房當成福利，由國家與企業包起來的辦法。

消費市場的開放關鍵在於物價改革。一八五年以來，我國已在城市蔬菜、副食品、農副產品價格等方面進行改革。但改革遇到了困難。由於所有制未改，物價改革與工資改革中出現一些混亂，過多貨幣投放市場，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

經濟改革的第三階段是國營企業私營化。國營企業的效率之低是人所公認的，但它們又是目前我國經濟的骨幹，在國民經濟中起着主導作用。如何實現所有制的轉變，使國營企業轉入高效率高速發展的以市場私有制為主的軌

道，是經濟改革的重要課題。

因為國營企業效率低下，去年以來，許多國家如英國、法國、日本、巴西、墨西哥等，競相實行國營企業私有化。雖然中國國營企業效率低的問題更為嚴重，但在目前要像西方政府那樣大規模拋售國營企業給民間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一是因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尚未合法化，市場經濟體系尚未建立；二是因為民間還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國營企業的大宗股票。目前應該設法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實現真正的黨政分離、政企分離與黨企分離，政府任命企業董事會與總經理，但不干預企業的日常工作。同時，要逐步取消國營企業的壟斷權力，使私營企業能與其公平競爭。順便指出，前幾年開始對國營企業實行利改稅，以提高效率的作法並不科學，因為，那樣便混淆了利潤與納稅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同一行業內各企業的稅率應該相同，不應因企業大小、國營或私營而有所差別。稅後利潤應歸企業所有者，私營企業歸股票持有人，國營企業則應歸國家。

國營企業私有化雖然在目前難以實行，但在經濟改革的中、後期是不可避免的。國營企業私有化可分三步。第一步在開放投資市場（股票市場）的同時，將部份小企業賣給私人或私人團體。視民間財力大小，可將一些大企業的小量股票（無投票權）賣給民間。第二步則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私有制經濟已經建立，經濟起飛的基礎已經打好或正在起飛時，將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及少數大企業賣給民間，但政府仍掌握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企業的主要股權。第三步則是在經濟已經得到高速發展，民間有了雄厚財力之後，將多數大企業賣給民間。這時我國經濟已變成市場私有制經濟，政府只經營或監督一些公共財物如國防、警察，有外部

效果的經濟活動如教育、科研、醫院、以及水、電等行業，而不經營一般工商業。

在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中，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要防止在所有制轉變過程中出現行政責任體系與私人財產責任體系都失效的責任「真空」，行政官員不願再負責任，而私人又不能對國家財產負責，巨大的國營企業資產無人過問。這個真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是毀滅性的。第二，國營企業私有化不是瓜分國家財產，要防止政府官員與企業管理人員互相勾結，利用職權為自己或其親屬獲得股權，警惕出現幾個富裕家族控制全國經濟的狀況。第三，要防止外國資本壟斷骨幹行業，因為外國資本勢力雄厚。

以上所述經濟改革之三個階段（保障私有財產、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國營企業私有化）並不是絕然分開的，許多改革措施必須同時實行。

五、政治與經濟必須同步改革

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不進行政治制度、法律和意識形態的相應變革，單純的經濟改革難以成功。政治改革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裡僅從政治與經濟改革必須配套的觀點略加探討。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目前經濟改革遇到的主要阻力。

（一）經濟改革的阻力

我認為，可以把經濟改革的阻力歸納為三方面：僵化的意識形態；人們思想上對改革的不適應；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些阻力的產生，

主要原因是沒有在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政治改革。

1. 僵化的意識形態

經過三十多年來反覆的「政治教育」，許多人形成了一種固有觀念：全民所有制優於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勝於私有制，總之，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這些人判斷一種社會制度是否優越，往往不是根據社會實踐的結果，而是根據經濟發展速度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根據某部經典著作、某位偉人的語錄。一九八一年至八二年，我國農村多數地區突破原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以家庭經營為主的「承包責任制」。當時曾有不少議論：「這哪裡是社會主義，明明是資本主義」，「以後一定出現兩極化」，甚至有人哀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種奇談怪論在農村基層幹部與城鎮居民中比較普遍，普通農民則更關心填飽肚子而不是那些「主義」。由於中共改革派的堅決支持，廣大農民的強烈要求，才使得那些思想僵化者無法「反潮流」。後來農業高速發展，農民生活普遍改善，在大勢所趨的形勢下，這種反對聲浪才低下去。

城市改革開始後，某些高級領導人頻頻告誡要堅持這種或那種「主義」、「道路」之類。例如「我們是共產黨，要搞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在他們眼中，人民生活貧困、經濟落後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那種「主義」。「主義」是他們的命根子，正如買寶玉口裡含的「通靈寶玉」一樣。衝破這種意識形態障礙的途徑，首先是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不同的意識形態應該能夠合法存在，公平競爭，讓人民自己去比較與鑑

別。把一種理論由政府定為「唯一正確的真理」是極其有害的。其次，我們必須放眼世界，觀察其它國家實踐了何種社會制度，獲得了什麼樣的結果，虛心學習先進。再次，形成一股高層領導與普通群眾相結合的不可逆轉的改革洪流，使反對者在大勢所趨前無可奈何，要麼跟上改革步伐，要麼被改革洪流淹沒。

2. 人們思想上與能力上對改革的不適應

由於三十多年來實行的「大鍋飯」「鐵飯碗」制度，人們思想上一切依賴國家、向國家索取一切的觀念根深蒂固。這種觀念在歷來享受國家福利較多的幹部及城鎮職工中尤為普遍。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楊冠三的調查（註⑧），百分之八十四點一的企業職工表示「還是現在這種養老、看病有保障的制度讓人放心」，百分之七十七點三的城市居民寧願選擇「增加收入的機會少，但生活平穩」的生活方式。對企業職工能力素質的測量表明，總體特徵是依賴性強，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弱。

在這裡，有必要探討一下在中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傳統儒家思想與最近七十年從國外引入的馬克思主義對人們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有兩重性。其中壞的一面是專制主義、忠君思想、等級觀念；好的一面是勸導人們仁愛、勤奮、節儉。我國五十年代以來，儒家思想中壞的一面得到發展，專制主義、忠君思想在文革中發展到登峰造極，各級幹部之間等級森嚴，人民甚至連在三十年代已有的部分民主權利都被剝奪。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好的一面被踐踏破壞。經常性的批判鬥爭，批判劉少奇，鬥爭右派，鬥爭反革命，鬥爭地主，鬥來鬥去實際上是群眾鬥群眾，儒家思想中善良、仁愛的精神蕩然無存。幹多幹少、幹好

幹壞一個樣的「大鍋飯」制度使一些人變懶，中華民族勤勞、奮發向上的傳統美德被破壞。由於收入低下，人們家庭生活仍然節儉；但企業在生產上鋪張浪費、不計成本，官場上請客送禮、大擺宴席，領導人大手大腳、揮霍人民血汗錢（例如據估計一九八四年國慶閱兵耗資四十億人民幣），傳統的節儉美德不復存在。

作爲一種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共產主義是一種美好理想，它給人一種美麗的憧憬，誘導人們互相幫助，爲他人着想，爲社會着想。但是，政治理論多元化比找到某種「正確理論」更爲重要，不同理論應該能夠合法存在，公平競爭。任何信仰都有強烈的排他性，當用政權的力量規定某一信仰爲「至尊」時，一定會造成悲劇。當執政者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極端，定爲「唯一正確的真理」，而否認其它理論時，就把馬克思主義推入一種極其危險的境地。文革之後，很多人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其中一些人在尋找其它理論出路，尋求理論多元化，當屬可嘉；另一些人變得唯利是圖，只考慮個人與小家庭利益，可以說是時代悲劇。

3. 龐大的官僚機構

今天我國的官僚機構十分龐大，疊床架屋。它人浮於事，效率低下。這種機構對經濟改革的阻碍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改革不可避免地會觸及過去的一些規章制度，這些官僚機構會以「衛道士」的面目出來反對。這裡，我們不必大肆渲染「兩頭熱，中間冷」，過份責備這些中層官員，因爲堅持規章制度正是他們盡職的表現。我們所應該做的是儘快制訂符合市場私有制經濟的新的法規以取代舊的法規。同時，對一些重疊或過

時的機構大刀闊斧地砍掉，以提高行政效率。

第二，在這些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中，許多幹部是現存制度的受益者，享有多種特權。改革將使一些幹部失去部分特權。對於多數人來說，自私自心理重於非自私自理，因此，要使人們放棄既得利益是十分困難的。要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途徑有四。首先，逐步實現民主化，使民衆享有一定的發言權、參政權、選舉權與彈劾權，以便對官僚機構的權力發生一定程度制約。其次，形成一股上下結合的改革洪流，使既得利益者無法阻擋。在一九八〇年至八二年的農村改革中，一些基層幹部失去了部分特權，自然不愉快。然而在中共中央與農民一致要求改革的形勢下，他們無法反對。再次，要使幹部們認識到，改革不僅對普通民衆有利，也對幹部們有利。如果不實行改革，雖然他們可保持許多特權，但因整個社會經濟落後，他們決不會富裕；反之，如果改革成功，雖然他們失去部分特權，與普通民衆的差距縮小了，但因整個經濟發展了，人民富裕，幹部生活水平也會隨之提高。最後，要給失去職位的幹部妥善安排出路，照顧他們的生活。應當看到，雖然他們並不情願放棄既得利益，但大多數幹部還是從內心裡希望中國迅速富強起來的。

(二) 政治改革的目標

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總是盼望「好皇帝」，盼望「清官」。雖然這類「好皇帝」與「清官」時有出現，但總的來說是「昏君」多於「明君」，「貪官」多於「清官」，人民總是在痛苦中煎熬。關鍵在於人民沒有掌握自己的命運，沒有建立得到法律保障的民主政治制度。

我國政治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實現民主政治，也就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社會團體、意識形態都能合法存在，公平競爭。存在某種「權力平衡」，任何人不能獲得不受限制的權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行政長官由人民直接選舉，發現他們不稱職時人民有權罷免。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得到法律保障。任何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的人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因爲受到人民監督，貪污受賄的政府官員一定大爲減少。

(三) 政治改革的步驟

雖然民主制度是一種較優越的政治制度，但需要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一方面，在中國目前缺乏民主政治文化傳統，人民民主意識不高的情況下，立即採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不可取的。那樣的話，選民容易被少數野心家操縱利用造成賄選，出現大規模的工潮與學潮（這種工潮與學潮對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有利，但也可能被利用），導致政治混亂。另一方面，以中國民衆目前缺乏民主意識爲借口，反對實行民主政治則更加錯誤。本文的觀點是，必須有一個政治改革的總體規劃，制訂改革的目標與步驟。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堅定不移地實行政治改革，但又不能操之過急。

隨着情況的變化，預先制定的經濟、政治改革的目標與步驟，需要不斷地修正。儘管如此，制定一個大致的改革計劃，可使人民思想上有所準備，減少改革過程中的預期不確定性，消除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現象。

政治改革的第一階段是確實保障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信仰自由等公民權利。允許民間辦報，保障新聞自由。實現意識形態多元化，各種意識形態與政治信仰和平競爭。在大中小學開展民主政治教育。保障人民監督與批評政府官員的權力。學術團體與其它非政治性民間組織自由活動。這一階段與經濟改革的第一階段（確立私有產權）應該同步進行。

第二階段是實施基層選舉。先從鄉鎮開始，再發展到縣、中等城市，然後到省、大城市一級。基層選舉與民眾切身利益直接相關，民眾自然關心，這是培養人民民主意識的最佳途徑之一。由於全國基層政權數目龐大（光是鄉政府就有六萬多個，縣政府二千四百多個），各地可選擇不同的選舉制度，探索各種民主運作方式。舉例來說，可先由執政黨提名進行差

表一 部分國家與地區 1950 年和 1983 年國民生產總值 (GNP) 與人口對比

	面積 (千平方 公里)	1983年		1950年(1)		1983年(2)		1983年與1950年之比		
		人口密度 (人/平方 公里)	人口 (百萬)	人均GNP (1950年美元)	人口 (百萬)	人均GNP (1983年美元)	GNP (3)	人口 (3)	人均GNP (3)	
印度	3288	233	361.6	40	733.2	260	3.30	2.03	1.63	
中國(大陸)	9561	107	576.3	45(4)	1019.1	300	3.00	1.77	1.67	
印度尼西亞	1919	81	76.7	35	155.7	560	8.12	2.03	4.00	
泰國	514	96	20.6	50	49.2	820	9.78	2.39	4.10	
南朝鮮	98	408	20.4	60	40.0	2010	16.45	1.96	8.38	
南斯拉夫	256	89	16.4	150	22.8	2570	5.97	1.39	4.28	
台灣(5)	34	547	8.2	130	18.7	2800	12.28	2.28	5.38	
香港	1	5300	1.91	210	5.3	6000	19.82	2.77	7.14	
日本	372	321	82.9	300	119.3	10120	12.14	1.44	8.43	
西德	249	247	50.0	500	61.4	11430	7.02	1.23	5.72	
美國	9363	25	153.3	1900	234.5	14110	2.84	1.53	1.86	
瑞士	41	159	469	1050	6.5	16290	5.37	1.39	3.88	

註：(1)一九五〇年資料來源於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WORLD TABLE」, THE THIRD EDITION。人均GNP計算方法一：將各國一九五〇年GNP除以當年人口再除以一九五〇年外匯兌換率。方法二：在一九七〇至七五年中選取一年作為價格基準年計算一九五〇年GNP，除以一九五〇年人口，再除以價格基準年之外匯兌換率，最後按美元貶值率換算成以一九五〇年美元價格計算的人均GNP。兩種方法計算結果不一致時取平均值或以方法二為準。筆者所整理的一九五〇年人均GNP數據準確度不高，不應隨意引用。

(2)一九八三年資料來源於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5」。

(3)這裡的GNP增長為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質GNP增長。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美元貶值四·〇倍。

(4)筆者估計值。

(5)來源於台灣報刊。

額選舉逐步過渡到自由競選。在這一階段，應當允許民眾成立各種政治壓力團體，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提出批評與建議。這一階段與經濟改革之第二階段（建立市場經濟體系）可以配套進行。

許多人認為，農民觀念落後，無法進行選舉。這裡僅舉筆者所熟悉的一個人民公社（一九八四年改稱為鄉，而在同時，大隊改稱為村）為例，說明農民也需要民主。在該公社，各生產大隊黨支部委員及書記歷來由公社黨委任命並報縣委審批，或者由公社黨委指定候選人（等類），由大隊黨員進行象徵性選舉。一九八二年，在中共縣委領導下，破天荒第一次由各大隊黨員直接投票選舉大隊黨支部（上級黨委沒有指定候選人）。在當時共產黨領導一切的情況下，大隊黨支部的選舉自然為全大隊社員所關心，因為這與他們切身利益有關。雖然只有黨員能夠投票選舉，但全大隊社員都十分關心，議論紛紛。選舉出來的黨支部比較關心社員疾苦，腐化現象大為減少。由此可見，在農村實行基層選舉是可行的。

政治改革的第三階段是開放黨禁，允許組織公開的反對黨。反對黨的存在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減少執政黨的腐化與墮落現象，阻止反右、大躍進、文革一類悲劇重演。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中既無反右、文革，也無斯大林一類暴君，更沒有四人幫一類國賊。我們要想剷除發生文革的制度基礎，就必須容許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實現政治民主化。當然，反對黨會試圖取得政權。但如果執政黨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會無所畏懼地接受反對黨的挑戰。反對派就像一面鏡子，可以照出執政黨身上的瑕疵與短處，促使其變得健康。

第四階段是實行全國性選舉。人民直接選舉中央政府行政首長與立法機構。這種選舉是一種政治上的「機會均等」，各政黨與社會團體在選舉中地位平等。在這一階段，必須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使這三個部門之間相互依賴與相互制約，杜絕專制獨裁的發生。同時要實行軍隊國家化，軍隊不介入政治與政黨之爭。這一階段完成之時，中國就真正進入了民主、法治、自由的社會。

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共產黨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力量，雖然不必要在憲法裡規定堅持黨的領導，政治改革的前三個階段（意識形態多元化、基層選舉、允許組織反對黨）應該由共產黨來擔負領導責任。隨着市場私有制經濟的建立，政治民主化的逐步發展，部分黨幹部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行為一定會受到外界制約，「黨風不正」、黨的威信下降的局面可能得以從根本上扭轉。如果這樣，那麼即使到了政治改革的第四階段（全國大選），中國真正進入民主、自由社會，共產黨仍然可能是中國的執政黨。四十多年來，日本一直是自民黨一黨執政，但由於在政治上存在公平競爭的環境，自民黨腐化現象並不嚴重，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如果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能夠真正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積極實行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改革，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富強的國家，歷史將記載它的功績。

注釋：

(1) 尚宣禮，「所有制改革的關鍵是國家所有制的改革」，「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
 (2) 張維迎，「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九日。

(3) 童大林，「股份化是社會主義企業的一個新基點」，「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
 (4) 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國青年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
 (5) 「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八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6) 楊小凱，「從海外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知識分子」（紐約）一九八五年夏季號

楊小凱，「在美國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思想」，「知識分子」（紐約）一九八六年冬季號。
 (7) 蘇紹智，「政治體制改革與反對封建主義影響」，「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
 (8) 楊冠三，「進一步改革的要求與阻力」，「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三日。

表二 部分國家與地區個人收入之分配(1)

年	戶數五等分位	各組家庭之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最高組與最低組收入之比
		第一分位 (最低收入組)	第二分位	第三分位	第四分位	第五分位 (最高收入組)	
1. 低收入國家							
尼泊爾	1976-77	4.6	8.0	11.7	16.5	59.2	12.9
印度	1975-76	7.0	9.2	13.9	20.5	49.4	7.1
中國(大陸)(2)	1985	7-9	10-12	16-18	23-25	38-42	5-6
肯尼亞	1976	2.6	6.3	11.5	19.2	60.4	23.2
2. 中下收入							
印度尼西亞	1976	6.6	7.8	12.6	23.6	49.4	7.5
泰國	1975-76	5.6	9.6	13.9	21.1	49.8	8.9
3. 中上收入							
南朝鮮	1976	5.7	11.2	15.4	22.4	45.3	7.9
匈牙利	1982	6.9	13.6	19.2	24.5	35.8	5.2
南斯拉夫	1978	6.6	12.1	18.7	23.9	38.7	5.9
台灣(3)	1964	7.7	12.6	16.6	22.0	41.1	5.3
台灣(3)	1979	8.6	13.7	17.5	22.7	37.5	4.4
香港	1980	5.4	10.8	15.2	21.6	47.0	8.7
4. 工業化市場經濟							
英國	1979	7.0	11.5	17.0	24.8	39.7	5.7
荷蘭	1981	8.3	14.1	18.2	23.2	36.2	4.4
日本	1979	8.7	13.2	17.5	23.1	37.5	4.3
西德	1978	7.9	12.5	17.0	23.1	39.5	5.0
加拿大	1981	5.3	11.8	18.0	24.9	40.0	7.5
美國	1980	5.3	11.9	17.9	25.0	39.9	7.5
瑞士	1978	6.6	13.5	18.5	23.4	38.0	5.8

注：(1)資料來源（中國大陸與台灣除外）於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5」。

(2)中國大陸之所得分配由筆者估計。主要依據是「國家統計局公報」，一九八五年農民人均收入人民幣三九七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七五二元；人口分佈大約是農村80%，城鎮20%。再考慮到城市居民非工資收入（如房租、醫療、教育、娛樂）較高；農村少量富裕戶（如1萬元戶）應歸於高收入組；在部分邊遠山區農民收入很低，等等因素。

(3)台灣個人所得之分配數據來源於台灣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報告。

中國民主同盟的啓示

——兼談對國內民主黨派的期許

(國內)魏桑莉

一九八六年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成立四十五周年。國內各地都開了紀念會，或辦了展覽會；但講來講去，都是講民盟如何與中共「長期合作，肝胆相照，榮辱與共」等等，好像民盟向來是個花瓶黨，是個中共的附屬組織一樣。爲了總結民盟所走過的道路，并從中引出有益的經驗教訓，筆者願借《中春》一地與大家探討。

歷史的回顧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于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於抗戰的大後方重慶。當時是由幾個政治團體聯合而成的，固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同年十月十日對外公開，并宣佈其政綱和成立宣言，出版機關報《光明報》。在其十項綱領中，比較重要的有：結束黨治，設置各黨派國事協議機構(此即爲「政協」之先聲)。(軍隊屬於國家，反對軍隊中建立黨團組織)。(軍人當忠于國而非忠于黨，反對在學校及文化機關中推行黨務等，并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口號。黃炎培先生當時爲重要發起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民盟即改稱爲現名，并修改了綱領。(草案)詳細分述了民盟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社會六方面的

具體主張。綱領在政治上要求設一會五院，即最高權力機關爲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另有行政院、大理院(司法)、文官院(人事)，五院分權制約；并提出地方自治爲民主政治之基礎。軍事上重申軍隊屬於國家，要求以法律禁止軍隊中建立黨團組織，現役軍人不得干政，不得任行政官。外交上提出與美、蘇、英切實合作。教育上要求禁止在教育文化機關中組織黨團及推行黨務，保障學術研究之絕對自由等等。

抗戰勝利後，內戰危機加深，國民黨空運大量軍隊搶占戰略要地，重慶大員四出覓收；中共則訂下了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民盟調酌其中，一再呼籲國共雙方以國家爲重，制止內戰，實施民主，反對以武力進行黨爭。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追認爲「一大」)正式通過了綱領。綱領曾在四四年草案的基礎上增加了婦女一款，并制訂組織綱領。會上強調政治上參考英美議會制度，并以蘇聯的經濟平等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防止貧富懸殊；主張學習英美「民意政治」的一切經驗，將中國創造成地道的民主國家。同年十二月馬歇爾使華調停國共爭端，民盟表示歡迎。在美方、民盟及其它政派調解下，國共于一九四六

年一月十日下午達停戰令。當天，國、共、民(民盟)、無(無黨派人士)四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一致確認了民盟一向倡導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在憲法草案問題上確認了民盟一向主張的國會制，內閣制，省自治等原則；在軍事問題上接受了民盟一向主張的軍黨分立，軍民分治的原則；并規定召開國民大會以結束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實行多黨制的憲政體制。但是在關鍵性的國府委員名額分配和軍隊改編問題上，由于國共各懷己見，始終難以達成協議。國民黨及剛脫離民盟的青年黨堅持先軍隊國家化，後政治民主化，中共則堅持先政治民主化，後軍隊國家化。民盟主張二者并行，雙管齊下，共產黨軍事上作出讓步，國民黨政治上作出讓步。馬歇爾在會外亦表明了與民盟類似的立場。民盟還提出整軍方案：由國、共、民、無加美國顧問合組整軍計劃委員會，統一接收整編軍隊；但未獲國、共兩黨同意。民盟還主張國民黨讓中共占有國府委員會三分之一代表席以持有否決權(後經中共提議改爲中共與民盟共占三分之一)，但難獲國民黨同意。

對於政協所通過的原則，各派態度亦不一。民盟認爲這些原則最符合自己的理想，因而非常滿意，興高采烈。而中共的心情就比較複雜。在國共談判及政協期間，中共在內部一直告誡全黨勿存「和平幻想」，時刻準備「以革命的兩手打敗反革命的兩手」，并不打算放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暴力革命道路。對民盟，中共認爲是一群心存和平幻想，崇拜英、美政治，具有個人野心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或曰「舊民主主義者」。出于國際共運中交槍路綫的壓力以及對力量對比的清醒估計，中共認爲

當前大敵是國民黨，應當採取「團結中間力量，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戳穿國民黨的「和談陰謀」，「教育人民」的策略。因而對民盟的大部份建議都表示原則上支持，還積極主動地與民盟代表進行會外商討，協同步調；並向美方和民盟表示中共願意接受英美式的憲法和議會民主制，從而頗得民盟好感。只要看看中共掌權後的所作所爲：一黨專制，黨政軍合一，思想控制，黨化教育等等，完全與「舊政協」背道而馳，與他當年譴責的國民黨行爲同出一轍；我們便知道中共當時對政協原則的歡迎，完全是一種謀權，是一種暫時的妥協。

國民黨則一開始就利令智昏，自我膨脹。國民黨捨不得放棄黨天下的獨裁地位，對民意也不放在眼裏，對馬歇爾的一再勸告也不放在心上，迷信憑自己的武力可以三個月掃平中共，一統天下。因而對自己被迫同意的政協原則一直口是心非。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協剛閉幕，二月十日就發生了校場口事件，國民黨特務在群眾慶祝政協的集會上大打出手，毆傷民盟負責人李公朴等多人。二月廿二日又衝破了中共的《新華日報》社和民盟的《民主報》社。三月，在國民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上，其頑固派攻擊政協決議是使「黨國自殺」，並通過了否定國會制、內閣制、省制憲等原則的決議。與此同時，國民黨軍加緊在東北進攻，「關外大打，關內小打」。至五月下旬，國民黨軍攻占四平、吉林、長春等地後，六月在中原也大打起來，全國陷于不宜而戰的局面。十月十一日，國民黨軍攻占張家口，談判破裂。在此期間，民盟爲東北停戰，政府改組，名額分配等問題奔走于國、共之間；并就國民黨否定政協原則，加緊軍事活動，在各地製造流血慘案等事件向國民黨政府多次交涉，要求尊

重民主、人權。國民黨堅持獨裁，忌恨民盟，于四月底在西安刺殺民盟成員王任、李敷仁（李後遇救），于七月中旬在昆明連殺民盟負責人李公朴、聞一多。七月後，民盟負責人忙于追兇查辦，調停陷于癱瘓。

國民黨攻下張家口後，單方面宣佈將召開國民大會，并提議國、共就地停火，再行談判。中共的態度則是，在國民黨恢復停戰令下達前的原狀，承認政協原則前，中共不參加和談和國大。後經民盟「勸駕」，中共代表團周恩來一行才由滬赴寧談判，但國、共雙方主要靠以民盟爲主的「中間黨派」傳話。由于國、共立場相距太遠，談判陷于僵局。眼看國大日期已近，作爲最後挽救，民盟拿出對國民黨較有利的「折衷方案」，但終遭中共劇烈反對而收回。十一月十五日國大召開，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及一些「社會賢達」參加，中共和民盟拒絕。十一月廿五日民盟再表立場，絕對保持第三者立場，反對內戰，指責國大違背政協精神，并將張君勱等民社黨人勸退出盟，但對其參加國大的是非功罪不予評論。十二月卅一日國大憲法公佈，中共表示不予承認，民盟表示從超然、中立和真正民主的立場出發，保留接受此憲法的權利，并對國大召開和憲法產生的過程表示不滿。

一九四七年一月，馬歇爾因其使命失敗而離華。在給杜魯門的報告中，此位戰略家指責國、共雙方缺乏誠意，致使和談失敗。他尤其對國民黨失望，認爲國民黨一意孤行發動內戰，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將發生危機，正走上失敗的道路，并將累及美國。一月六日到十日，民盟召開一屆二中全會。會議檢討了民盟自政協以來一年的歷程，指出政協最大遺錯是未將東北劃入停戰範圍內，而美國爲防蘇聯

而支持蔣軍「武力接收主權」。使國、共從關外打起，全面大戰；國民黨以和養戰，中共以戰求和，使國是終不能和平協商解決；國民黨發動軍事進攻，否認政協原則，以暴力鎮壓異己和民衆，當負主要責任。并表示儘管馬歇爾已離華，民盟仍不放棄爭取和平民主的使命，繼續謀求政治解決國是的方法。

在戰場上，國民黨軍漸顯拙勢。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一日，劉鄩大軍南渡黃河，解放軍在戰略上開始反守爲攻。七月蔣介石發佈「戡亂總動員令」及「剿匪建國」廣播演說。七月十七日美國派魏德邁使華，九月魏德邁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報告書中認爲，獨裁、腐敗的國民黨政權正在走向全面失敗。但一個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不利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對民盟，也因「親共傾向」而難表信任，因而只好大舉援蔣。蔣政權自恃得美外援，又恃「第三次世界大戰」必起，故有恃無恐，將美國的「民主改革」要求置諸腦後，大批綁架、逮捕、毆打民盟成員及其他人士，十月七日槍殺盟員杜斌丞，十月廿八日終於宣佈民盟爲非法組織。民盟總部派人向美使館求援無效後，于十一月六日宣佈民盟解散。

一九四八年一月，潛往香港的部份民盟領導和盟員在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宣佈民盟重新開展活動，放棄中間路線和第三者立場，全部接受了中共的主張，採取了同中共一致的反美倒蔣立場。從此，作爲一個組織，民盟基本上放棄了獨立性，甚至與中共一起攻擊第三者和中間道路者。隨着國民黨的迅速失敗，民盟中個別成員希望中共仍能按政協原則辦事，成立各黨派平等參加的聯合政府，例如在三大戰役後張申府、梁漱溟等多次呼籲中共適可而止，停止用武，允許異己的力量存在。羅隆

基呼籲美國支持民盟實現和平。章伯鈞甚至提出國、共、民三分天下，和平競爭的一國三制方案。勝券在握的中共此時表示不再接受「舊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而要建立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不客氣地宣稱「勸告人民保存敵人的人，絕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中共決心不顧「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糊塗思想」和「錯誤主張」，「堅決將革命進行到底」。民盟在中共的壓力下，（四八年十一月）開除了張申府，（一九四九年一月）拒絕了李宗仁代總統要民盟調解的請求。

全國解放後，中共宣稱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將鬥爭矛頭對準昔日的同盟者。從三反五反，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後，專政終于直接落到民盟等民主黨派身上來了。一九五一年鎮反運動中，曾當過「舊政協」民盟代表的民盟負責人張東蓀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捕，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在政協發動了對梁漱溟的圍攻。大家都知道《毛選》五卷裏有篇《批評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文章，在此文中，毛澤東一反道貌岸然的姿態，以軍閥般的兇相大潑冷水，惡罵梁漱溟是以筆桿子殺人的殺人犯。順便提一句，不知是毛選五卷開的笑話太多還是別有原因，中共已密令收回各書店及各大圖書館中的五卷，有的圖書館甚至將毛選一至四卷也全部收走了。但此指示傳達範圍很有限，故許多單位所有的圖書館仍存放着一至五卷。毛澤東當年聲稱中共仍會讓梁漱溟留在政協，（可見政協在中共眼中的地位）以便讓梁充當「反面教員」。筆者也希望大家保存好毛澤東的第一本被禁著作，以達同樣功效。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以整風、「雙百」方針等實行「引蛇出洞」的「陽謀」，民盟以《文匯報》、《光明日報》為陣地，對中共一系列侵犯自由、民主的做法表示不滿。章伯鈞列舉了中共實行一黨專政，壓制輿論所產生的種種惡果，提出了「政治設計院」的方案，要求各黨派輪流執政，成立聯合政府。羅隆基嚴厲批評了中共在肅反、鎮反及多種運動中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做法；要求成立一個不受中共操縱的平反委員會。中共拒諫師非，變本加厲，在全國掀起了極為可鄙的右運動，惡毒攻擊自己過去承認過的政治原則，殘酷迫害一大批優秀的愛國知識份子和工商界人士。毛澤東指責各民主黨派起了右派骨幹的作用，其中民盟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自絕于人民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當時民盟，農工民主黨等與中共抗爭十分活躍，按毛的語言，他們「呼風喚雨，推瀉作浪，或策劃于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



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最終目的。」最後，各民主黨派被迫在中共的「建議」下進行「整風」，批判「章羅聯盟」和「第三條路線」，撤換了領導人，將順從中共者推為新領導。從此民盟和其它民主黨派再也無力與中共抗爭，只有歌功頌德，淪為中共的尾巴黨，花瓶黨。中國歷史又開始了痛苦的一頁。

反右運動以後，中共的鬥爭鋒芒開始轉向黨內，尾巴黨們與中共相安無事，直至文革初，被紅衛兵勒令解散。這一次解散，就真的關門大吉了！

歷史的經驗

民盟曾作為國、共間的最大第三者組織，在中國的民主氣氛還十分薄弱，民主幼苗十分弱小的情況下，為中國的民主前途與國、共兩黨英勇鬥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扮演了悲劇的角色。他們的民主先驅的地位應該得到承認，他們的功績不該被人遺忘。民盟提出的，并促使國、共在政協時承認的諸原則，例如廢除黨治軍治，禁止在軍隊、學校或文化機構實行黨化教育或黨團控制，省制憲自治（即今所謂『聯邦制』）等，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義。民盟作為一個廣泛而寬鬆的組織，包容了幾個政團，這種組織方法也許可供今天或今後的民運組織參考。總之，其成功之處很多。同時民盟的歷史也給各方面人士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對於國民黨來說，重要的經驗教訓是應當容忍政治上的異己。民盟附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國民黨當年專制獨裁，自恃武力在握，欲消滅一切異己，不僅在內部製造嫡系與非嫡系的窩裏鬥，對民盟和其它中間派也是從

政治壓迫到肉體消滅，無所不用其極，從而將他們推向敵方，自己變成孤家寡人。民盟附共後，國民黨更人心離散，士氣渙散，加速了崩潰。如果國民黨當年有點氣量，誠心誠意地同中共、民盟等組成聯合政府，黨爭限制在政治手段範圍，那麼戰後的中國也許會走上戰後的西歐那樣的道路。須知當年中共也非鐵板一塊，外有斯大林交槍政策，內有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議會道路派，主張「中國已進入一個和平民主新階段」。在民主憲政的環境中，中共是可以被改造的。

對中共來說，重要的經驗教訓也是要容忍政治異己，亦即最近大陸上有些人士提出的「容、忍、愛」。當年中共壓服了民盟和其它民主黨派，使社會萬馬齊喑。再無什麼力量可對中共起有效的制約，遂使中共黨內極左思潮，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個人獨裁，以勢壓人等消極因素惡性膨脹起來，終于走向自殺性的文化大革命，國家、人民陪各級黨幹一起遭殃，中共的力量和威信遭到了不可逆的摧毀。如果中共當年有點雅量，真心聽取人民意見，不搞什麼陽謀，那麼今天的國家多少還可和東歐各國不相上下，不致落得如此貧窮落後。

日午則衰，月盈則虧，歷史經驗證明，執政黨一旦「徹底戰勝」了對立面，達到了「全面專政」，那麼自己也走上了衰亡的道路。當政者視民主為「自殺」，就難免走上真正自殺的道路，不亡于外敵，亦必亡于內亂，即毀了自己，又禍國殃民。

對民盟以及對今日的民主團體來講，重要的經驗在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應該說，民盟本來對此問題是清醒的。就在民盟拒絕參加國大時，仍表明堅守第三者立場，并希望世人尊重，「如果以利誘或威脅將第三者弄向一

邊，只能把國家的事越弄越僵，越弄越壞，結果是毀了別人而無益于自己。」但是，在民盟被解散又在香港重建後，就向中共一邊倒了。這當然首先要怪國民黨的為淵驅魚，但民盟負責人以感情沖擊理智，不但自己輕棄第三者立場，還與中共一起攻擊繼續保留第三者立場的人士，不能不說是個大錯。從此民盟就放棄了獨立自主的權利，喪失了防衛能力，被迫接受中共「領導」，對中共違反民主、侵犯自由的惡政再也無法以組織形式抗爭，對中共的壓迫也無法以組織形式抵抗，（個人抗拒還是很多的），結果被各個擊破。

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教訓在于：對共產主義的蔓延只能靠民主來抗衡，而不能靠武力來消滅，尤其不能靠那些極右軍事獨裁集團的武力。值得指出的是，當年美國的領導人和民衆對以民盟為代表的第三勢力的精神是同情和欣賞的，但是由于西方人長期對東方人的歧見，不相信東方的民主力量能成氣候，（筆者知道一些美國朋友，至今仍認為「中國就是需要毛，印度就是缺了毛」！）為了抗衡蘇聯，不得不支持不得人心的極右獨裁集團。然而東方的統治者常有一種傳統性的劣性，一旦武力在握，外援得手，便自我膨脹，無法無天起來；心裏沒有民衆，眼中沒有輿論，只知排斥異己，一意孤行，乃至倒行逆施，為淵驅魚。民盟只是被驅的一條大魚，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大魚小魚。使中共席卷全國的，是腐朽的蔣家王朝，使越共直下西貢的，是從吳庭璣到阮文紹一系列右派獨裁者；使非共人民軍成燎原之勢的，是專橫獨斷的馬科斯集團。這些獨裁集團都曾一度背靠美援，藉名反共，將許多民主人士打成共產黨或其同情者，與共產黨左右夾攻，分解第三勢力，最後自食其果。

可喜的是，美國逐漸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漸從武力防共轉為注重民主力量。結束越戰後，卡特首先發動了人權攻勢，加上印支難民的慘狀震驚世界，使共產主義世界在政治上開始失去了主動權。美國在菲律賓事件中的作用又表明人權攻勢已擴大到右派獨裁集團的頭上，里根總統聲明：「右的獨裁不比左的好。」從此世界尤其是亞洲的民主運動轉入了新的一頁，從南朝鮮，台灣到印度，巴基斯坦，都產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變化，執政黨正在重新考慮對待在野黨或反對黨的態度，中國大陸上也傳來了政治改革的呼聲。遠東民主的曙光，已經隱約可見了。

歷史的新頁

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會後，又讓各民主黨派恢復了活動，并指定其作用為「決策智囊，對台統戰」。一九七九年十月，民盟開了四大，確定了「新形勢下的工作重點」為：「教改調查，智力開發，科技諮詢，支邊支貧，協助中共落實政策，改正右派，對港台交流等。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各民主黨派都在迅速擴大隊伍，吸收新血。在高校和科技界，民盟和九三學社擴張很快，許多中青年知識份子紛紛加入。一九八三年底，各民主黨派幾乎同時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章程，而且這些新章程幾乎以同樣的句子開頭：「中國民主同盟（或其它什麼黨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組成部份，是文化教育界愛國知識份子（或其它什麼界什麼人）的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乍一聽仍然是一股尾巴黨的味道。但筆者以為這只是表面的現象，表面下的深層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在民盟及其它民主黨派各支部每週一次的組織生活或其它討論會上，話題基本上圍繞著智囊決策，統一戰綫等主題展開，但是慢慢地就充滿了牢騷，什麼知識份子比工農或個體戶窮啦，流動困難啦，會幹的不如會拍的啦，某某領導官僚主義啦，拍蒼蠅不拍老虎啦，教育基金不足啦等等；再講下去，就講到民主自由問題上來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正確決策也好，祖國統一也好，關鍵就在于實行民主；社會上的種種弊端，也主要是源出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自從作協四大提倡言論自由以來，民主黨派也在政協或人大的討論會上更加積極起來，例如民盟常委千家駒等就以善于獨立發言而蜚聲海內外。

今年六月中共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針，一些官員甚至點名要民主黨派「像個政黨」，「要有自己的政見」等等，一些區縣級黨委甚至為同級民主黨派配備幹部。執政黨如此「扶植」在野黨，恐怕在當今各民主國家中也未發生過，真不知這是中國民主的「佳話」呢還是悲喜劇。顯然，這表明中共改革派在今年初保守派的反攻面前，決心起用黨外力量以增強與保守派抗衡的實力。政治改革給各民主黨派打了興奮劑，各種研討會，政治沙龍應運而生，湧現了許多「離經叛道」之論并逐漸為輿論認同。例如有的說「馬列主義指導下的百家爭鳴」是自相矛盾，既是百家爭鳴便不應確定指導思想，馬列主義亦只能成爲百家中的一家來與別家平等競爭。有的說「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校長，專家等）負責制」是不知所云，無權領導者怎好負責。有的要求訂「黨派法」，給各黨派以監督權，知情權，參政權等。有的要求訂「侵犯公民自由人權的治罪法」以保障人權。有的要求政務公開，個人檔案對本人公開，甚

至執政黨的黨務亦不可看作一黨之私事而加保密。有的要求對國家各級行政機構進行新聞監督，議會監督，黨派監督，反對將新聞當作「黨的喉舌」。有的要求改變「中共揮手，人代舉手，政府着手，政協拍手」的現狀。有的不滿于「黨的權，政府的錢，人大的手，政協的口」的現象。許多言論之「右」已不下于反右時的鳴放及西單民主牆的水平，曾經在《中春》或其它海外民刊上出現過的觀點現今也合法地出現在各種輿論場合。

這一切表明，各民主黨派人士，尤其是其中的新鮮血液或曰「少壯派」，不會長久甘心于「尾巴黨」或「花瓶黨」的地位，而日益關心參與國是，將中國向多元化的民主社會推進。目前，民主黨派與中共的關係，在形式上已經有所改變，各級黨委對民主黨派的建議或意見起碼會像對洋人一樣來個外交禮節式的「讚賞」或「欣賞」。至于說有實質性的變化恐怕還爲時過早，但有了新的形式就可以容納新的內容。可以預料，隨着中國人民尤其是新一代的民主意識的覺醒，隨着更多的新鮮血液尤其是海外歸來的學人參加，民主黨派「離經叛道」的獨立趨勢將更加明顯，勢不可擋。

將中國由一黨專制推向多元化民主社會，這是民聯和一切民運團體的共同理想。怎樣走向多元化呢？各方面人士曾設計許多道路，其中海外僑民和留學生多設想促進國、共會談，而使一切中間黨派順理成章地合法登陸。國內理論界正探討引進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特點是人本化）和西歐共產主義理論（主要特點是多黨制的民主社會主義）來使馬列多元化，從而連鎖反應出政治多元化。還有一些地下民主團體探討經濟自由化，從而使經濟基礎多元化而致政治多元化。看起來中共內部一些開明人士也想通過壯大現有的民主黨派來達到多元化

，因爲他們認識到，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中共改革派不但會失去用武之地，反而可大有作爲。因爲一元化也使執政黨自身腐敗、腫、低效、無能，上面的經唱到下面就走調，下面的信息不能無扭曲地反饋上來，上下相欺，諸事難辦。這些走向多元化的不同道路，其實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促進的。在不同的道路上努力的人士，應該互通聲氣，互相聲援，求同存異，有容乃大，而不應該各執一端，互相否定，甚至唯我獨民（主），互相聲討。

我們期待着中共真心走政治民主化，決策科學化的道路，認真考慮西歐兄弟黨的原理和實踐，承認中國需要反對黨，容忍「愛國的反對派」。

我們期待着國民黨真心爲「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而努力，在最近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的基礎上繼續走下去，早日踏上大陸談判，使中國再出現國、共、民、無共商國是的面面。（此處「民」是指一切民主團體，并不限于民盟或民聯。）

我們期待着海外的民衆團體，包括台灣的新黨，過問干預祖國大陸的政局，同國內的民主黨派多方聯繫，積極向大陸擴大自己的影響。積極爭取自己在大陸的存在和發展權利。

我們期待國內民主黨派的老一輩寫出客觀的回憶錄，不僅回憶解放前的鬥爭史，也詳細回憶解放以來尤其是反右前後的歷史，重新重視當年的政治理想，爲徹底否定反右運動而抗爭。我們期待民主黨派的新一代考慮恢復各黨開創時期的宗旨，勇于獨立自主地參與政事，敢于爭取自己的各項政治權利。

我們期待着，在中國的民主大有希望的今天，我們熱烈地期待民主運動出現新的突破！

大小台獨

一、由統變獨

十多年前筆者是一個大中國統一主義者，根據民族大義、文化淵源、兄弟姊妹、骨肉同胞、血濃於水的理由，認為中國大家庭不容破裂，骨肉同胞不容分離，因而與台獨人士激烈筆戰。當時是一種敵我矛盾的情勢，即「有獨無統，有統無獨。」二者不兩立，不並存。

經過十多年來對台獨活動的參與了解和爭吵辯論，可謂不打不相識。筆者與台獨人士互相修正互相影響，覺得台獨人士也自有其道理。今日筆者已經由大中國主義轉變成為大台獨主義了。民族大義文化淵源的想法仍然未變，但即使是我的親兄弟親骨肉，如果大家意見不合，思想觀念格格不入，生活方式南轅北轍，我為什麼不能與他分家獨立門戶呢？

台灣人所以要追求獨立，一方面因為不滿國民黨的許多缺失，另一方面是恐懼中共的胡搞亂來。朱永德教授說美國脫離英國的「獨立宣言」中，列舉了英王的二十一條罪狀，今日台灣人也要脫離中共的恐怖陰影，可以列出毛始皇四人幫更多更大的對大陸同胞的罪狀。文化大革命殘酷暴虐，官僚的顛預腐化封建專制，人民的貧困無知粗野落後，使得台灣人望而生畏，如何敢去認同回歸呢？要分還是要合，民

(台灣作家·美國)劉添財

族大義骨肉兄弟並不是重要的因素，人民的福利才是重要的前提，這就是筆者由統變獨的道理。

二、大小台獨

雖然筆者已經變成一個台獨主義者，但是仍然與台獨人士爭論筆戰不休，其性質却已變成人民內部矛盾了。爭論之原因乃是筆者主張大台獨主義，而許多台獨人士都主張小台獨主義，這兩種主張是不能兩立不能並存的。

所謂大台獨主義有兩層意思：

對內：心胸寬大。不分類不分化，包容居住台灣的全體一千九百萬同胞，大家都是台灣人也都是華人，民族文化都相同，但我們仍然有權獨立。台灣國和中國、新加坡國是「一族三國」，應該相親相愛相扶助，有如分家了的親兄弟一般。

對外：志氣宏大。台灣國要與中、蘇、美、日等大國平起平坐。台灣國是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國家，不能做別國的附庸傀儡，要自尊而後別人才能尊之。同樣久受日本人統治欺壓的朝鮮人的精神值得台灣人學習。

所謂小台獨主義也有兩層意思：
對內：心胸狹小。其眼光之短淺竟以為全

世界就只有一個台灣，福佬人佔台灣人口多數，因此要做台灣的主人。又把居台同胞分類分化：有「雙腳」的台灣「人」和「四腳」的中國「豬」，還有「三腳」的「台奸」，台灣「人」是「台灣民族」，中國「豬」是外來異族，必須劃清界綫認明敵我。近來居然還有台灣「人」的小腳趾甲分叉，中國「豬」小腳趾甲不分叉的「動物分類學」偉大發現，更有科學分化的根據。

對外：志氣卑小。甘願做二流三流的附庸國傀儡國，居然會把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問題，向美國地方法院告洋狀，其親日媚日的言行更加令人起雞母皮。

三、偽台灣國

「台獨聯盟」元老王育德除了貶斥侮罵客人、高山族和外省人之外，他却與日本人十分親愛，他說：

「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和滿洲、南洋打天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

「台獨聯盟」中央委員兼發言人王康陸先生竟然當面指責筆者「栽贓」給王育德，認為王育德不會說這樣的話，可見王發言人也認為台灣人說出這種話是很無恥的。總算大家都還有共同的羞惡之心，知恥近乎勇，這是可喜可賀之事。至於是否筆者在「栽贓」，請大家翻開王育德著「台灣——苦悶的歷史」第一四九頁，白紙黑字明明白白，是誰在瞪眼講瞎話？是誰喪失理性良心？實在太清楚了。這王育德之荒唐無恥還有太多白紙黑字為鐵證，詳見拙文：「台灣人同聲一哭」。另外「辜氏台獨」

則說過：「中國人不如日本人的脚毛」！

如果有朝鮮人也講王育德這樣子的話，恐怕難免被他的同胞吐口水，甚至於打死他，但「小台獨」人士却把王育德尊奉得如同聖人，民族性之差異竟然如此巨大。不過，台獨人士中還是有志氣有骨氣的人，那就是社會主義派的史明先生，但「小台獨」中尊重王育德的比尊敬史明的人要多得太多了，他們準備建立「王育德模式」的「台灣國」，必將如同以前日本人所卯翼的「滿洲國」一樣。請問，哪一位華人能容忍這樣子的偽台灣國？中共怎能不出兵解決這樣子的偽台灣國，筆者爲了要救真台灣國，怎能不繼續批判「小台獨」作風？

綜上所述，可見大台獨是真獨立真台灣國，是親中國親華人的，是督促中國人反省檢討修正進步的，應當受到海內外華人的同情和支持。反之，小台獨是假獨立偽台灣國，是親日媚日的，是反中蔑華仇視中國人的，必將受到海內外華人的憤恨反對。大台獨還有些成功的可能，小台獨則必然難免可恥的慘敗！

四、一大敗筆

像前述的「小台獨」作風，無論如何是成不了大事的，筆者還可以舉歷史事實來作證：滿清時代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却沒有一次成功，其原因就是內部分類分化，漳州人與泉州人爭戰，客家人又去做清朝的「義民」，清王朝只須以少量兵力輕易就可平定叛亂。今日台灣居民更加複雜，三百多萬被辱罵爲「四脚仔」的「中國豬」（外省人）如何去認同「台灣國」？鐵定要去做中共的「義民」！

今日台獨人士在策略上頗有進步，使用「

自決」二字確實比較容易引人同情，不幸的是他們還在堅持他們是「台灣民族」的說法，這是明顯的分類分化排斥外省人，並與所有華人爲敵。試想想，在台灣居住三四十年就從中華民族變成「台灣民族」了，這不是笑話嗎？外省人怎麼可能自稱爲「台灣民族」來民族自決呢？

台獨人士有最新潮的民族定義：只要生活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就會變成不同的民族。照此說法，今日在美多年的許多台獨人士早就應該是「美國民族」了，怎麼還敢冒充「台灣民族」還繼續關心台灣故鄉甚至干涉台灣內政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台灣民族」的新潮提法把「自決」這件事變成了壞事，有害無益，真是一個大敗筆！這又是「小台獨」人士想出來的一個餿主意，搬起一塊大石頭猛砸自己的腳！

五、大家修正

每次筆者指出「小台獨」人士目光短淺，心胸狹小，搞分類分化，就有「小台獨」人士提出國民黨也是目光短淺，心胸狹小，並且國民黨也在搞分類分化來反駁筆者，這只能證明國民黨和「小台獨」一樣差勁而已。我不必爲國民黨辯護，不錯，國民黨在台灣劃分本省外省，又利用福佬客家的矛盾，這都是事實。但國民黨統治階層已經包容愈來愈多的台灣人了，台灣人在決策層面已經有相當的發言權了。請問「台獨聯盟」數十年來可曾容納一個外省人？一個也沒有！罵國民黨分類分化專制獨裁的「台獨聯盟」，比國民黨更加分類分化更加專制獨裁更加不知民主寬容爲何物！「台獨聯盟」就是最典型的「小台獨」心態！

幸虧今日海內外其他台灣人日趨開明開放溫和理性，大家明白了如此「小台獨」下去必是死路一條。「民主進步黨」、「台灣革命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台灣同鄉會」等等都愈來愈開明修正，也有漸漸包容外省人的。最頑固不化唯我獨尊、唯我獨台、自命爲「正港」台灣人精英，對異己偏狹排斥不遺餘力、宣揚誇大台灣人和中國人差別仇恨、唯恐台灣不內亂不流血的，還是「台獨聯盟」！最沒有志氣沒有骨氣對外人搖尾乞憐的，也還是「台獨聯盟」，它真是台灣人建國自救的一塊大絆脚石！台灣人要救台灣首先就要唾棄「台獨聯盟」，並努力開放努力修正，前途才有希望！



台獨問題正困擾着中國。圖為許信良關關回台時，紐約台灣同鄉的歡送會會場主席台。

國民黨能夠對「民主進步黨」如此容忍，並且要取消戒嚴法走向實質憲政，這是做了極大的修正。希望它能更進一步為二二八事件平反，化解台灣人的怨憤，再加強「台灣化」開放政權給全體台灣居民，以促進島內的和諧。同樣的，中共也在醞釀經濟改革之外的政治改革，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共能克服教條派頑固派的阻撓，能放棄「四個堅持」，也開放黨禁報禁，走向民主憲政。總而言之，各大門派都在修正改革，形勢一片大好。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可抗拒，大家都要向這個方向走才對。國共獨三方面要互相激勵，看誰在民主競賽上得冠軍。

六、折衷妥協

爲了遷就中國傳統濃烈的「統一」感情，台獨人士似乎也應慎重考慮中華國協聯邦之類組織，一方面照顧了全體中國人的感情，維護了全體中國人的面子，一方面仍然保持了台灣實質的獨立，以避免海峽兩岸的流血，這是介於統獨之間的一種兼顧並存「摸喇仔兼洗褲」的折衷修正方式。因爲統一和獨立都不是絕對的優越，而是各有利弊，中國人要發揚理性智慧，就必須妥協，大家求同存異各讓一步，不要堅持己意自以爲是，不要走極端、要性格，不要鬧僵、鬧翻臉。

最重要的還是在台一千九百萬同胞的內部整合，如果內部和諧一致才有力量與中共談判及爭取世人支持，他才能保障台灣在中華國協內的自主自決地位。如果堅持「台獨聯盟」的「小台獨」心態，在台灣島內自己分類內戰，滿清時代歷史重演，那麼一切都不用談了，準備向中共投降接受統一解放吧！

●文藝園地●

龍鄉記事（詩組）

（美國）哲子嬰

（一）歸鄉記懷

打開地圖滿是塵
我非雲遊四海來的

不像夢也像夢

我恰似孫行者

日行 夜行

十萬八千里也

我非來憑弔歷史

我已決計歸來了

道是浪子回頭金不換

不瞞說

我回來看乾坤轉

天翻地覆嗎？

我家在長城頭

在黃河邊

滾滾江流東逝水啊

朝代跟朝代

到我這代

我變了無根草

我並非可憐的

也別問我爲什麼

道是落葉歸根麼

總之 我是決計歸來了

走下火車

我好愕然！

忘掉羅湖橋上熙攘

我想起那年被五花大綁

在鐵網橫連監倉裡

五月沒有流火

祇有槍聲凌亂

好一幅悲愴逃亡潮

我成了變相囚徒

坐於尿桶上看千秋

血是沸騰的

噢 轉眼廿四寒暑

我心那麼怔忡！

都像急景殘年嗎？

都是沉疴的夢噩

我於今乘雲歸也

莫問我陳年舊事吧

想想 我再不歸來

老死是淒然的

我媽盼我半甲子

她滿臉是兩朝烙印

我爸作古十年了

他死在十年浩劫裡

想想 我再不歸來

哪來顏面見江東父老呢

●文藝園地●

台灣政局突破的分析

(台灣留學生·美國)楊農

一、序言

今年三月，國民黨組成十二人小組，以研究所謂六大中心議題為任務。這六大議題包括(1)地方自治法制化；(2)國家安全法令；(3)充實中央民意機構；(4)民間社團組織制度；(5)社會治安；和(6)黨的中心任務。

事實上，除了第(6)項議題外，其它內容均在台灣各種政論性雜誌，尤其是黨外刊物，早已爭論了二十年以上。對於常閱讀政治性雜誌的人而言，這些議題本身並無新鮮感，因已司空見慣；且連國民黨的刊物亦非接觸這些議題不可。令人耳目清新的是，國民黨竟自今年三月正式公開要研究這個問題。經過半年的研究，由參與的學者專家和一些官員做成建議後上呈決策層裁決。在裁決過程中，國民黨的開明派和保守派必有一番爭鬪；而同時台灣黨外仍然不斷地舉辦街頭示威和集會演講，以直接訴之群眾；而以今年九月廿八日組成的「民

主進步黨」為最具有震撼力量。這個以「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的搶灘方式，在最敏感時刻無疑地發揮了推波助瀾的莫大功能。到了十月初，國民黨才鄭重和明確地宣佈要解除戒嚴和開放黨禁。至此，台灣的整個政治態勢才算完全明朗化。筆者深信，台灣政局將有長久陰霾後撥雲見日的舒適和快感。因為，這六大議題幾乎涵蓋了台灣社會上的所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糾葛不解則根源於戒嚴法的長期實施；如今戒嚴法既將取消，則其它問題必能迎刃而解。

為什麼黨外運動奮鬥了二十多年，所爭論的內容直到今年三月才被國民黨接受而正式研究？而且為什麼直到今年十月才達成黨外的心願？因此，國民黨宣佈解嚴和開放組黨的社會背景值得吾人深入推敲。

按蔣經國對華盛頓郵報的聲明，導致決定解嚴的因素有二：(1)為推行台灣民主化；和(2)為改善台灣的經濟環境。按吳伯雄在立法院的

答詢，解嚴的目標有三：(1)為了國家長治久安；(2)提升國家形象；和(3)考慮整體利益。事實上，長期以來包括國民黨的一些開明派中的有識之士，即已提出下列的見解：欲使台灣在整個中國變局中產生更大的導引力量，台灣本身必須完成(1)貫徹民主憲政，以完善政治民主化；(2)保持經濟發展的領先並使之擴大；(3)建立獨立自主而堅固的國防體系。

綜合以上所述，和筆者對台灣政治經濟情況的了解，對國民黨在此時此刻解除戒嚴的社會背景，簡略分析如下：

二、經濟層次的背景

達成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是近年來台灣的財經官員、學者專家和企業界的一致共識。目前最大的爭論是推行的速度問題。根據報導，當財經官員欲把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長遠目標轉化為實際政策時，遭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難。譬如，各種企業利益集團漸增的壓力，造成財經官員在制訂政策時舉棋不定，故而使得自由化和國際化的腳步緩慢。許多財經問題已非單純的經濟因素所引起；追根究源發現需以經濟理論外的政治手段才能解決。

因為自由企業和民主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如一體之兩面。過去卅年，台灣經濟奇蹟之達成，除了經濟政策朝向企業自由化外，尚有地方自治的逐步實施而完成某種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相配合。當經濟欲朝向更高層次發展和提升時，亦需輔以更高層次的民主化政治，否則不易有所突破。

三、政治層次的背景

(一) 自上而下的指導思想

國民黨以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信誓旦旦地要為三民主義理想而奮鬥，亦即要在全中國實踐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其目的在求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其重要內容包括：(1)主權在民；(2)共和政權；(3)革命民權；(4)權能區分；(5)直接民權；(6)五權分立；(7)政黨政治；(8)地方自治；和(9)均權制度等。

然而，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把孫中山的理想落實到中華民國憲法上；而且直到一九五〇年後，才真正有機會在台灣推行這部憲法。但是戒嚴令的頒佈，使得這部憲法的許多良法美意無法落實到自憲法延伸的其它法律上。亦即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並未全面在台灣展開實踐，尤其是政黨政治形同虛設。因為青年黨和民社黨如同政治花瓶，亦可比喻為國民黨的姨太太政黨。眾人皆知，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若無政黨政治，則民主政治的層次絕無法提升。而戒嚴法正是阻礙台灣政治民主化提升到更高層次的關鍵所在，亦即戒嚴法是貫徹民主憲政的絆腳石。

因此國民黨若欲推動台灣民主化以達到孫中山民權主義的理想，則不廢除戒嚴法絕無法奏功。

(二) 自下而上的主動爭取

卅年來，台灣實施的地方自治，使得各種選舉定期舉行。競選期間，黨外卯足全勁投入，把前述數大議題直接訴之民衆，每能掀起競選的高潮。非競選期間，黨外政論性雜誌的強勢宣傳，提出各類尖銳和敏感的政治話題，並分析各種社會弊端的根因所在。這對於民主政治的啟迪，發揮莫大的功能。因此，投入選舉

和出版雜誌是台灣黨外運動的兩項利器。

國民黨藉著戒嚴法為框框的「鳥籠政治」，就在黨外的不斷挑戰和膨脹下被突破。黨外以指責國民黨違反憲法即違反三民主義為最高層次的挑戰，並能舉出國民黨甚多的違憲之處，以爭取群眾的共鳴。黨外藉著各式各樣的座談會和演講會攻擊國民黨，並訴之街頭運動，乘勢製造糾紛而煽動群眾對國民黨的不滿（暴力邊緣論）。因此，每一個人或每一本刊物，都是一只腳踩在法律內，另一只腳踩在法律外（法律邊緣論）。故而，不少人身陷囹圄；不少雜誌被查禁。然而，前人入獄，後人再挺身而出，演成關不勝關的態勢；雜誌被禁，只要換個名稱再申請出版，內容仍是大同小異，演成禁不勝禁的態勢。

關既不勝關，禁亦不勝禁，國民黨只有在「鎮壓」或「寬容」的矛盾中得過且過。事實上，國民黨至今仍未覺悟到，黨外是舉着三民主義打國民黨。因為民權主義的革命民權說即已教育人民——人民的權利不是上天自然賦予的，而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黨外運動就是革命民權說的具體實踐。若非黨外長期奮鬥爭取，積極主動，流血流汗，筆者深信徒有自由民主內涵的三民主義之國民黨，仍要睡大頭覺，堅持戒嚴千萬年。

四、社會層次的背景

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台灣的私人企業不斷擴大，人民於擁有經濟資源後，必然要求進一步的政治資源之分配。故而人民參與決策的期望大幅提升，且參與的層次要求愈來愈高。人民的參與期望若無法得到滿足，則社會衝突必然產生。參與的管道若無法暢通，則人

民似水流決堤。而戒嚴法若繼續實行，不僅阻礙政治民主化的提升，且漸為台灣社會衝突的基因，更堵塞了大量欲參政的黨外之意願。

民主政治是人類文明史上，迄今解決社會衝突最合理的方式，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潮流。由於經濟發達，教育普及，中產階級不斷增加，人民知識水準不斷提高，民主政治的意識在人民的腦中根深蒂固，亦即幾乎每個台灣人都民主潮流中的一份子，國民黨已無法抗拒這股潮流。故而，台灣民主化的阻力絕不在人民的民主意識，而在國民黨本身。

五、結論

民主思想在早期的中國文化中曾出現過，但並未演化爲近代的民主制度。根據二次大戰後落後或發展中國家實施民主政治的歷史看，民主政治並不易達成。今日，在政治學者眼中堪稱爲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不出廿個。欲達成完全的民主制度，必需同時配合以各種成熟的社會條件方能畢竟全功。這些條件包括政治長期穩定，經濟水準提高，社會開放多元，民主意識的培養等。尤其人民的民主意識必須在教育系統中灌輸，否則無法產生全面性的民主意識。

上述諸條件在今日之台灣都已相當成熟；亦即台灣已具備實施更高層次的民主政治運作方式之所有條件。當然，台灣欲達到政黨政治運作的圓熟境界，尚須假以數年。因爲，不論各政黨，甚或人民群眾都須重新調整其心態，以適應政黨政治的新局面。然而吾人可以預測到，未來數年台灣將是政黨政治的感性時期，而後才進入較理性的階段。畢竟對中國人而言，尚無獨自運作政黨政治的實際經驗。

台灣民主運動的隱憂

(台灣作家·美國)謝眉

在台灣新黨成立之後，參加了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終於塵埃落定，沒有出現很突出的選弊，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波，關心台灣民主動向的人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是，環繞台灣的注意力却增加了。不只是日本、美國的報導和評論出現在顯著的位置，像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都有專文分析。香港新聞界對台灣選戰之熱切，尤其表現在他們派往台灣採訪的陣容空前龐大上，以及他們對台灣選戰報導所佔的份量上，（幾乎可以和港督尤德逝世的消息同等）。特別使人驚訝的是，香港人對台灣政治興趣轉變，近乎奇峰突起。這種情勢是跟香港近來的情勢發展有關，還是因為駐北京的外國記者紛紛連袂南下，自香港轉赴台灣，而帶動了他們的採訪潮？總之，台灣選戰是過去了，台灣民主運動所顯現的一些問題，却因由這一廣泛注意而進入一個更深入研究的階段。在這個分際，我們發現了四個性質不同的反響：

一是香港輿論傾向於統一主義。在許信良回台事件上，由艾琳達等人把餘波帶到香港的時候，香港人明白的表示不歡迎「台灣式的分離意識」。這是台獨組織對香港政治的誤判。台獨組織起初認為說台灣話的台灣人當家做主，想「獨立建國」的願望，是可以讓說廣東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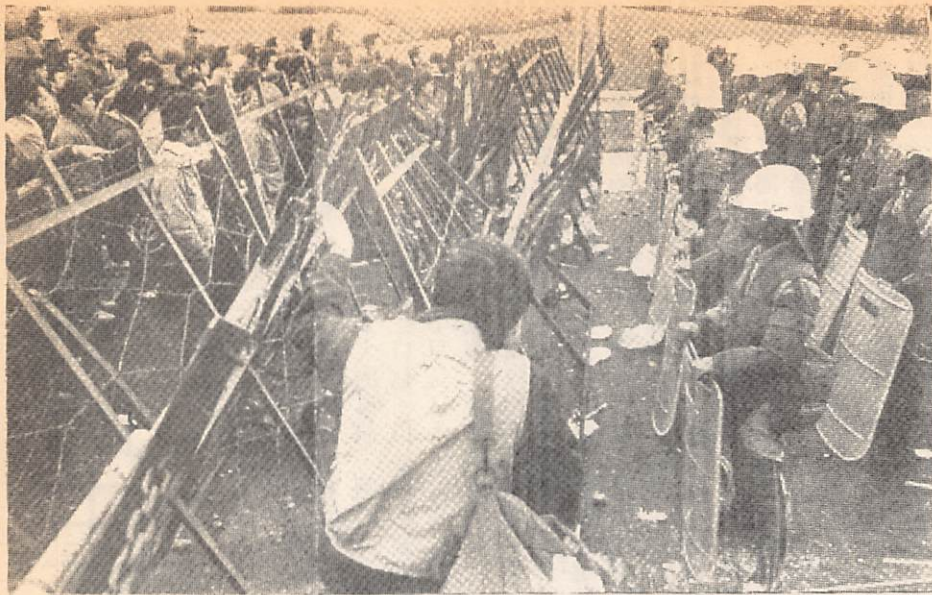
的香港人在政治訴求上表現同情。香港人唯恐失去既有的繁榮和安定，在政治訴求上一向採取比較溫和和有限的步驟，台獨組織這種邀取和煽動，被敏感的評論認為是「攪局」。同時，對台灣新黨的宗旨，不能苟同其「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民自決」的觀點。香港人認同台灣人是兄弟，這兄弟說我們不是一類，很使香港人有受刺傷的感覺。一是袍澤之情的割捨，二是被推銷「民族自決」不成而引起的那種附加侮謾。香港人在來不及了解台灣民主運動的實質以前，就被鼓動民主的氣焰所排斥了。而台灣新黨看香港輿論，却集中在香港人的統一主張上。不是認為他們受中共意志所支配，就是認為香港輿論向中共權勢屈服。基本上，台灣新黨的眼裡至多看到三個半人：美國人、中共人、國民黨人和半個日本人。他們的體質、胸襟、見識，還不太了解台灣未來發展和香港唇齒相依的關係。這種排斥與冷淡，將由雙方的經濟關係升等至較密切的政治關係時，預期了解會加深，而矛盾將減小，冷淡可以化解，爭執和融和勢將不斷反覆。像一般家庭中逐漸成長的兄弟，「台灣結」需要努力化解。

其次是美國輿論的轉向。在許信良發動組黨回台，到決心回台入黨的宣傳攻勢當中，美國報刊對他的新聞越來越小。除了一家中文報紙對許極力捧場之外，一般華人對他的「回台」只當是他個人的「靜極思動」。美國人和在美華人中較有識力者，比較注意新黨的發展和新黨在選戰中新試的「啼聲」。華盛頓郵報在十二月三日的社論已經肯定了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徵兆了台灣政治結構因接納新的中產階級而走向民主。這個形勢會形成困擾。他們預言這個困擾會使得未來一、二十年當中，美國與中共一個中國的諾言會受到影響。很明顯的，這是指民進黨打的一自決「牌」而設的。十五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則進一步的指出一自決「會影響新黨的合法性。新黨成功的作出了挑戰，並不足以控制台灣政局。時代周刊既指出這個成功並不保證新黨繼續運作；我們也看得出來，新黨也缺乏凝聚力，作更高層次的運作。假若，十二名新黨立委全體投入內政委員會時，對下屆會期中必然要審議的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組織法、選罷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這類基本權利上會做出很大貢獻。他們將由普通的政治人士一躍而為政治家，但他們必然會被國民黨以各種利誘而分化散入各種有利的團體，分散他們影響力，減低他們的發言權。美國人也看到桃園機場的暴力事件，影響了新黨的形象。他們也擔心台灣的暴力傾向。美國朝野對許信良都相當冷淡，眾議員霍里亞達說許的份量不能和金大中、艾奎諾比，對他沒有興趣。到暴力事件結束，許氏回美，美國人的筆下表示他的「一秀」已經結束，留下的影響如何，端在新黨爾後的作為，顯示出美國棄台獨而許可新黨制衡力的意願。

華盛頓郵報的觀點與紐約時報九日的社論也有相應的呼應。華爾街日報的專論則據此更憂慮台灣前途的不明確，影響到兩岸接觸的形勢。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則一片叫好，對蔣經國的決定、台灣的現況和發展，都保持高度樂觀

。總之，美國人都好好壞壞，看到了台灣民主的皮毛。助理國務卿西格爾十一日的演說，更具體顯示了美國官方的意見：台灣立法委員的選舉，在立法院中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

許信良闖關引起台灣機場 警民對峙和暴力事件發生



，以制衡當地的戒嚴法政府，令人鼓舞。同時，他也預見在前進的（民主）道路上有些困難，但「我們對發端的進程，感到印象深刻。」很明顯，美國人要努力阻止他們對台事務之介入，但不得不寄予更大、更多的關懷。

第三、從十二月五日起到九日在安徽合肥發生了學生的民主示威遊行，前後有五千人參加，抗議共產黨把持人民代表候選人提名。他們高喊：「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口號。向在九號那天，武漢兩千五百大學生也（要求選我自由實行民主」。北京大學周五（十二日）出現了大字報，力促學生走上街頭，為民主而鬪爭。北大學生說：「中國是一堆乾柴，只需要一點點火種把它點燃，奮起吧，同學們，做這個火種吧！」。法新社十日在北京的電訊說：「一位年輕的知識份子表示：台灣比我們先進，有不同的觀點總比較好一點。」大陸對這次選舉只有簡短的報導。但法新社認為：「台灣變局觸發了一些人對大陸的評價」。這觸發二字，很難估量。縱有，也一定不會出現在大陸民主示威遊行的口號和公開的言論中。因為爭自由民主而以台灣做樣板，估計會嚴重觸怒中共當局。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得不對法新社的報導持幾分審慎。就長遠的前途看，台灣的民主運動，和大陸的民主運動，遲早會發生血肉相聯的關係。但不宜掛鈎太早。新黨黨員要深究黃老，領會韓非、商鞅的道術，尤其要細味時與勢的主客形態。尤清說三通，首先提到議會交流，是不知時勢而又昧於事理的話。大陸的人民代表大會比台灣的立法院還「橡皮圖章」，大陸的政協比台灣的民青兩黨在素質上強很多，但「花瓶」的實質也好不到哪裡去。議會交流在實質上無意義，在內容上難對榘，雙方都羽毛未豐，很難逃瞬息即變的專

制大手。我們喜見兩岸民主運動各自繁茂，連理同枝，俟諸雲開霧霽。唱和則可，形勢所逼，不必汲汲於掛鈎携手也。

第四、台北聯合報十日的一篇社論，很嚴厲的譴責「朝野一致脫法與違法」。這篇社論在表面上呼應了蔣宋美齡在四、五兩日發表的長文，指出「敵人就在蕭牆之內」。所謂的敵人：(1)由分離意識支配的「自決」論者；(2)為奪權做主而不惜煽動暴民的野心份子，(3)自棄於社會軌範而不得不能投入暴力的假性知識份子，以上三類人在選舉期間以民主壯膽、以自由護身，橫衝直撞，遊行示威，佔領司法大廈，給總統府「送鐘」，桃園機場毆打警員和毀壞警車，毆打便衣憲警和情治人員。這種事實被國民黨高階層以「基於政治安定」的考慮，而淡化處理了。淡化處理的結果形成了幾種現象。(1)情治單位長久以來不平的情緒朝兩個方向發展——A灰心喪志的怠工類；B忿懣難忍要拼類。A類會影響網紀鬆弛，不法的氣焰會更囂張，社會紀律更難維持。美國華僑認為台灣警察挨打，簡直「不成體統」。美國警察挨打是不得了的事。而美國警察只要遇到反抗，一定拳腳交加外帶槍棍。對台灣暴民之受「優待」，覺得很奇怪。聯合報說那期間幾乎「到達暴民政治的危機地步」。除了在評論上顯出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呼籲，同時，也氾氾了怨念，累積了仇恨。一旦取得機緣，情治人員將謀取權力，或製造寡頭政治，鼓動軍人干政，而發展成更為苛酷的暴力。

(2)在台灣人中長久醞釀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對外省人的歧視上，有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公開的形式。他們在這方面的氣焰很超乎情理。台灣人的事業是不用外省人的，台灣人的基層民主活動是排斥外省人的，台灣人一直努力

把外省說成「四隻腳」的歧視心理，是把對國民黨的恨意，全部泛化給所有的外省人了。這種恨氣造成了「竹聯幫」意識——外省子弟在被歧視排斥以後，由太保發展成爲流氓時，他們也給自己附加了國民黨的「忠貞」，準備聯合起來，對抗打着民主招牌的台灣流氓。

(3) 台灣少壯派軍人，目前擔任上校、少校級部隊長的軍官，都在四十歲的盛年，他們有較寬廣的閱讀範圍，有一套接近國民黨開明派的想法，但他們酷愛權力，和勇於承擔他視野所及的危難，一旦爲(1)類人所引動，爲(2)類人的痛苦所焦灼，很可能會發動全斗煥式的政變，第一個出現的行動，就是流血鎮壓。

這種早已爲識者所憂慮的情況，國民黨人是不肯說的。宋美齡的文章，和聯合報的社論，只是輕描淡寫，提到「軍人干政」的可能而已。我們對台灣的民主腳步表示鼓舞，對台灣人的不許講國語（十一月八日新黨在吳興國小的第一次黨員大會）表示遺憾，雖然新黨中央執行委員只有費希平一人是外省人。看來台灣人和新黨都缺乏容納外省人的雅量。在台灣的外省人超過五百萬，佔四分之一強（據報說台灣人佔台灣居民百分之八十五，是不確實的），組黨的傅正、黨章的起草人黃爾璇都被排斥於核心之外。這個新黨的代表性是真正值得注意的。他們之熱衷於權力，愛好運動，對國民黨在忍讓中所顯示的無力沾沾自喜，更將使他們走上引發血腥鎮暴的道路。邱垂亮在台北肆言台灣民主比香港進步一二十年，比大陸進步五十至一百年，這本是一句沒有尺度，而胡亂拿年紀來量民主的瞎話，對目前被勝利衝昏了頭的新黨人，這種諛詞有蒙混之害，對香港與中共民主的預期，則毫無益處。使我們覺得外界評論，對台灣民主運動往往搔不到癢處，

一些未經細究的謬言，也可能導致負面的影響。

台灣民主運動端賴國民

黨和新黨相忍爲國，細心維護。新黨不必急於對中共表態，但力圖促使國民黨三通，發展與香港的認識與了解。特別是破除內部對外省人的歧視與歧見，消除隔閡，不提仇（二二八）恨（國民黨的迫害），決心做到使用國語，以達成和外省人無隔閡交通自許。堅決反對暴力，不去街頭遊行，但爭取公開集會的權利。總之，不用歧視分離與外省人劃地成溝，更進一步講求和諧共存，把眼光放遠，慢慢尋求全中

笑話一則

世上最乾淨的河流

一位住在瑞士巴塞城（BASEL）的老先生對來訪的記者說：「萊茵河現在絕對有資格號稱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河流！」

記者問：「爲什麼？」

老先生從容地說：「因爲我們的化學工廠每週兩次用化學藥劑清洗萊茵河。」（註）

註：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萊茵河沿岸的瑞士和西德化學工廠先後發生十次有毒物質外洩的環境污染事件。

國的自由民主，爭取到大陸上去當家做主。

國民黨一定要及早制止嗜權無知，以「忠貞」爲無上責任道德的愚頑份子和軍人勾結。嚴禁軍官涉入政治活動，並斷絕任何形式的橫的組合。緊縮國安會的權力，但要重整法治網紀，對監督權、警察權要努力維護，打警察、和監察人員衝突，一定要給予立即而顯著的處理。最重要的是，能真正認清台灣形勢，不要俯仰由人，一方面要應付美國壓力，一方面又要對新黨虛以委蛇，這絕非民主之福。台灣有千萬條大道可走，若動一動暴戾之氣，心存殺機，一定玉石俱焚，一千九百萬人同淪浩劫。

（西德）李台彥

難忘的一天

漢斯從朋馳汽車廠退休的那一天，同事們照往例用剛要出廠的新車載他繞着廠房，到處告別。生產線上的工人們都齊按喇叭歡送，頓時廠房內上百輛新車的喇叭齊響。

同事非利浦對彼得說：「漢斯一定忘不了今天。」

彼得說：「當然不會，任何一個人都忘不了他的耳朵是那一天聾掉的。」

法國安德烈·馬爾勞看毛澤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項明摘譯

馬爾勞曾任法國教育部長。一九六五年馬爾勞以法國總統特使身份訪華。陳毅、周恩來、毛澤東分別接見了他，毛接見他時，陳、周均在場。一九六六年他寫成了「回憶錄」一書，其中有這次訪華的一章。下面是他在書中的一些記述摘要。

「毛是屬於那一群一個跟着一個跑到法國去，學了幾句法文就到法國工廠去接受他們的革命訓練的年輕人，但他却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他從未放棄他對大多數從國外回來的革命家以及從共產國際派來的使者的不信任。」……

「我們鬥爭的第一階段是農民反叛。目的是把農民自地手中解放出來；不是要言論、選舉、集會的自由，而是要生存的自由……我們並沒有訴諸理性來贏得人民，而是訴諸發展希望、信任和友愛。面對飢荒，平等的意志變成一股宗教的力量。」……我們贏得大多數的俘虜是通過有名的「思想改造運動」。到底「思想改造」包括些什麼呢？跟他們說「爲什麼你們要跟我们打？」同時告訴農民「共產主義首先是反對專制主義的保障。」……

不過我明白「思想改造」並不僅僅限於這些方面。自我批判大會常常就是控訴大會。跟着是驅逐、逮捕和處死。「堅決對抗藏在你腦袋裡的敵人！」……後來他又下令把全中國人

「重新改造」。當他責成他們「交心」，就有了那一套「心只爲黨跳」的宣誓儀式，那些大紅心的狂喜，其中有些還變成了風箏。

「如果革命只能由工人完成，那麼明顯地我們便無法完成革命。俄國人的友善，是對蔣介石的。當蔣逃離中國之時，蘇聯大使是最後一個向他告別的人……」

「美國簡言之就是美帝國主義，英國則在要兩面的把戲」……

「投之以桃則報之以李」，但是他隨之放低了聲音，好像跟自己說話一樣：「我們作了我們必須作的，但是誰曉得幾十年之中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不是反對仍然很強呢？」我問。

「還是有那些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知識分子等等，他們又開始有了下一代。」

「爲什麼算上知識份子呢？」

「他們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的影響絕不能說沒有了，特別是在年輕人中。」……

「在我旅行中所遇到的年輕人，我們大使說，都深深擁護你，主席先生。」

「當然也可以從那個角度來看啦！」……「你看到了一面，另一面你可能沒看到」……

「農業和工業的問題沒有解決，青年人的問題更沒有解決，革命和兒童必須要訓練。」……

「青年必須經歷考驗」。

氣氛的突然改變似乎加強了我們聽衆的靜默，一種異常好奇的不安突然產生了。簡直好像我們在講秘密準備原子彈爆炸一樣。「經歷考驗」，在兩千五百萬青年共產黨員中幾乎有四百萬是知識分子，毛的話提示着，也可以說預示着發動一次跟「反右」運動以及隨後的鎮壓運動類似的革命運動。

：毛說「世界的命運」是跟中國青年分不開的。他是否真的相信，要在中國領導之下實現世界解放呢？由一個偉大的革命民族的佈道者們所掀起的革命，當然似乎要比美國的政策高明……或許毛相信由未開發國家在世界奪權，是同斯大林相信由國際無產階級奪權的情形是一樣的，……但在目前，對索馬里、對越戰的宣傳到了每一個村鎮，這些都是斯巴達式統治的理由。毛祝福福河內、索馬里、聖多明哥，却肅清了他的西藏敵手。防衛越戰和西藏的共產化是相連的，比起對索馬里人或剛果人的象徵性援助，意義更爲深遠。就像在舊帝國胸前吸奶的一對雙生兒，每一個在峴港(DANANG)附近灌木林中倒下的越南游擊隊員，都證明中國農民的辛苦是該當的。中國將對所有受壓迫、爭自由的民族援助(到什麼程度?)，而這些民族的鬥爭是保持它內部統一的凝合劑。……產生新階級的力量是強大的……赫魯曉夫似乎以爲一個共產黨奪取政權就是革命完成了——好像不過是民族解放問題而已！他沒有提高聲調，但是當他一說到俄國共產黨，他的敵意就如同周恩來提到美國時的敵意一樣明顯。然而在洛陽或是北京的小巷中，那些把我們當作俄國人的小孩子(他們沒見到別種人)却朝着我微笑。

「那無產階級的中國思想、文化和習慣，現在還不存在，必須出現……只要有回到過去的危險存在，鬥爭就必須繼續下去。五十年不是很長久了的；只不過一輩子……」無疑地，這是在延安窯洞中說的一些話，我想起他「還看今朝」的詩句。

……自列寧以來再無人能如此有力地震撼

●台灣專欄●

國民黨的再改造此其時矣

(台灣研究生·美國)楊農

明顯地，解除戒嚴後的台灣，若能穩健而逐步地邁入健全和理性的政黨政治之運作常軌，則在中國民主政治史上將開創新的一頁。

對台灣而言，是繼創下經濟奇蹟或台灣經驗之後，在政治上開創政黨政治飛躍時代的肇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是第一個完成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雙重目標的國家。對中國大陸而言，由於台灣和大陸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差距加速擴大，另一更高層次的促進作用必將產生。故而對於全體中國而言，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值得海內外中國人正視之。

面對解除戒嚴和回歸憲法的政黨政治之新局面，按憲法運作將是最佳指導原則。而公平、公正和公開將是政黨之間自由競爭的最基本要求。因此，國民黨必須以身作則，做到依憲法行事，以期達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和公開。欲能以身作則，國民黨勢必要進行黨的徹底改造，否則無法畢竟全功。篇幅所限，以下僅簡述國民黨改造之道。

一、黨的性格之變化——由於其黨追求民

歷史了……他的決定將會是殘酷的、無情的，他仍在猶豫着……被一種不僅是「不斷革命」的什麼東西所煩惱着……他知道他將見不到全球性的革命。未開發的國家跟一八四八年的無產階級是同屬於一個階級，但是會有一個馬克思和列寧出現的……中國的時代在開始到來……他使我想起那些帝王：那些屬於帝王墓道的滿是鐵銹的軍隊頭領的盔甲，注定要被遺棄在

主的總目標尚未完全實現，須輔以革命手段，故國民黨自居為革命民主政黨。一個政黨兼有革命和民主兩種屬性，先天上就有矛盾，在實際運作上不易調和。因此，國民黨勢須首先釐清其黨的氣質，使革命屬性減少而趨向完全的民主屬性。筆者認為，國民黨應以完全的民主性格面對台灣的政黨政治；而以革命性格面對中國大陸的變局。

二、黨和政軍的分離——歷史因素造成國民黨的黨和政軍之間糾葛不分；給人的印象是：黨政軍是國民黨的一體之三面。這種混雜不清的現象有礙國家的長治久安，並有損國民黨的形象。黨和政的關係，由於民主進步黨的合法成立，將可輕易解決。然而黨和軍的嚴密關係，則須國民黨主動退出而速把軍隊國家化。否則以後難免造成社會上的黨爭會在軍隊中出現，此將非國家之福。

三、黨內民主化——長期以來，國民黨的黨中央與其黨員間是自上而下的權威式關係；在所有決策過程中是民主集中制式的。近十年

高梁田裡。在我們整個對話的背後，一個沒落世界的希望站在那裡注視着……

「我是孤獨的一個人」他又重覆說，然後他突然笑了：「唉呀！那麼幾個遠方的朋友：請代我問候戴高樂將軍……」

車子開動了，我把車窗的小簾子拉起來：他獨自一個人穿黑色的制服，在稍稍縮回的淺色制服的圈子中心。

來，上層決策偏離基層群眾愈來愈明顯。每次地方公職選舉，總有不少人心不服，未被上層提名則宣佈脫黨競選。因此，國民黨必須儘快把決策過程的民主集中制，改為上下交通無礙的關係。欲達此目標的唯一手段即為黨內徹底的民主化。諸如黨的重要決策人員必須由黨員自由競選原則投票產生；黨的重大決策內容亦依循類似原則達成。

四、黨和各行業關係的調整——國民黨的黨組織在台灣各行業中的籠罩程度雖遠遜於共產黨，但對非國民黨而言則難望其項背。長期以來，造成黨外的憤憤不平。基於公平原則——全或無定律，今後各行各業都須完全開放或完全禁止所有合法政黨發展組織。

台灣的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面對問題的全盤解決，國民黨必須貫徹民主憲政，亦即愈早回歸憲法愈好。如今，戒嚴將除，憲法回歸在望，民主的政黨政治即將出現。面對新局勢，國民黨欲進一步大有作為，則應宣佈解嚴和回歸憲法後，若內部不自我蛻變，則具有新形象和新氣質的民主進步黨將逐漸動搖國民黨的群眾基礎。反之，若能依上述內容進行調整，則蛻變後的國民黨將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民主政黨，則長期執政亦非難事。

論「文化大革命」再現的可能性

（美國）余森

今年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在二十年前，當時妖氛黑氣、腥風血雨，鬧得舉世震驚，至今大陸人民和海外關心大陸情況的人士仍在揣測是否尚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再現的可能。「中國之春」組織評論文革的專題討論，確實很有意思。

我的看法比較悲觀。我認為大陸在不久的將來必然還有內亂。當然，它不一定會採取「文革」的形式，也不見得再採用「文革」的名稱，但是可以把它視為「文革」的延續或再現。要準確地預測它的發生期是困難的，但大概可以說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鄧小平去世後的兩年之內。

我是從下列三方面來進行分析的。

一、中共本身的問題

這裏又可分為兩點：

1. 仔細觀察每一個執政的共產黨，便可發現它們都是在若干派系排列組合下維持平衡的。出現一個霸主，就能夠維持各派共戴一尊的局面，但是暗鬥也決不稍止。霸主一旦去見馬克思，用強大的壓力造成的虛假穩定也就隨之消失，一直在覬覦權力的各派之間勢必爆發你死我活的鬥爭，以期填補政治真空。中共至今未能合理解決接班制度問題，這就為日後的動亂種下了禍根。

2.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既開創了

動亂的先例，又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文革」期間，人性中惡的一面被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對許多人來說，今天除了「專政」之外，沒有任何旁的力量可以使他們壓制自己的對手。而且，「文革」使許多人領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道理和手法。可以說，兩派（或者各方）都在不斷地總結經驗，以待來日再現身手。所以一旦發生變亂，情況很可能比「文革」更殘酷。這是毛澤東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所以古語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二、民衆方面的問題

我毫無貶低同胞之意，但我要指出：中共多年來對文化教育的忽視，造成了民衆道德情操平均指數的低下。據中共內部統計，大陸半數以上省區的文盲率比「文革」前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其中包括素以文風鼎盛著稱的江蘇省和浙江省。文化和道德程度的低下必然成為社會動盪不安的重要因素，這裏包含着兩種危險。一是容易受人煽動而幹出蠢事，用中共的話來說叫作「受蒙蔽」。但這還可以說是不自覺的，另一種有意識的危害性更大，那就是志大才疏者將利用新的「群眾運動」作為進身之階。因為在專制政制下，靠打擊人往上爬，實在是名利雙收的捷徑。用中共的話來說就是「野心家」篡奪奪權。不能說中共的決策者沒有看到這一點，而是他們也確實無計可施來避免這

種情況發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民族素質的改善不像喊萬歲、背語錄那樣容易，何況還欠了那麼多的債。我見到過幾個中共高幹，他們私下裏都承認：極左派復辟的社會基礎至今仍然存在。

既有主體，又有客體，還缺一個把兩者聯繫起來的因素，那就是：

三、深重的社會矛盾

民主國家裏當然不會發生政變。在非民主國家裏，政變除採取武力外，還有發動群眾的形式，如菲律賓賓亞奎諾夫人之推翻馬科斯。但這一般要有兩個條件：一是社會矛盾相當尖銳，群眾不滿情緒高漲；二是政變一方相信自己有號召群眾的力量。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裏，更常見的是宮廷政變，這是因為一方力量足以控制局面。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國家當權派的敵對雙方都怕讓人民參加政治遊戲。就上述兩個發動民衆的條件論，第一條共產黨國家大都具備，第二條則雙方誰也心中無數，生怕一旦發動群眾，最後會被群眾把兩派都趕下台去。毛澤東之在「文革」初期搞群眾運動以打擊政敵，可以說在共產黨國家政變史上開創了先例。他這樣做，當然因為當時在高層領導中他的力量相對薄弱得多。而他敢於這樣做，並非深信自己真是群眾心目中的偶像，倒不如說是下列兩點的結合：

1. 政治上極端無責任無道義的表現。這是毛的一貫作爲。他在搞大煉鋼鐵、辦人民公社等重大決策上，都是完全不考慮可行性和後果，而是像封建皇帝一樣說幹就幹。他在蘇聯談到核大戰時說中國可能會有一半人死去、一半人留下來。他憑什麼可以這樣狂妄地斷言半數

中國人的死生呢？「文革」開始後他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時還說：「文化大革命可能失敗，可能成功，」足見他在發動之初是沒有把握的。發動「文革」可以說是毛的政治道德嚴重缺失的集中表現。

2. 毛對大陸的民情是有較深刻瞭解的。他明白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群眾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得不到滿足，可以說積怨如山，如把這一切都歸罪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群眾一定會把積憤都發洩在這些替罪羊身上。同時他也知道大陸上缺少積極要求進行改革的中堅力量——中產階級，一般群眾的歷史使命感是薄弱的，對政治體制及民族前途的意識是模糊的，這是他發動政變最理想的條件。換句話說，有很多人會跟着他起哄，却不會把共產黨整個兒攆下台來。實際上，這是毛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有意識地在文化教育方面造成的後果之一。

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等改革派確實想緩和社會矛盾，然而實際情況是百病叢生，再加上內部互相牽制，有許多問題難以得到解決。例如在經濟上物價上漲、質量下降、就業困難、住房緊張等一系列無法解決的問題，使群眾的情緒伴隨着美好幻想的破滅又一次跌落到最低點，可以說這像是一堆乾柴，一有火星飛來，立刻會熊熊燃燒起來。

我絕對不希望看到改頭換面的「文化大革命」的再現，因為我認為：另一次「X大革命」所流的血可能會超過「文化大革命」。大陸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流的血已經夠多了，作為炎黃子孫，誰都不想再度目睹慘絕人寰的悲劇重演。在此，我要正告中共領導人，請記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和「得意不可再往」這兩句古訓。如果你們還想要人民為你們火中取栗的話，多半會被人民把你們埋葬在火堆裏的。

存在與命運

（中國大陸留學生·澳洲）

孤子

嚴峻地注視着
自己的影子
像怪樹伸展着四肢
這個人走遠了
苦求遠方的清冽。

一個人莊嚴地宣告
上帝已經誕生
他將預示人類的未來
觀眾們走了
向山下喧鬧的都市。

先知預告着
人類的死亡
開拓出無數條道路
眾人們走了
背負着聖人的預言。

不信命者
被視為懦夫
信命者
負着沉重的鐵鍊
自視為人類的英雄。

孤獨者嘲笑
那一瞬的溫柔
像是那親吻中的戀人
無視身邊的惡鷹
這個人遠了
黑暗是他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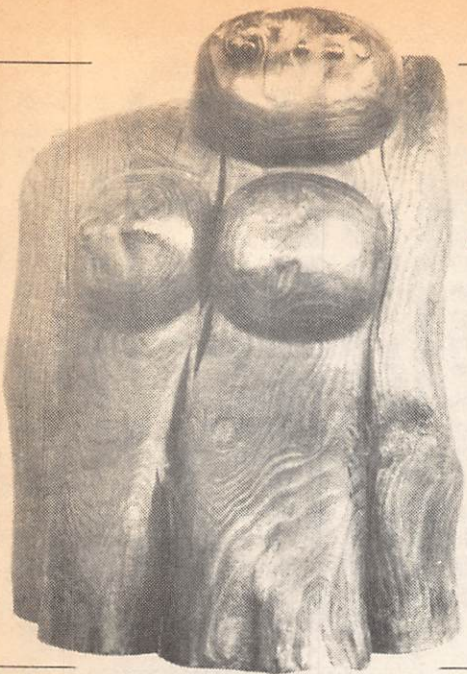
快樂者
尋找快樂中的快樂者
悲觀者
寄栖冷酷中的莊嚴
浮士德的幽魂
仍就在古堡裡游蕩

占卜者
拾起最後一支注籤
愛因斯坦
證明最後一條定理
佛洛依德
解析最後一個狂人的夢
一個人走了
無盡的海岸……

如果世界上有真理
那便是狂人的夢
不然便是
懶漢的眠床
孩子們的玩具。

夕陽讓狂人做最後的禱詞
宣告死神的誕生
這個人遠了
無限的荒漠……

● 文藝園地 ●



王克平作品。

十月二十八日王克平木彫個展在巴黎拉丁區的「G畫廊」開幕，歷時五星期，共展出作品十四件，年代跨越七九到八六的八個年頭。七九年的「偶像」、「沉默」（見「中國之春」二十六期封面）兩作品飽含政治、社會抗議，肩負啟蒙使命，充分刻畫了作者及神州億萬民衆彼時彼境的心聲；長期的壓抑、蒙蔽後，懷疑一切、反抗一切，要起而疾呼吶喊。尤其「沉默」一作，就像久蟄之蟲欲破繭出，却又不得，張力達於極點。

八二年的「牆上婦」、「仰婦」、及八三年的「頭婦」都是北京舊作，風格不變，不復吶喊期的尖銳、具象，與政治、社會風馬牛不相及，轉而非具象非抽象，似有若無的表現手法，儘量保留木的原形，順著木的自然結構，體現了木的活性。這種風格一直延續到今天，來法國三年了，並沒有太大變化。展出作品裡一半多以裸婦為主題，可見作者的偏好；但並非曲綫畢露一覽無遺的裸裡。

●報導●

照破山河萬朵

——祝語王克平首次巴黎個展

（中國民聯）柯力思

己的風格。一個吃中國飯長大、說中國話、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人，心裡、身上流的都是中國血，在表現自我時，能沒有中國嗎？中國，並不需要刻意標榜。

中共的文藝政策，不恰當地誇大了文藝的社會功能，過分抬高了御用文藝工作者的政治地位。三十多年後的反思，使持異議的作品，越受批判越受群眾歡迎。結果，不管正、反兩面，文藝都未能脫去政治和社會的干擾。當年「星星」的聲譽，來自勇氣更多於藝術本身。固然，大膽突破，突破政治的、社會的、意識型態的藩籬，始終是藝術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畢竟不是唯一的因素。今天，王克平能立足近代藝術之都，在巴黎私人藝術畫廊舉行個展，標誌著他個人藝術上的成就，標誌他的藝術已擺脫政治的侵蝕。

然而，遺憾的是，當王克平與李爽在法國國內政策大變，允許個人開畫展，乃相偕回國準備辦展覽，並在九月上和北京三家畫廊商妥一切展覽事宜後，突然接到文化部禁止舉辦的通知。中共一向以「媽媽」自居，虎毒尚且不食子，為何中共却一再地吞食她自己的兒女？中國有千年輝煌的藝術光照，有億萬的人才，為何三十多年來黯淡無光？稍有所成，竟要異地開花？此乃中華兒女的悲哀！

面對羅丹的「沉思者」、「巴爾扎克」、「地獄之門」諸作，不禁有「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驚嘆，在審美和人生的意境上都再一次地提升。近代中國實尚無可以比擬者。在此謹寄語王克平、星星畫家及無數的藝術家，早日邁進世界藝術之林，能在巴黎、紐約、東京等地的國家藝術館舉辦個展。而那一天，北京也不後人，使「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借用這個主題，王克平表達了女性的飽滿、圓潤、渾沌。其中，八四年在法國創作的「大婦」，比真人還高一個頭，寬、厚、烏、沉，沒有拋光打磨的外表，更顯樸素；給人一種原始、圖騰的聯想，象徵孕育、繁衍人類的母性。八六年的作品佔了六件，是王克平豐收的一年。「進去出來」、「作對」，在風格上轉向扁長乾瘦，並特意留下刀斧之痕；頭部只是一個空洞大張的嘴；似乎嘲諷，人，不過是吃飯拉屎的酒囊飯袋。

王克平的藝術深受漢代石刻和華北農村民間藝術的影響。他認為以中國傳統作標榜的人並不高明。他要表現的是「自我」，是樹立自

小侯不開心

(美國) 江心

這次我們隨團去大陸旅遊，團員中大部份是旅美的高級知識份子，因此，在廣州負責接待我們的「團陪」，竟是一位北京大學外文系的畢業生，他跟團友們全部用流利的英語交談。這位「團陪」長得相貌不凡，談吐文雅，而最難得的是，他絕沒有一般大陸青年和幹部那種「自大」，或因「開放」而一天到晚給海外華僑灌輸「神話」的乖謬行爲。他的談話內容中肯而合理，尤其是涉及現在中國的政治問題，他都能夠樣樣理智和客觀地去發表個人的見解。

因爲這位青年「團陪」的不凡表現，不消兩天我們團友就跟他熟熟得有如老朋友。我們好奇地問及他的出身，才知道他的祖父輩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他本人就是高幹子弟。他與年齡相若的團友互比長少，給兩位團友得出「猴年」的印象，於是大夥取笑他們爲猴子。提起猴子，我的腦海裏猛然憶起侯德建來。

自從小侯去了大陸以後，大陸及香港的報刊也偶有報導他「演出」的動態。至於他個人的生活實況，實在鮮有提及，使得許多喜歡和關心他的聽衆和朋友們，都有「隔重紗」的感

覺。我們眼前這位「團陪」，就是從北京來廣州接待美加華僑的，他常來往於京廣兩地，我測度他一定知道小侯的近況，於是衝口而出問他：

「喂，侯德建現在怎麼啦？」

「侯德建很不開心。」他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他從北京遷移到廣州居住你們都知道了吧？」

「這個報紙已經報導過了。」我回答說。「但是他爲什麼不開心呢？」

「因爲他剛回來的時候，國家把他捧得太高了。這使得一般青年人對他產生妬忌。青年人認爲他會唱歌，我們都會；他會彈吉他，我們也有很多人會彈嘛！於是很多人當著他的面諷刺說：「哼！侯德建有什麼了不起！」這使得他非常難堪。」

國家捧他的熱潮一下子就過去了。他本來就是青年人的偶像嘛，青年人不去崇拜他、抬舉他，單就幾個老頭子給他拍手掌，他還有什麼表演興致呢？其實他遭受的打擊也不少呵！可能他還有點對家庭的懷念，他的不開心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後來他因爲在北京待不住就搬家到廣州來

了。我猜想他的本意是認爲廣州比較開放，一般人的生活比較接近香港跟台灣，誰知道來了廣州更不理想，因爲廣東的青年人喜歡的是香港式的廣東流行曲。你們都聽到了，滿街響起的是亂七八糟的庸詞俚語，誰去聽他的校園歌曲呢？結果呢，他在北京和廣州兩個地方都待不住了。最後他還報導侯德建有了女朋友的事，問我們知不知道。

聽了這位高幹子弟對小侯生活近況的報導，可以印證去年我所聽到有關「侯德建不開心的消息的真實性。據與我同在一起工作的一位台灣退伍軍人家屬告知，她與小侯是四川小同鄉，而且也是相熟的朋友。去年他回大陸探親，就從她們親人口中得知「侯德建不開心」的消息。她對我說，因爲她每年都要回台灣去探親，所以到大陸去不敢找小侯，她也不敢多談其他事，祇是對小侯寄予同情和喟嘆而已。



去大陸的台灣校園歌手侯德建。

隨感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瀝青

在國內時，宿舍裏的吹牛是最令人懷念的。內容自然是包羅萬象，而其中談論最多的還是女孩子，三兩好友在一起，點上一枝煙，泡上一杯茶，談到入港時，語言之粗魯，幾不堪入耳，足令偽道者們三搖其頭。本人自封為「理論家」，善于心理分析，頭頭是道。還可從生理學角度旁徵博引，顯示出博覽群書的深厚功力。自封「理論家」頭銜，倒也並不顯得特別狂妄，在一本「性的知識」成為極搶手的熱貨環境中，本人那點知識可稱為「百科全書」了。遺憾的是，搞理論者從不做實驗也。所以本人的「童男之身」的事實，亦不會令崇拜者們減少絲毫敬意了。堅強地持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信念，加上姜老太公直鈞釣魚的經驗，有時不免有些阿Q式的不平：「媽媽的，像我這樣一個完人，居然沒有個吳媽理解我！」只好在夢中做番英雄事業了。

「直鈞釣魚」須到渭水之濱，于是有個同學在暑假裏便打起背包，獨登黃山，倒也一時傳為佳話。總之做事平庸點沒關係，說話却要「語破驚天」，故作神秘，便顯得清高。這大概是民族習慣了，所以七八年恢復高考，有這麼一種趨勢：唸書得唸物理，唸物理得唸理論物理，本人也被這股風頭捲進內地一所很有名氣、號稱專門培養科技人才的大學裏去唸物理了。到頭來拿個理論物理的 NOBEL 獎大概一點也沒戲了。來美後連專業也改成了 DOUBLE E。「理論家」這個稱號呢，也變成了「親切的回憶」！只是偶爾心中一動，才知搞「理論」化

學也能拿諾貝爾獎。有一點我知道，「生理學」獎我是絕對無望的。

廢話說了一大篇，雖不着邊際，却也是有感而發。來美後與白人相處，雖然就每個 INDIVIDUAL 而言，美國佬一般還較熱情，但作為一個有別於整個白人種族的黃種人，或多或少一種自卑感油然而升。做為阿Q的後人，中國人喜歡用「輝煌燦爛的幾千年文明」來加強信心。遺憾的是，THEY DON'T GIVE A SHIT，所以中國人熱衷于拿諾貝爾獎，或者發財，最起碼也得有個白種女子成為直鈞上的犧牲品。雖是一廂情願，但確能加強信心，還能解決生理需要。可惜的是國人很少具有如此進攻形性格的。在國內，對人性的壓抑，造成了性格的扭曲，似乎生理需要并不太強烈。一旦出國，由于國內的不實宣傳與傳說，使得在中國連夫妻長年分居都是家常便飯的「生理需要」，成了一個正式爭論的焦點，以致有人提出在中共當前的伴讀政策下，是否應去招妓解決困難？其實芝麻小何足一提，全世界都公認，賣淫乃是最古老之行業，既然中國擁有最古老的文明史，這個問題上的道德偏差至少不值一提了嘛！還有個較 ARTIFICIAL (人為) 的辦法，即是租錄影帶來看。在國內常有報導，說在美國宇航局有百分之多少多少華裔工程師，大學裏有多少多少華裔教授。可照我分析，這種統計的最高百分比應是 RENT A X-MOVIE PER CAPITA. (不想冒犯一代人，所以趕緊聲稱本人不是科學家，所有議論全是建立在猜

測之上，因此漏洞百出，論點不攻自破，請各位仁人智士千萬莫要在意)。辦法雖好，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本人是個悲觀主義者，如果心理、生理需要皆極度缺乏滿足時，唯一能做的看來只好去自殺了。可惜西方人認為自殺也是一種罪惡 (SIN)，連上帝都不要這個靈魂，不像中國人認為只需找個替身便可再得超生。其實還是這種信念更給人以光照的前景，一輩子過去了再來一次，人有時就是這麼矛盾，在這世上受苦受難，可還希望下一次會好點。就像買彩票一樣，下一次一定會中。燦爛的文明史也留下不少輝煌的風俗，像吃的藝術就是一。還有，陳冲在「大班 (TAI PAN)」裏有句台詞：中國有種很好的風俗，男人可以要很多妻子，我同意得五體投地，只是好風俗都死了，像這個一樣，只留下了一個概念。

可悲的中國人，連找尋刺激都是可悲的。記得在大學裏，抽煙、喝酒、打架三大刺激，煙，一天要抽一包；酒，要喝到吐為止（并非酒量小）；至于打架嘛，中國人天生好講義氣，結伙成幫：我們最牛×（註），如何證明，打嘛，最後一個哥兒們給開除了，其實他人挺講義氣的！還有一件趣事，一位福建同學喝紅茶，一缸茶葉半缸水，信不信由你。總之怎麼胡鬧都可以，就是不能躺到床上。一躺到床上，就聚攏了所有的悲哀，連做夢都是悲哀。而最大的惡夢是一覺醒來發現是在美國作惡夢！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一句名言：「人，都是孤獨的！」

註：牛×：大概算句北方土話，意為特別厲害；不知出典何處，反正不登大雅之堂，北京市井流氓在拔刀之前，一句「你他媽牛×」是必然有的。

逛車房拍賣小記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南星

五月的一個早晨，天竟急急地暖和起來了。正是放春假的日子，早晨醒來却不願動，躺在床上胡思亂想。

「叮……」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我知道這是小王打來的。他曾約我今天陪剛從國內來的老張去逛 GARAGE SALE (車房拍賣)，現在肯定是來催了。他有點著急，說是晚了就買不到便宜東西了。

我放下電話，匆匆起身收拾了一下，走出了臥室，只見起居室、過道和廚房一片狼藉，啤酒瓶橫七豎八，到處都是。這顯然是昨晚芳鄰奧尼爾小姐召來一班男女長夜大鬧的結果，心想洋人玩起來捨命玩，非盡興不可。

小王和老張在喬治街口早等急了，見了面，馬上就出發，邊走邊聊，向附近一個車房拍賣點走去。

我與老張不熟，只知道他原是北京某大學的講師，最近又申報提升副教授，如今放他出這趟洋差，想來是中年得意。故一言一行，都透出點清高的勁。再說，他顯然自認長了我們一輩，矜持得很。太陽已高掛在天空，熱勁上來得很快，看老張仍然是全副披掛，穿著整套的中式西服，料子看樣子委實不錯，但式樣却很不時行。

第一家車房拍賣點馬上到了，賣的東西又雜又亂，舊衣服、舊家俱、鍋碗盤杯都有。小王看完，轉身就招呼我們走，嘴裏嘰嘰咕咕地

大嚷：「也不知是開破爛店還是丟垃圾，這些破玩意也拿出來賣！」小王說的是中文，洋鬼子聽不懂，乾瞪眼。我却站住，建議老張買點碗啊盤啊什麼的，可是老張大概受小王剛才講的話的影響，直搖頭：「再看吧。」我也不再勸他，就一起離開。才走了幾步，迎面就碰上老李為首的一伙人，他們也是來逛車房拍賣的，而且有了若干收穫。老李的一個包裝得滿滿的，另一位捧著一台舊收錄機，還有一位居然扛著一架舊座地燈，招搖過市，十分顯眼。我們互打了招呼，就分手了。

老李年紀不輕了，丟下國內堂堂副教授不當，別了一大家子人，到這裏來進修學習，真是十分辛苦。但老李為人十分精明，他在這裏是房子住得最便宜，東西也買得最便宜，自然，錢也存得最多。不過，他比另一個已經回國的老李就差了一截，那位老先生從牙縫裏也能扣出個鋼蹦來，回國時裝滿了三個大箱子！

平時小王說起這些就幽冷。今天因為老張在場，就乾脆不多說了。我與老張倒看得開，邊走邊聊，老張問我，就目前我們這樣的生活費，怎樣省出幾大件來？我與他簡單地算了一筆賬，他這才恍然大悟。

「照這麼說，要弄幾大件可真不容易！」老張悻悻地感嘆道。

小王在旁邊開腔了：「何必呢？要什麼幾大件！」這回却是老張回答小王：「噢，那你

可不知道，沒幾大件回國能交代得了嗎？家裏這頭不用說了，老丈人、舅子、叔伯那個不仔細盯著，鄰居、同事……」

老張大概覺得自己說得太俗氣，就突然住了嘴。

到了另一處車房拍賣點，看樣子還比較熱鬧，仔細一看，已經有幾個中國學生在光顧，有人在挑挑揀揀，也有人在講價錢。一位仁兄蹲在地上，正在翻閱一堆舊雜誌，看著插頁裏的光屁股男女照片十分專注，不忍釋手。這時，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肩，哦，原來是老胡。

「怎麼樣？太太馬上就來了吧？」我笑著問他。

「來個鬼！」老胡憤憤然，「政策又改變了！」

「怎麼會呢？」我喃喃地應道。

「國家這是不信任咱們嗎？以為扣住老婆就沒事了？」老胡有點傷心。

我聽了以後也很茫然，只好淡淡地安慰他一番。老張雖然剛烈，但對接太太來的事却十分熱心，趕忙湊過來問個究竟，並介紹了一些他出國前國內的動向。談著談著，又把話題轉到國內鬧學潮的事上去了，老胡心情不好，開口就罵日本小鬼子。他自己在國內時，曾經和日本商人打過交道。

聊了一通，老胡招呼我們去他那裏吃魚，我們慌忙推辭，就這樣散了。沉默地走了一陣，小王忍不住發起議論來：「誰敢去他那裏吃魚，不知哪裏搞到一大堆不要錢的，都吃了半個月了，炒菜是魚，做湯也是魚！」因為大家都知道老胡這樣做的原因，所以就更是默默無語了。

下一個車房拍賣點很遠，我們就在這沉悶中繼續向前。

日本的大眾性賭博

「彈子盤遊戲」、彩票及賽馬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高今航

初來到日本的外國人，常常會注意到那些靠近車站及位於繁華地區、裝飾著鮮艷奪目的霓虹燈廣告的娛樂場所。廣告上常常用日文的片假名或拉丁字母拼寫出這種地方的名稱，使人誤以為是外來語，是從西洋傳過來的什麼遊戲。但是翻閱一下日本的字典，就會發現這個單詞是俗語，原意是「彈弓」、「手槍」或「彈子盤」，即「利用彈簧裝置向佈滿鐵釘及孔穴的盤內彈射小鋼珠，如能使鋼珠準確進入盤上特定小孔時，則滾出許多鋼珠，可以換取獎品的一種遊戲」(新明解國語辭典)。由此可知，這是一種日本人發明的、獨特的遊戲。「彈子盤」的形式花樣很多，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

一進入這種場所，就會聽到震耳欲聾的噪音。無數的鋼珠在滾動時相互碰撞的聲音，並和擴音器中不斷播放的一首在二次大戰期間就已流行的進行曲音樂聲匯合在一起，其強度至少在在一百分貝以上(汽車喇叭聲約為一百分貝)。一排排的電動彈子盤前坐滿了人——男女老少皆有，個個聚精會神，手握操縱柄，調節著鋼珠的彈射角度。一百日丹的硬幣能買到二

十五個鋼珠，但投入彈子盤之後，不到一分鐘就被機器吃光了。不甘心的人們不停地往盤裏填放鋼珠，貪婪的機器則大口大口地吞沒人們的金錢，偶而也向外吐出一些，閃亮著紅色信號燈，發出警報般的尖叫聲，使得少數幸運者心花怒放，引得兩旁的人更加急不可耐。這時服務員立刻廣播，宣佈某某號、機器中彩等等，一方面是激勵那些沒有運氣的人繼續玩下去，另一方面則是通知服務台將這台機器關閉，以免鋼珠吐出過多。服務台後面有一個總控制台，可以遙控全場的所有機器。有些台則是通過電腦自動控制的。中彩的人把贏來的鋼珠倒入服務台的自動計數器，然後憑計數器打出的計數紙帶去櫃台換獎品，也可以換錢。但要憑本店的一種特殊信物，到店外的某處特定地點去兌換。

這種「彈子盤遊戲」目前已遍及日本全國各地。據日本的電視台報導，這種行業的收入在日本所有的行業中居於首位。由於該行業收入高，向政府繳稅也多，不但不受限制，反而買賣興隆，越辦越興旺。不僅日本人，有些有錢的外國人，如韓國人也紛紛在鬧市區不惜花

重金購買場地，開設這類賭場。因此可以說，所謂的「彈子盤遊戲」已成為日本的一種大眾性賭博遊戲。而該行業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賭博業。但畢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僥倖中彩的人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玩這種遊戲的人，都成為這種吃錢機器的犧牲品。正好這種遊戲的日文發音類似於中國的「白請客」，也是恰如其意的。

此外，在日本的車站及熱鬧地區，每天都有人擺攤出售各種各樣的彩票，這些彩票都是日本政府機構或銀行正式印刷發行的。並備有宣傳小冊子，內容都是宣傳某某人如何幸運，第一次購買彩票就中了大獎等等。但最近也見到報刊上有讀者來信，反映自己從中學時代就開始購買彩票，一直買了幾十年也沒有中過一次獎。

另一項大眾性賭博就是賽馬。這種活動定期在日本各地巡迴舉行。我曾去東京的賽馬場參觀過一次。只見人人都精神緊張，不停地跑來跑去，先是跑到後場觀看賽前的溜馬狀態，然後去大廳內排隊購買馬票，再跑到前台去看賽馬，待高達幾層樓的巨型屏幕顯示出比賽結果後，又返回後場去看下一輪比賽的馬匹狀態。這樣跑來跑去，每半小時循環一次。因為每半小時就決定出一輪勝負。中彩者歡天喜地去排隊兌現，落彩者將馬票撕得粉碎拋在地上，結果搞得滿地都是廢紙垃圾，實際上都是人們用錢換來的。除了賽馬場，人們還可以在全國各地出售馬票的場所購買馬票。今年為慶祝天皇登位六十周年，還專門舉行了天皇杯賽馬，中獎者獲得了一部嶄新的豐田牌小汽車。如今，「彈子盤遊戲」、彩票和賽馬已成為日本人社會生活的一項內容，並為政府所承認的大眾性賭博。

人治、牛治及其他

從一件經濟糾紛案談起

(中國香港留學生·日本)

黎音

話說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清晨，寒冷的北京出了一件奇聞：在國家司法部門前，站着十五頭毛色一樣、個頭相同，一律身披紅緞被面，和錦旗的黃牛。那錦旗上繡着：「爲民做主」、「伸張正義」等字樣；牛群旁放着一個裝滿訴訟材料和給胡耀邦信的黑提包。這群牛「哞哞」直叫，驚動了滿街行人，怎麼？老牛也來上訪告狀了？！

要說清這群黃牛的來歷，首先要從宋坪村講起。豫西小山村——宋坪，本是個靠吃國家返銷糧過活的窮地方。群眾省吃儉用集資辦起個煉焦廠。前幾年，焦廠生產形勢不錯，經濟效益逐年提高，村民生活有所改善。七九年下半年，與同一地區的舞陽縣化肥廠建立了業務上的聯繫。但由於舞陽縣化肥廠因經營不利，連年虧損，到八二年末，已累計拖欠宋坪焦廠十五萬餘元人民幣貨款。

十五萬元貨款收不回來，傷了焦廠的元氣，焦廠只有被迫停產。全村近千口人的衣食來源眼看無着落，宋坪多次派人催要，然而却總也討不回這筆欠款。

八三年，舞陽縣委啓用王××任化肥廠的廠長。王廠長就職後，生產確實有了起色。爲此，報紙曾先後兩次宣揚這位「企業改革家」的事跡。王廠長於是被「選」爲縣人大代表、縣政協副主席、縣科協主席。怎奈王廠長頭腦

發熱，急功近利，經營上出了問題，使化肥廠又陷窘境。氣急敗壞的王廠長，面對宋坪的討債者竟以「現已搞承包」爲藉口，拒付前任債務，企圖賴賬。

老實厚道的宋坪村民，爲了生計，只有請全村唯一見過「大世面」的復員兵李占軍，代表全村做討債人。

李占軍先找舞陽縣化肥廠，一位副廠長搪塞說：「啥時有錢啥時還！」

李占軍又找舞陽縣人民政府，一位副縣長沉下臉說：「要賬要到縣政府來了？！我不欠你的賬，我不管！」

縣官不予民做主，逼得這些祖輩種田的庄稼漢只有告狀打官司。他們在城裏請了兩名律師，交一千元代理費，正式向舞陽縣人民法院起訴。舞陽縣法院又預收三千七百元訴訟費，決定受理此案。

法院受理此案後，主管辦案的一位副院長一切看縣委、縣政府領導的眼色行事。縣領導的意見就是縣法院辦案的原則。副縣長說：「化肥廠王廠長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他說他不管以前的債務，我也沒辦法。他是省裏企業改革的典型，你們要謹慎，弄不好他給你捅到省裏去。」

被告法人代表王廠長更是有恃無恐。他說

：「不告，我有了錢可能還給一點，告了，一分錢也不給，我才不去爬堂台呢！」就連在法院詢問筆錄上簽個字他都不肯。舞陽縣法院在該案立案後一年零七個月時間裏，沒敢向王廠長發過一次傳票，而一直由縣政府的領導出面做王廠長的工作，結果都被王廠長頂了回去。

「協商」無效，面對這位「企業改革家」法院也是束手無策，最後法院副院長只有向李占軍表示：案子難辦，請宋坪焦廠撤訴。

李占軍先後又去了許昌地區中級法院、河南省高級法院反映情況。省、地兩院也曾致函舞陽縣法院，但不過都是不痛不癢的官樣文章，舞陽縣長以「矛盾不能上交」爲名，將此案無限期地再拖下去。

年關在即，宋坪村的群眾在貧困中掙扎，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李占軍給縣法院寫了最後一封催辦信，但又如石沉大海，無人理睬。

李占軍對法院、對人民政府都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他看透了一群老實得像綿羊似的山村百姓，在當政者的眼中真是輕如鴻毛。全村近千人的饑飽冷暖問題不如此一塊虛偽的「企業改革家」的招牌重要。在「人治」的圍牆中，法律不過是廢紙；司法機關也只是虛設的牌位。既然國家不講「法治」而重「人治」，那麼，解決問題也只有從其它途徑入手。於是一個破

釜沉舟的「牛治」計劃便在他心中形成。

李占軍用變賣自己財產的錢，在牛行街買了二十頭毛色一致、個頭相同的黃牛，同時又配上二十條紅緞被面，訂制十五面錦旗。錦旗分別繡上「爲民做主」、「伸張正義、爲民做主」、「動金筆、抒民情」等字樣。隨後，他將十五頭牛運到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又將五頭身披錦旗的牛分別送到省人大、省政府、省高院、省司法廳和記者站。他將自家的門貼了封條，封條上寫十六個大字：「傾家蕩產，告狀通天，破釜沉舟，拼命決戰！」

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深夜，李占軍由北京西直門火車站用卡車將十五頭牛運到司法部門前，並將上訪告狀材料放在牛群邊。第二天黎明，新年伊始，便出現了這黃牛告狀的轟動場面。

事情一轟動，就傳進了中央領導人的耳朵。當天王兆國就指示河南省委，要求迅速查處。錦旗和告狀材料以及給胡耀邦的信上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元月六日中紀委介紹李占軍到最高人民法院談情況，立即以《情況反映》向中央有關部門做了專題彙報。接着，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都做了批示並寫信給河南高院，就此案的處理提了意見。

以後，問題的解決勢如破竹。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做了批示；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許昌地委連續召開緊急會議；省地委、省紀檢會、省高院、省委、省政府信訪局聯合組成調查組，迅速奔赴發案地，查明情況，及時進行妥善處理。拖了一年零七個月，阻力重重無法解決的一起案件，一群黃牛進京，十天就搞得水落石出，可謂中國現代司法史上的又一傳奇。

案子雖然解決了，但潛在的隱患是無窮的

，留給人們的思考是無盡的。

這樣一起普通的經濟案件，通過正常的法律程序硬是不能解決，一定要拉出一群黃牛進京，去轟動那些達官權貴，引起大人物講話，使上層的大「人治」，壓倒下層的小「人治」，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這真是對「法制建設形勢大好」的莫大諷刺。

近年來，我國確實在法制建設和普及法制教育方面下了功夫。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人治」傳統沒有廢除，按長官意志辦事的弊病未能根治，即使法律多如牛毛，也不過是一紙空文。而要真正徹底廢除「人治」和長官意志，在今天的中國實在是很難。請打開中共或國家的官方文件，只強調「法制」而迴避「法治」，這是有意识地揚棄。因為「法治」與「人治」是根本對立的。倘若真正實行了「法治」，領導者的特權就受到制約，長官意志就不能獨尊，家長作風就無法通行，必然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連共產黨也要置於法律之下，這對於一個專制政體的統治集團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現在，我國到處可見這樣的怪事：一面在宣揚加強法制建設，大講司法獨立，一面是解決問題必須有實權人物批示、點頭；審理案件看着領導的臉色望風駛舵。甚至還出現了縣長罷免縣法院院長，律師因替被告人辯護而屢遭迫害的怪事。

據可靠人士反映，每年中共中央辦公廳所處理的案件，要比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多；胡耀邦每年親自過問和處理的案件也有千餘起。某些黨政高級領導人爲此而贏得了「青天」、「開明派」的美譽。然而，司法機關與黨的關係，法律與領導人的關係，却使人愈來愈糊塗。

筆者曾誤認爲：長官意志與法律相結合大

概即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可經仔細分析，認爲並非如此。實際今天的中國仍是一個封建色彩極濃的「人治」社會，長官意志高於一切，法律只是裝璜。有詩爲證：法律一大堆，公文滿天飛，領導不拍板，你推我也推。如要解決這個痼疾，單靠一般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是難以奏效的，非有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不可，當然這又是很難的事情。

黎民百姓有冤要申，有話要講，有狀要告，但又難以衝破「人治」的藩籬，情急之下，不得不借助於其他的外力，演出許多令人難料的活劇，這大概也是現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產物罷。

●文藝園地●

給——爆發戶

半似果敢 半似遲疑
半似天才 半似草包
半似風流 半似窮酸
半似博識 半似白痴！

世態炎涼

半似僞君 但道貌岸然
半似潑婦 但多情善感
半似政客 但狗屁不通
半似小人 但不乏前途遠大！

(澳洲) 陳紓塵

九九艷陽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李 豐

「九九艷陽天」是在中國大陸流傳最廣的情歌之一，歌詞率直大膽，曲調優美清新，雖一度被中共當局指為「黃色歌曲」而禁唱，却仍然不脛而走，受到普遍歡迎。

不過，我此刻所講的，却是另外一個「九九艷陽天」——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那天下午，我因辦理一點私事，早早地離開了辦公室（我是某重要單位的秘書），而且心情不佳。騎車行至北京市動物園，巧遇表弟，便站在路邊閒聊；忽然看見有人攀上天文館頂樓，垂下一面中共黨旗，並播放電台廣播：「顯然又是一位要人死了，這一回是誰呢？我懶洋洋地詢問一位行人（我們因談話沒有聽到廣播的起始部分），他漠然的回答使我和表弟幾乎驚喜地笑出聲來：「毛主席……」

萬歲！毛澤東下地獄的時辰終於來到了！仰視天空，晚秋的太陽如此艷麗，它絲毫不因毛澤東之死而稍減光芒。在大陸，中共的強化宣傳，硬是將毛澤東與太陽這樣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物件合為一體，竟然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指出太陽本身也有黑子而罹禍。這樣一個殘暴的、好以秦皇自比的獨夫民賊，終於「見馬克思」去了，怎能不令人歡喜若狂？！

廣場上行人越聚越多，靜靜地收聽那通篇皆是陳詞濫調的所謂「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限於高壓環境，自然沒有人公開拍手叫好，就連我和表弟，儘管心裏樂開了花，臉上却只能顯得若無其事的樣子。衆人亦如此，沒有

眼淚，沒有悲傷，當「人民的大救星」的死訊公佈之後，人民竟如此冷淡地沉默以對……毛澤東若死後有知，也會覺得尷尬吧！

「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要求人民繼承毛澤東的遺志，努力完成種種老毛未竟的事情（「繼續革命」亦是其中之一）；然而這僅是

中共中央一小撮人自說自話，一廂情願而已。歷經十年風雨，毛澤東鬼臉上的最後一抹油彩被洗刷殆淨，老百姓都明白「老賊不死，國難未已」的道理，誰個還願隨毛賊的鬼魂走路？！

聽畢廣播，我和表弟喜孜孜地去西郊商場照相部合影留念。照相部也在播放哀樂，但實在和那種潛在的輕鬆愉快的氣氛不相稱。人人都我行我素，彷彿不是中共中央主席死了，而只不過是某一個不相干的清潔夫或者掏糞工死了似的（嚴格地說，這種提法對於清潔夫或掏糞工是個侮辱，因這二者雖社會地位卑微，却有益於他人；較之毛澤東這身居高位的屠夫，強過千倍萬倍！）。攝影師在試鏡頭時，亦循常例囑咐道：「笑一笑，要笑一笑……」

當然要笑！——事後看照片，這是發自真衷的甜美笑容。走出照相部，只見一位大約三十餘歲的、瘦弱的乞丐盤腿而坐，黝黑的兩手上托著不少肉包子，他癡笑著告訴我們：「……那邊飯堂的人都走光了，嘿，快去撿包子……白吃白喝……」

我和表弟放聲大笑！

回到本單位，我驚奇地發現那些領導幹部們除了顯得有些緊張之外，和平常亦無不同。他們吩咐將書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專欄的黑板擦乾淨，改寫悼念毛澤東的標語，並立即批條子以使用公款購買黑紗、做白花用的紙張等等。轉眼之間，氣派十足的靈堂便佈置完畢，人們進進出出，川流不息……同樣，儘管鞠躬敬拜如儀，卻沒有與這種隆重的悼念儀式相稱的悲痛表情。是的，人事保衛幹部虎視眈眈的目光，使人不敢言笑，却無法強使人哭泣。

此後一週是治喪期，清規戒律多多：不准飲白酒，不准放音樂（「國際歌」、「東方紅」例外），不准放電影……其實，毛澤東之死的消息傳出，不飲酒人也醉，不奏樂人也歡，不放電影誰心裏還沒有一部活電影？

歲月如流水，轉眼已十年。毛澤東「當世則榮，沒則已焉」（司馬遷語），如今真正變成「不齒於人民的狗屎堆」（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喜歡咒罵政敵的惡言，殊不知扣在自己頭上頂合適）。毛澤東著作已是最不受歡迎的書籍，毛澤東停屍堂（北京人喜歡喊它為「毛房」即與「茅房」同音）成為北京市最醜惡的一景。

十年去矣！毛澤東雖亡，鄧小平還在！「四個堅持」不除，改革又豈能觸動專制制度？「九九艷陽天」是一代獨夫的死日，然整個專制制度的死日又在何時？！

坦率地說，我對此持悲觀態度。我曾對友人說過這樣一個含淚的笑話：「也許，我的孫子的同學的內弟的鄰居的連襟的表舅的同事的女婿的外甥的筆友的堂弟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同鄉的啓蒙教師能夠看到中國實現了第五個現代化……遺憾的是，您知道我還沒有結婚呢。」

逝者如斯

(香港) 蕭明

沉在心曠神怡的慵懶倦意裏。

「唱出更美更好的歌。」

湯文達自言自語道，又苦笑了一下。

昨天，當他的妻子程菁把市委宣傳部的接待通知交給他時，他便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今天他會遇到怎樣的接待。近來，一陣陣平反、糾偏的熱浪，激起他久已沉寂的幻想，雖然事實上他自知早已過了用幻想來支撐信心的那種年齡了。

「會不會是你的問題有希望解決了？」

當時程菁問他，他察覺到程菁由於緊張，連手都有點發顫。但是他却不置可否地頭了點頭，裝出平靜的樣子。

「你有什麼困難？」剛才，李部長問他：「我們如有可能總會給你解決的。」

困難，有什麼困難呢？該過的，不該過的，都已過來了。不，他自己不會有什麼要求的。

。祇是他的兒子湯奇，今年二十九歲，過去受他的牽連，升學、工作都碰到了障礙。現在，既然這樣，既然自己的問題澄清了，政府能否給湯奇安排一份工作，無論什麼工作都行。三十來歲的人了，還在家裏閒著，跟一些朋友玩紙牌、飲酒，爛醉如泥，一回到家就摔東西，發脾氣。

湯文達喃喃地說著，在李部長的臉上，看到了不甚了然但耐心的表情。

「慢慢地解決吧。」李部長說，哈哈地笑起來，在辦公室裏跨著大步。然後，他把一隻手攔到湯文達的肩上，那隻手肥嫩嫩地，每個指關節都鼓起一個小肉團。「我們還有很多困難，要慢慢地來，總之，要向前看，看到國家的前途，暫時的困難……你現在在哪兒工作？噢，對了，在水泥預製場。好的，你的工作一有安排，我們就會通知你的單位。」

就這樣，他從市委大院走出來。

市委大院門口，植著兩株參天的柏樹。柏樹年歲久遠，被修剪成一把撐開的雨傘，陽光把它的影子投射到紅磚砌成的圍牆上。圍牆高聳，把個市委大院襯托得格外森嚴、肅穆。湯文達在那堵圍牆底下，站了好一會兒，一種處身在圍牆裏邊常有被壓抑的感覺鬆下來之後，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早在三十年前，他就認識李部長了。李部長那時還祇是小李，是宣傳部的一個小幹事。他年輕、稚氣、愛好文藝，有時也學著寫些詩、快板之類的東西，常常拿來請湯文達「指正」。而現在，他却養尊處優，大腹便便，活脫兒像一個老幹部了。

「三十年過去了。」湯文達想道。

抗戰勝利後，他就經常在全國性的有影響的文藝雜誌上發表一些當時評論家認為晦澀但

「湯文達同志，我們是老相識，所以，也就不必兜圈子了。坦白地說吧，由於我們過去在工作上的失誤，和歷史上「左」的干擾，你受了不少委屈。前一段時間，我們就著手重新審查你的問題。當然，工作量很大，要化很多時間——對同志負責嘛！現在，我就代表組織向你鄭重宣佈，過去的一切不實之詞，統統推倒，恢復你的名譽和工作。並希望你向前看，人總得向前看嘛。你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詩人，今後應當為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唱出更美更好的歌來。」

湯文達從市委大院走出來，市委宣傳部李部長的話，還在他的腦子裏縈迴，久久地不能消散，他的臉上不由得浮起一絲淡淡的苦笑。

已經是初春，市委大院裏充盈春天盎然的生意，梧桐樹長出新枝，青綠的嫩芽爆出，透著一陣陣清馨濃郁的氣味。整個市委大院，浸

不失激情的詩作了。

那時，他還未到三十歲，剛剛結婚不久。頭髮長得蓋過耳朵，不修邊幅，有時穿油膩的長衫，有時著磨光袖的西裝，總之，一副落拓不羈的樣子。當時，和他同時成名的還有一位小說家，叫莫辛。莫辛個子矮小，肥胖，善於言談，穿著入時，永遠給人光鮮、乾淨的印象。一九四九年後，莫辛仍然不斷發表小說、散文，時常出席省和全國的作家會議。而湯文達却在一九五五年就被捲進「胡風反黨集團」，因為一個胡風份子，曾經吹捧他，說是在他的詩裏發現了「主觀戰鬥精神」。

「我現在還能寫詩？」他再度問自己。避開耀眼的陽光，他轉進一條小巷。一面踽踽地走著，一面儘力搜索過去了的麻木的記憶。

湯文達住在街道水泥預製場後面一間簡陋的木房子裏。

他的妻子程菁正在木房子門口的水泥板上搓衣服。一見湯文達走過來，她趕緊放下手裏的衣服，甩著一雙滿是肥皂沫的手。

「怎麼了？」她問道。「是不是平反？是嗎？都講了些什麼？沒有？怎麼會沒有？」

程菁一面連連問著，一面跟著湯文達走進房子。湯文達脫下那件掉了色的煙灰色的中山裝。

「提了湯奇的事沒有？」程菁問道。

「提了。」

「他們怎麼說？」

「慢慢地解決吧。」

「慢慢地解決」程菁重覆著。「那些老幹部一下子什麼都解決了，兒子、女兒一個個都進了國營工廠，有的還進了舞蹈學校……」

「我們怎麼相同。」湯文達說。

「是不相同。」程菁說，不由得笑了。「不過，這已經蠻不錯了，你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昨晚，我一夜都沒合眼。」

這時，湯文達已經躺到床上，閉上眼睛，用手摩擦著臀部那塊乾瘦的肌肉。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心裏想。居然在一夜之間，憑著一種他自己不能把握的力量，一下子改變了他的境遇。

那麼，他以後再也用不著整天推著獨輪翻斗車，跌跌撞撞地衝上水泥拌和機前的斜跳板了。近幾個月來，他竟然在這條五十公尺不到的路程中，停下來兩次。每次，他都是咬著牙，忍住疼痛，把小車推上水泥拌和機前的斜跳板。近來，他越來越覺得坐骨神經痛發作的週期頻密了。即使他極為小心，仍然會因一個躺臥的姿勢，或推小車時的不慎，而使他的臀部痛苦不堪，他的腿就像抽了筋似的，動彈不得，舉止艱難。

那麼，從此以後他也不用推小車了，再也不用縝密地考慮，在這條五十公尺不到的路程中，停兩次或是停三次了。

湯文達睜開眼睛，看見在釘有木板條的窗戶外邊，一堵爬滿青苔的石牆上，幾朵紫色夾白的草花，從石頭的縫隙間擠出來。他的心裏突然浮上一種悲哀的失落感覺，他想起了在青海勞改時見到的那種叫不出名字的小花來。

湯文達第一次看到那些小花，便驚奇於它們怎樣頑強地從高坡下的斜地裏，水溝間的側壁上，大路旁的凹坑裏，茁壯地、執拗地長出來，生機勃勃。細小的莖，托著淺黃色、白色的、粉紅色的花瓣，在高原上沒遮攔的疾風裏，顛來倒去，依然故我。

當時，他曾經不住地尋思，那些不知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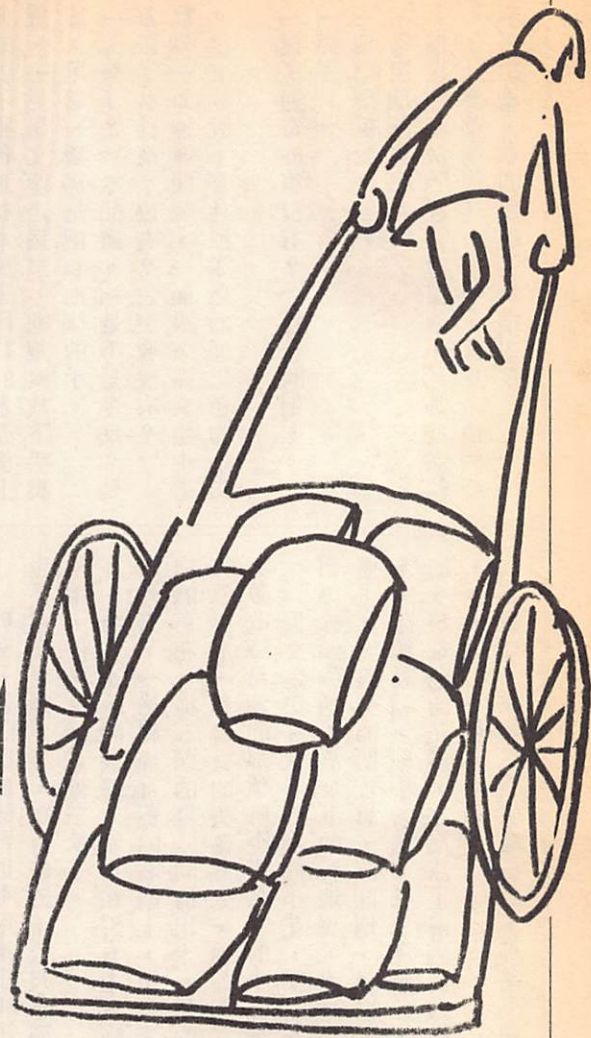
小花，所有美學價值在哪兒呢？是否祇是表示，在一個如此荒蕪，人跡罕到的高原上，生命依然在為人們所注重的形式下，拼命地表現他們自己，僅僅如此而已嗎？

但他自己，却並非那些小花。在那些日子裏，他一直想弄明白，把他作為專政的對象，拋在一個瞬息之間天昏地暗、飛砂走石的荒原上，憑他那雙無力的手，用鐵錐拼命挖掘沉睡了千萬年的泥土，是否祇是一種需要。他極力使自己相信，他是一個必要的犧牲者，是一個社會跨開它的巨人般的步伐時，粗心地，不經意地踩得粉碎的渺小的動物而已。正如我們時常把螞蟻踩在腳底下，而渾然不覺一樣。

現在，居然一切都顛倒過來了，他竟然沒有罪，錯的全不是他，他又可以晉身文壇，唱出「更美更好的歌」。那麼幾十年來，他付出的代價呢？他執拗地想道。這就像一個小偷把你剝了個精光，然後丟給你一條遮羞的褲衩，說：你已經得到補償。竟是如此這般，他感到有一種被愚弄的痛苦。三十年來，他做了什麼？他嘗試了什麼？不，他可以做些什麼？或者他本來應該做些什麼？他在這些概念裏糾纏了好一會兒。

湯文達感到一陣燥熱，他痛苦地想從那種沉重得像鉛塊一般的意識中掙脫出來。他看到自己處身在一個現實的世界裏。頭頂是角鐵的人字架，上面擱著一條條木板條，再上面是油毛毡，側壁上也釘滿了油毛毡。那些油毛毡，當陽光透過木製的未經油漆的窗戶，射進房間裏時，就像退潮後的海灘，在光線裏跳躍著銀灰色的斑點。

他的眼睛慢慢地移到八仙桌上，看到在陶瓷的茶壺旁邊，放著二個用塑膠袋包裝起來的電器開關之類的東西。他一時不明白，那是



什麼東西，但突然明白過來，他喊道：

「程菁！程菁！」

程菁進來，手裏仍然沾著肥皂泡沫。

「這些是誰拿來的？」湯文達問道。

「我忘了告訴你，」程菁說。「姓林的來過，就是那個腳有點跛的人。他說這兩樣東西，每個月都有十幾萬元的業務，他說他們那邊有四個人，加上湯奇不就有五個人了嗎？不知道那家廠會不會接受。」

「他們幾個人？」湯文達問道。

「四個。」

「太多了。」

「我也這麼說，」程菁說。「可是他說，這些都是長期的業務。」

湯文達叫程菁把二個塑膠袋拿過來給他。

他一面看著塑膠袋上面的英文 FUSE BRB AK，一面想起前不久，他曾經帶著一隻產品，到一間他姪子介紹的集體工廠去，一廂情願地企望人家接受那隻產品。

那次，他坐在集體工廠的辦公室，當著書記、廠長、和技術人員的面，戰戰兢兢地介紹那隻產品。

「這隻產品叫交流穩壓器，是日本的產品。」湯文達說：「交流穩壓器，主要用於電視機配套，是新科技，國內還沒有一個單位生產過。」

沒有人出聲，書記和廠長都冷淡地輪流傳看著那隻產品，似乎他們關心的都不是產品本身。

「當然了，」一會兒，廠長說，「新產品總是好的。不過，銷路在哪裏呢？哪個單位包銷？需要多少投資？有沒有試製費？」

事實上，湯文達壓根兒就沒有了解過這些問題，他當時真是窮得要命。他真想告訴他們，關於這隻產品，他並沒有比他們更明白多少，他祇不過想給他的兒子湯奇尋找一份工作而已。

「這隻產品，你們想帶幾個人進廠？」書

記問。

「五個人。」湯文達答道。一邊在心裏數，這裏面包括老林，老林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還有省機電公司的什麼親戚，最後是湯奇，不錯，一共五個人。

「不行，」書記斷然說。「不行，人太多了。我們廠裏已經有一百二十個人在等著產品，我們需要的是產品，而不是人，我們不想再揹包袱了。當然，如果產品對頭，有前途，多一兩個人也未嘗不可。但是人太多了，我們不會考慮。」

現在，湯文達躺在床上，把塑膠袋放在心口上，困惑地、惘然地瞧著板架上的一本日曆本。畫面上是肇慶的七星岩，被煤煙熏得黑乎乎的，以致那本日曆本看上去竟像是數年前的老皇曆了。但確乎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終於結束這一切了。是的，他要開始另一種生活，但那是多麼陌生。他試圖重溫年輕的時候，他的輝煌的時代，他的激情，他的執著，他却看到自己被掛著牌子，戴著紙做的高帽，穿著裏朝外翻過來的羊皮襖，光著腳板，踏著滾燙的被太陽烤熱了的柏油路面……

湯文達從青海回來後，由於居民委員會主任的仁慈，他被安排在街道辦的水泥預製場做小工。整天推著獨輪翻斗車，日復一日地把沙子、石子、水泥推上水泥拌和機前的跳板，倒進咕咕作響的水泥拌和機裏。然後又推著裝滿水泥漿的吊桶，澆注多孔板、門、窗。一到晚上，他一面聽著程菁踩著縫紉機，發出不均勻的軋軋的聲音，縫補大堆由服務站拿回來的舊衣服；一面讀著當天的報紙，極力想弄明白，他所不明白的一切。

一九六六年，當「破四舊」在小城像瘟疫

般地蔓延開的時候，湯文達就朦朧朧地感覺到，他必定要經受一次衝擊了。這種最初的預感，是從他兒子湯奇身上覺察出來的。

那時候，湯奇已經是第五中學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了。那天晚上，正當吃晚飯的時候。起先，湯奇低著頭，一個勁地扒飯，然後，突然盯著看湯文達，那雙清澈如水的稚氣的眼睛，表露出來的嚴肅使湯文達吃驚。

「你以前幹過什麼？」湯奇問道，沒有叫他爸爸。「你以前幹過什麼壞事？」

湯文達不知道怎樣回答，他不知道怎樣解釋自己的那些罪行。

「你勞改了幾年？」

「七年。」

「你都交代了嗎？」

是呀，他都交代了嗎？他寫過數不清的交代材料，認罪書，思想小結，這些加起來恐怕足足有一尺厚。這些材料都是以無比犀利的筆觸來剖析自己，這還不夠嗎？難道他還要在兒子面前，表明自己是一個罪惡累累，死有餘辜的革命的敵人，現政權死心塌地的背叛者。

「阿奇，」湯文達說，「你還小。」

「我還小嗎？」湯奇咄咄逼人的反問。

「你還小，你不應知道太多的事。」

「我要知道你爲什麼勞改七年。」

「我沒有做過壞事。」

「你沒有？你每個星期都要到派出所報到一次。國慶節、五一節、元旦都不讓你出門口。」

「阿奇！」程菁喊道，含著眼淚，狠命地捶打著湯奇。湯文達困惑地從八仙桌旁站起來，而他的兒子仍然用一雙絕不妥協的眼光盯著他。

「我沒有做壞事。」湯文達再一次說。

「那麼你爲什麼勞改？」湯奇執拗地問道。

「我不明白。」

「是反革命。」

「是的。」

湯文達回答，透了一口氣。這不是很容易嗎？他終於避開了好多逼問。如果他早知道，這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他何必躲躲閃閃呢？長久以來，他就不必爲怎樣向湯奇解釋自己的一切而困擾了。

但是，湯奇仍然餘興未盡，張大眼睛。

「你要繼續交代你的罪行。」湯奇說，表示出一種大度的政治家的風範。「如果你老老實實了，群眾就會了解你了。」

三天之後，他被戴上紙做的尖尖的高帽子，帽子上面寫著「老牌反革命份子湯文達」。他的脖子下邊給吊上一個木牌子，木牌子下邊又吊上二個生鐵的大秤錘。木牌子上面寫著「反革命份子湯文達，繼續和人民爲敵，死路一條」。他們又給他穿上一件裏朝外翻過來的羊皮襖，最後被簇擁著推到大街上。時當酷熱的溽暑，從白堊色的牆壁，灰黑色的人字形的青瓦屋頂，被晒燙了的木板房子的窗台，蒸發出來悶人的熱氣。團團圍著的人群裏，互相傳遞著帶著酸味的汗臭。湯文達赤著腳，踏在滾燙的柏油路面，他莫名其妙，一點都不明白，現在在做些什麼，接下去會做些什麼。柏油路面被太陽晒燙之後，傳上他的腳踝、腿、肚子。令人難耐的灼燒，使他一下子想起小時候，他常常站在燒餅爐旁邊，看著賣燒餅的老頭，用剛剛掏過木炭的手，蘸著水，把做好的麵團一個個貼在燒餅爐的內壁，而他却在一旁領受那種帶著餅香的撲面的熱氣，面孔被熱火蒸得紅撲撲的。而現在，羊皮襖憋得他滿身熱汗溼溼

，汗水順著他的額面淌下來。這種灼熱來自哪兒呢？不，絕不是來自燒餅爐，而來自他的赤裸的腳底板。他的腳板變得痛楚難堪，他跳躍著，就像馬戲班中的小丑一樣。不過，這算了什麼，他告訴自己。十多年前，他也是這樣的，在西北高原的毒日頭曝曬下，他匍伏在地面上做磚坯。一天的指標是六百塊磚坯，他先用水把黃土糊成泥巴，然後跪在火一般發燒的地面，把攪拌好的泥巴，扣上一個個木框子，用木尺刮平，然後送到一個水泥坦上，把磚坯脫出來。那時他是用膝蓋貼近地面的，他能頂得了，他經受得住，但那時他畢竟比現在年輕得多呢。

他聽到一陣陣喊叫的聲浪在他的耳際嗡嗡。那個聲響，像一個個巨浪，一個過去了，一個又過來。他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在喊叫，是湯奇，不錯，是他。湯文達想轉過頭尋找那個聲音，但是他不能，他感到昏暈，眼前人影朦朧，不久幻成黑糊糊的一團。喊叫的聲浪變得細弱，頭上吊著的木牌子沉甸甸地垂下來，錐心的滾燙從他的腳底板，升到胸口，升到腦門。他掙扎著，然而，他却緩慢地跪下去，脖頸擱到木牌子上。他感到有人在推他，咒罵的聲音響起來，但是，他什麼也聽不到了，什麼也看不見了。

程菁洗完衣服走進木房子，看到湯文達仍然躺在床上，閉著眼睛。他走近床頭，問道：「你吃過早飯了嗎？」

「還沒有。」湯文達回答，睜開眼睛，又閉上。

「你怎麼不在外面小攤子上吃一點？」

「我不想吃。」

「我給你燒一點泡飯吧！」

「不要，我現在還不想吃。」

「你不舒服？」

「沒有。」

「你有一點心煩？爲什麼？他們還沒有分配工作？」

「還沒有。」

「不要心急，慢慢來，幾十年我們都過來了。我看到好多人，都是慢慢地解決的，工作、房子什麼都解決了，湯奇的工作也會解決的。現在不是很好了嗎？你歲數大了，再也不用幹體力活了。」

「不用了。」

「可不是嗎？真該慶賀一下呢？」

「慶賀一下，」湯文達說，從床上起身。

「是的，是的，阿奇呢？出去了。也讓他高興一下，他的父親站起來了，挺直腰幹走路了，再也不用到派出所報到了。並且還可以寫詩：……」

他停住了，沒有說下去，微微地感覺到自己的情緒有那麼一點偏激。他會適應新的生活嗎？他問自己。小時候，在他家附近的麵坊裏，他時常看到一頭牛被蒙上眼睛，脊背上套著木枷，週而復始地繞著磨盤打轉。那時候他就常常想，一旦把木枷從牠的脊背上鬆開，把牛皮做的遮蔽物從牠的眼前移開，這頭牛會習慣於搖晃著肚子，走回牛棚嗎？或者牠會仍然低著頭，蹣跚地繞著磨盤兜圈子？可惜他的印象已不太清楚了。那麼，現在，他在脫去了身上的枷鎖之後，會很明智地走到，他早就應該去的，年輕人爲之傾倒的詩的聖殿嗎？而他心裏所揹負的更爲沉重的枷鎖又怎樣呢？輕輕地放下，然後來謳歌新的時代，就像三十年前謳歌新中國的誕生一樣？

「我還能寫詩嗎？」湯文達問程菁。

「你當然會。」

「真正的詩？」

「爲什麼不呢？」

「我要唱一些讚美詩？就像小孩子在課堂上唱的『朵朵葵花向太陽』？」

「老湯！」程菁喊道，恐懼地看著他。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直不敢想到詩。幾十年來，事實上，我除了寫交代材料，思想小結，認罪書之外，也就是寫幾張生病時用的請假條而已。我甚至不敢在看過的報紙上劃一個記號，說不定這個記號會出現在一個不該出現的地方，絕不是你自己所能解釋得了的。何況寫詩呢，詩以言志，容不得半點虛假，就像在白襯衫上給你蘸上墨汁……多麼醜惡。」

湯文達看到程菁臉上露出惘然的憂患的神色，他不再說下去，他以爲自己使她吃驚了。他在凹凸不平的磚地上來回走著，不知道怎樣去安慰她，一面打哈哈地笑著，企望她恢復愉快的情緒，一直到莫辛這時候大大咧咧地闖進來。

莫辛依然風度翩翩，步履敏捷，保養得很好。他面色紅潤，但略嫌肥胖，前額光禿，腦後留著少許頭髮，也是梳得光光的。

「老湯，你這地方真叫我好找呀，」莫辛一進門就喊起來。「今天可要在你這兒喝上幾盅黃酒了。程菁，你真是豐潤不減當年呵。」

莫辛戲弄地說，對著程菁。雖然在今天之前，程菁曾在街上多次見到他，他都避開了。

「老莫，你還是這樣。」程菁說。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哎呀，我的詩人，」莫辛轉向湯文達。「你這個房子可糟透了，你打個報告吧，文化處出面同房管局商量一下，搞一間房子，你這房子真不像話。」

「坐吧。」湯文達說，推過一把竹椅子。

「是的，我們可得好好談一談。」

「你抽煙嗎？」湯文達問道。

「不，我早不抽煙了。」

「你也怕尼古丁？」

「怕老婆。」

莫辛咯咯地笑著，拿眼睛乜斜著程菁，做出惡作劇的樣子。

「我從來不管他。」程菁說。

「爲什麼不管，」莫辛說，「我老婆說，抽一根煙，人的壽命就會減短五分鐘，不知道她從哪裏聽來的，她說，這可是科學。」

「抽煙是不怎麼好，」程菁說，瞧著湯文達。「不過，老湯沒有什麼嗜好，有時，我看到他悶，抽幾口也好。」

「真是寬宏大量。」莫辛說，轉向湯文達。「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麼？」

「推小車、運水泥、運砂子、抬水泥板。」

「

「你體驗了不少生活，寫詩嗎？」

「沒有。」

「爲什麼沒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我在改造。」

「是啊，幾十年不停地反覆，不斷地變來變去，你受過很多苦。我也不強呀，文化大革命，我被遊街、批鬥、蹲牛棚。」

「你現在在哪兒？」湯文達問道。

「文化處。」

「處長？」

「副處長。」

「你可是扶搖直上呀。」

「哪裏，哪裏，程……噢！程菁，有沒有加飯酒，一定要加飯酒，再來一碟豬腳爪，一

碟油花生。夠了，我們痛痛快快地喝上幾盅吧。」

「我去弄。」程菁慌忙說。

一會兒，在八仙桌上，擺上了豬腳爪、油花生、醃蘿蔔、燒鵝，和二個酒杯。湯文達和莫辛在八仙桌跟前坐下來。

「老湯，」莫辛一面給自己斟酒，一面說：「當年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你不會喝酒，可是臉紅紅的，我呢，喝了不少，還是面不改色。有一次我們在哪兒？大概是一九四七年。」

湯文達愕然地望著莫辛，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次。

「喝夠了酒，我們一起唱起歌，嚇得那個老板娘以為我們會惹事，在哪兒？」

「西門外一個小吃店。」湯文達說，記起了。

那個小吃店在西門外的一個小山坡下，是一間專門吃麵條和餛飩的小舖子，也兼賣些熟食和火燒、老酒之類的東西。

「我們唱的是什麼歌？」莫辛問。

「多年以前，多年前。」

「對了，對了，是這隻歌。」

莫辛說。他已經喝了不少酒，紅潤的臉上透出一點點白皙。脖子上的筋粗了，眼圈襯著一團粉紅色的紅暈，一絲絲疲乏的軟弱的神態在他的眼神裏浮動。湯文達却滴酒未沾，一個勁地抽煙，在一旁瞧著莫辛一杯杯黃酒下肚。一會兒，他看到莫辛皺起眉頭，臉上隱隱約約地現出痛苦的表情。

「老湯，」莫辛說。「以前，我們是多麼融洽，真是值得懷念的過去。那時，我們在一起有幾年？怕有七八年吧。一直到五年，你出了事，胡風把你牽進去了，以後我們見過幾

次？」

「有二三次。」

「有三三次。我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了。我有壓力，說起來很可笑，很懦弱，但是我有壓力，精神上的壓力，十足的犬儒主義。我甚至和你多談一會都不敢，怕別人見到我們在一起。」

「我會理解的，我不想影響別人。」

「你不理解，對整個事件我不是沒有看法，這裏面不光是你，還有好些我認識的很了解的朋友。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考慮，怎樣洗刷自己，使自己不被牽連進去。」

莫辛說。顯然，醉意已漸漸地佔有了他，他一時揮舞著手，一時無目的地把酒杯舉起來

，又放了下來，弄出嘵嘵的聲音，黃酒濺滿了八仙桌。奇怪，剛見面時，莫辛面色豐潤，細皮白肉，甚至湯文達有點嫉妒他。現在看起來，他却衰老多了，好像那些深深的皺紋，鬆弛的肌肉，一下子從某個角落裏鑽出來似的。湯文達心想，這些年來，莫辛是怎麼過來的？他的養得心寬體胖的外表，又是怎樣和他剛剛流露出來的抑鬱的情緒取得協調呢？

「有時，我覺得我不再是我自己，我是另外一個人。」莫辛繼續說。「我在浪費我的精力，浪費自己的才能，也許我根本沒有能力，但是我却沒有試過，我沒有寫出過真正的東西……」

莫辛低下頭，一口氣把一杯黃酒乾了。當他抬頭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年輕人朝他們走過



來。

「阿奇，」湯文達說，站起來。「這是莫伯伯。」

湯奇淡淡地瞧了眼莫辛，就從他們的身旁擦過。

湯奇身體高大，差不多比他的老子高出半個頭，健碩，胸肌發達，肩闊腰圓，臉晒得黑黑的。他穿著時行的舊草綠色軍服。

「好一個彪形大漢，這就是湯奇嗎？」莫辛說。

「我們早就見過了。」湯奇說。

這下子，莫辛不得不愕然地在記憶裏搜索了，儘管搜索的意圖祇出現一會兒，他便表露出無能為力的樣子。

「我們見過？在哪兒？」

「早了。」

湯奇不以為然地說，走向旁邊一間用木板隔成的小房間，在房門口，他轉過頭來。

「十幾年前，你在西城區歡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會上講過話，大談農村是廣闊的天地，是大有作爲的。」

莫辛起先驚訝地把眼睛睜得老大，繼而笑起來，說：

「是有這麼回事，在東南戲院。那麼，你也下過鄉。那時，我在上山下鄉辦公室待過，有十三、四年了吧？」

但是湯奇已經把房門砰地一聲關上了，湯文達無可奈何地看了眼莫辛，莫辛已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嚇呆了。湯文達說：

「他以為他的一切都是我們留給他的，我們老一輩人留給他的，包括我的勞改，我的喪失掉的政治權力。我有內疚，本來他也許不至於這樣。他都快三十了，應該有他的事業，他的追求，他的愛情……」

「慢慢地來，一切都會解決的。這是一個問題，實在是一個問題。」

莫辛說，他的意興完全沒有了。他站起來，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拍掉沾在衣服上的花生碎殼。並且左右顧盼，想找尋程青，但是房子裏空空而已，祇有他和湯文達兩個人。他搭住湯文達的肩膀，一邊往門外走去，一邊說：

「老湯，聽說你恢復工作了，今天我特地來告訴你，我們辦了一個刊物，市文聯辦的，純文藝的刊物。請你當編委，也請你寫詩，寫文章。」

「我能寫些什麼？」

「隨便寫點什麼。」

「你要我寫一本『死屋手記』？」

「別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我早就感到不能寫東西了。」

「怎麼會呢，你很有才華。」

「不是這個意思。」湯文達結結巴巴地說。突然之間，他有一種想傾訴的願望，他抓住莫辛，想把莫辛拉住，要他再坐下來，他要談談藝術、生命、尊嚴、良心，談今天以來他的一些想法。

「不是這個意思。」他說。

但是莫辛却逕直往屋外走去，全然沒有注意到湯文達急切想傾訴的表情。

「你寫吧，」莫辛說。「寫吧。你知道，很多人平反之後，都重新開始寫作，而且都寫出有分量的東西，受到好評。你寫吧，別推辭了，就這麼說定，隨便給我們寫點什麼。」

晚上，老林帶著他的一個朋友來找湯文達。他發誓賭咒說，他今天早上送來的「自動跳開關」是日本的產品，不同於一般民用的熔斷

器，它既可以自動跳開，又不需要接保險絲就可以復開。這隻產品大有前途，省五金公司絕對可以定點生產。聽完了他的話，湯文達答應過兩日去找他姪子認識的那個廠長，但心底裏一點兒信心都沒有。

「你快點去找他，事不宜遲，夜長夢多呵。」

老林說，瞧著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趕緊點頭，表示同意。老林五十來歲，剛剛平反的右派。他個子矮小，右腳稍微有點跛，走起路來一高一低，但舉止靈活，眼珠骨碌碌地轉。而他的朋友正相反，却像一座門神，高大，神情呆滯，祇是不住地點頭。

「即刻會找到單位，是不是？」老林說，又轉過頭對著他的朋友，這次他的朋友露出憨厚的笑容。「真的，老湯，你要把這件事當成一件小事，我們都跑了好幾個月了，一點頭緒都沒有，我老婆成日逼著我給她女兒找工作。」

老林笑起來，他剛剛和一個寡婦結婚，那女人帶過來一個十七歲的女兒。

湯文達送走了他們，回來時蹲在木房子門口的的水泥條板上，對著廣漠的夜空出神。

雖然是初春，水泥預製場却透著一股冷清的逼人的寒意，一陣陣陰濕的鐵鏽和淤泥混和在一起的氣味在空氣中飄浮。

星星燿耀著，時明時暗，在暗藍色的天幕上，顯得疏遠，格外地不近人情。

年少時，湯文達對這些遙遠的閃爍的星座，簡直瞭如指掌。他常常不假思索地道出這些星座的名字，和它們距離地球究竟有多遠，因而深得大人們的讚賞。那時，他甚至天真地以為，他將來要當天文學家了。但是數十年之後，他却發現自己除了推著獨輪翻斗車運送水泥之外，別無他能了。

「你一定要為我們寫點東西。」
他想起莫辛臨走時說的話，有點後悔他當時竟然毫無顧忌地回答他：

「你要我寫出一本『死屋手記』？」

當然，這祇不過是一句笑話。他不會，也沒有那份勇氣，他不能使程青再受一次打擊，哪怕半次也不能了，他有負於程青和湯奇實在太多了。

他稍稍有點激動地站起來，坐骨神經痛使他的右臀又隱隱地作痛，他緩緩地移動脚步，在水泥預製場上走動。藉著清冷的月光，和一盞對正著大門口的碘鎢燈，他看到了水泥拌和機清晰的輪廓，零亂地堆積起來的松木板方，遍地橫陳的水泥多孔板，一條條拉緊的預應力鋼絲，鋼絲在月色下閃著蜻蜓色的亮光。

那麼，他們要他寫些什麼呢？湯文達繼續困惑地想著。如果他完全排除掉他依據自身的體驗建立起來的對生活、苦難、情慾等等深切的解，他的經驗裏面到底還剩下多少可以寫呢？或許他的想像力並未完全崩潰，他依然可以編織一個美麗的故事。但是，那些年輕人，包括湯奇在內，他們會囫圇吞棗地接受那些精美的包裝嗎？

「他們不會接受的。」湯文達說，對著寂寥的水泥預製場。「他們不再需要虛假的东西了，他們需要認真地思考，需要獨立自主，需要不害羞地生活下去，需要受到尊重。」

湯文達走進木房子，房子裏亮著一盞十五瓦的日光檯燈，程青躺在縫紉車旁邊的一張竹製的躺椅上，疲乏，心事重重。湯文達拉過一張小椅子，坐在她旁邊。

「你累了。」他說。

「不怎麼樣。」

「別幹了。」

「還有一點點，一會兒就完了。」

「你吃得消？」

「沒有什麼。」

程青斜過臉看著他，臉上露出一絲絲笑容，蓋住她的飽經滄桑的臉面，反而顯得有點淒涼。她的夾著白絲的頭髮，散亂地披在躺椅的枕墊下。

「你有話要跟我說嗎？」程青問道。

「唔，我想和你談一談，你不累嗎？」

「不，不累。」

湯文達帶點兒感動地在躺椅的靠手上找到了她的手，輕輕地接住她的手背。猶豫地清了清自己的喉嚨。

「阿奇呢？」

「在房裏。」

「他很苦悶。」

「是的。」

「我沒有能力，我很慚愧。」

「不是這樣，不光是我們。」

「他需要有一個工作，他應該有的，他都二十九歲了。」

「不光是我們。」

「他有點羞愧，他還在依靠我們，依靠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婆，他早就想表示出自己的獨立性了，文化大革命那陣子……甚至還早些。但是到現在，他還在依賴我們。」

「找工作是多麼困難，你的那些產品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的努力是徒勞的，我很慚愧，這些年來你受了不少苦，都是我帶給你們的。」

「你說這些話幹什麼？現在不是好了嗎！你已經平反了。」

「是的，一切都好了。莫辛剛才說，他要我寫文章，但是現在對我來說太不重要了。你

明白嗎？我已經習慣了，體力勞動使我輕鬆，我的坐骨神經痛，也不是每天都發的。」

「以後你可以不再做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湯文達說，著急地抓緊程青的手，恐怕她誤解了他的想法。「我能做，我還能做幾年。」

「不是快要安排工作了嗎？」

「是的，不久?!但是我還能做，阿奇比我重要，不是嗎？」

「他當然重要。」

「我的意思，」湯文達審慎地選擇著詞句。「平反之後，我想讓阿奇頂替我的工作，隨便他們怎麼安排。我自己呢，我還能幹幾年。」

「你吃得消嗎？」

「我行，你看我最近都沒有發過病。」

「你已經上了年紀。」

「我老了？你說我老了？」

「不是，我是說你再也不能幹體力活了。」

「我能，我能，你看，我是不是和阿奇談一談？」

「談一談？當然好了，你們父子倆從來沒有好好地談過。」

「那麼，現在我就去和他談，認真地談一談。這麼說，你同意了，是嗎？」

湯文達充滿感情地拍了拍程青的手，站起來，邁著堅定的自信的步伐，往湯奇的臥室走去。他第一次有一種自豪的感覺，一種他終於是一個父親的感覺。他要父親的姿態，和湯奇談一談。談到他自己的工作，他們的想法，以及他們的決定。至於這次「平反」，莫辛要他寫的文章，李部長的講話，這些都顯得不重要了，因為他自己已是那樣地無足掛齒。

中國之春英文版訂閱單

China Spring Digest

SUBSCRIPTION FORM

Name _____	Subscrip. fee, one yr. 6 issues
Address _____	Regular : US \$12.00
City _____	Students : US \$ 8.00
State _____ Zip _____	Contribution of \$150.00 or more entitles you to become permanent subscriber
	Overseas Postage: US \$ 8.00/air
	US \$ 5.00/sea
	Canada Postage: US \$ 3.00/air

Make check payable to: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您想聽到：

中國民主化的腳步聲嗎？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 費 (每年)
地址： _____	寄達地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 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7710410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 平郵：5 美元

捐款獎勵大陸留學生

～歡迎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中國之春編輯部向我反映，向編輯部寫信索閱中國之春雜誌的大陸留學生越來越多。大陸公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一般生活費很少，回國還要購買八大件，無力出錢購買雜誌。聽到這種情況，我決定提供一筆捐款，再供200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免費訂閱中國之春。大陸留學生是一代新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政體的演變，很大程度上依賴這批人完成。

近幾年，我數次回國觀光旅遊。在大陸，我親眼看到專制制度對人才的壓抑，對自由的扼殺，對人性的扭曲；我親耳聽到知識份子對政工官僚的控訴，對前途的無望，對民主的渴求。我感覺，中國之春所主張的，正是多數中國大陸同胞所需求的。因此，我將繼續支持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請大陸留學生盡快寫信給中國之春編輯部，要求免費訂閱。

華僑

李時化

一九八六年十月

本刊徵稿*稿酬從優

中國正處於大變革之中，十五年內，必有巨變。新一代的留學生，將影响着中國未來的命運。請大家拿起筆，加入到探討和變革中國命運的運動中來。

本刊近期擬組如下專題，請大家撰稿

；

▲ 歸國留學生的待遇問題；

▲ 中國駐外人員（包括外交官員）的待遇問題；

▲ 改良還是革命——民運策略的研討；

▲ 台灣政情的發展對大陸的影響；

▲ 如何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凡探討中西方政治、文化、經濟、思想及報導中國現狀內幕的稿件，本刊均表歡迎。

● 爲大變局的到來做好組織準備 ●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民主的目標誰不向往？可是，怎樣才能成功呢？」我們總是聽到這樣的問題。

「怎樣成功？」我們的體會是：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就能成功。您加入民運的行列，民運成功的希望就大了一分。

孤獨時，常有無力感、無助感、無望感。加入民運行列，做一兩件對祖國前途有益的事，和我們共同奮鬥，會使您的這種感覺一掃而空。

中國民聯總部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1號萬隆大廈1206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3-7710410

■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8.00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